

全球移民趨勢最新報告



新大華國際專題奉獻

序言

當今全球化時代，勞動力、商品和資本更加自由流動，移民作為全球化的一部分，也在加速流動。而移民遷移和流動作為人類社會的古老現象，也隨著時間不斷發生著變化。

因此，在這個人們對移民充滿高度興趣和活動的時代，移民報告成為瞭解移民的關鍵資源之一，它能幫助讀者在不確定的時期駕馭這個充滿動態變化的話題。更重要的是，能從報告中學到一些新的東西，為自己的工作，無論是行業研究、趨勢分析、政策制定或移民實踐，提供有用的資訊。

移民報告有特定的受眾，包括制定政策的政府官員、從業者、媒體、專家、教研人員以及愛好者等，並已成為政府研究、分析、制定和審查移民政策的重要依據。

COVID-19是一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大流行，其高傳播、病毒株和疾病的嚴重性迫使決策者進入以前未知的領域，部分應對的限制措施的持續時間超過了許多人的預期，涉及對世界各地人民流動自由的劇烈變化，反過來也嚴重影響了全球人類的流動性——與疫情相關的靜止狀態已成為移民的巨大干擾。疫情對移民行業產生了深遠影響，使得移民流動性在幾個關鍵領域發生了深刻轉變。

以往的移民報告並無涉及疫情的因素，而疫情期間發表的個別報告又過多糾結於疫情影響，亦無法體現與時並進。此次近十萬字的《全球移民報告》經過同仁數個月時間的嘔心整理，參考了聯合國經濟和社

會事務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國際勞工組織、世界銀行、聯合國難民事務署、國際流離失所監測中心等多個機構的統計數據，以及國際權威移民組織發表的相關報告，重要移民目的國家發表的官方統計，和對疫情與移民影響的分析等，均呈現給讀者，以體現與時並進。

而烏克蘭戰爭無疑是後疫情期間最有影響的地緣政治事件，對移民業的影響正在逐步浮現，但烏克蘭因其屬於歐洲的特性及免簽便利，以及歐洲的自由流動性，無法正確掌握相關難民的真實人數，加上國際社會亦無正式發表的統計數據，因此本報告並無將其列入比較。

中國作為移民大國，既是重要的移民來源國，也是新興的移民目的國之一，本報告對政策制定者、相關人士、從業人員以及對移民有濃厚興趣的朋友們，均有一定的實用性及參考價值。惟因時間倉促和局限性，加上大多數數據截止2021年初，難免有不足之處，敬請諒解，歡迎予以指正。



朱 磊

新大華國際執行長

第一章 全球移民概況

人類遷移是一項古老的活動，幾乎涉及到世界各地的每個社會階層，而移民報告旨在通過提供全球移民的最新概況，幫助移民決策者、從業者和研究人員更好地瞭解移民大局，掌握移民的長期趨勢。

目前全球約有2.81億國際移民，相當於占全球人口的3.6%，這是世界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意味著留在出生國仍然是常態：**絕大多數人不跨境移民，更多的人是在國家內部移民。**疫情突出了移民和移民之間的相互聯繫，疫情的旅行限制導致世界各地前所未有的靜止不動，也考驗著世界在面對前一個世紀未見的全球衛生危機時的集體恢復力。

全球流動機制卻沒有受到全球流行病的完全阻礙，絕大多數人因與工作、家庭和學習研究有關的原因依然進行國際移民——這些移民基本上沒有對他們進入的國家構成根本挑戰。選擇離開他們的家園和國家是為了一系列的原因，包括政治、經濟、衝突和災難。

什麼是國際移民

基於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UNDESA）編制國際移民資料庫時的定義，“國際移民”是指任何人改變了他/她的國家的通常居住地，可分為“短期移民”（那些通常居住地至少三個月以上、但不到一年的）和“長期移民”（那些通常居住至少一年以上的）。一些國家使用不同標準來確定國際移民者，例如採用不同的最低居住時間——這會影響國際移民的統計數據的完整性。

國際移民的人數在過去五十年裏一直在增加。目前近**2.81**億人生活在出生國以外的國家，而1990年約為1.53億人，1970年約8400萬。國際移民占全球人口的總比例雖有所增加，但絕大多數人還是生活在他們出生的國家。疫情對全球移民人口的影響難以評估，初步估計疫情使國際移民數量減少了約200萬。本報告採用的數據已是盡可能最新，大多是在2021-22年統計，當時仍在疫情大流行期間。

1970—2020年国际移民人数和百分比

年份	国际移民人数	移民占世界总人口百分比 (%)
1970	84 460 125	2.3
1975	90 368 010	2.2
1980	101 983 149	2.3
1985	113 206 691	2.3
1990	152 986 157	2.9
1995	161 289 976	2.8
2000	173 230 585	2.8
2005	191 446 828	2.9
2010	220 983 187	3.2
2015	247 958 644	3.4
2020	280 598 105	3.6

来源：UN DESA, 2008; UN DESA, 2021a.

注：联合国经社部《2020年国际移民存量》中数据统计的实体（如国家、领土和行政区域）的数量为232个。在1970年，实体的数量是135个。

注：聯合國統計的實體（國家和行政區域）數量為簽證旅行指數參考的基準數。

國際移民趨勢

欧洲目前是国际移民的最大目的地，有8700萬移民（占國際移民人口的30.9%），其次是居住在亞洲的8600萬國際移民（30.5%），北美的5900萬國際移民（20.9%），接著是非洲的2500萬移民（9%）。過去十五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國際移民人數增加了一倍多，從700

萬增加到1500萬（5.3%），成為國際移民增長率最高的地區。大約有900萬國際移民生活在大洋洲，約占所有移民的3.3%。

2005—2020年按主要居住区域划分的国际移民（百万人）



来源：UN DESA, 2021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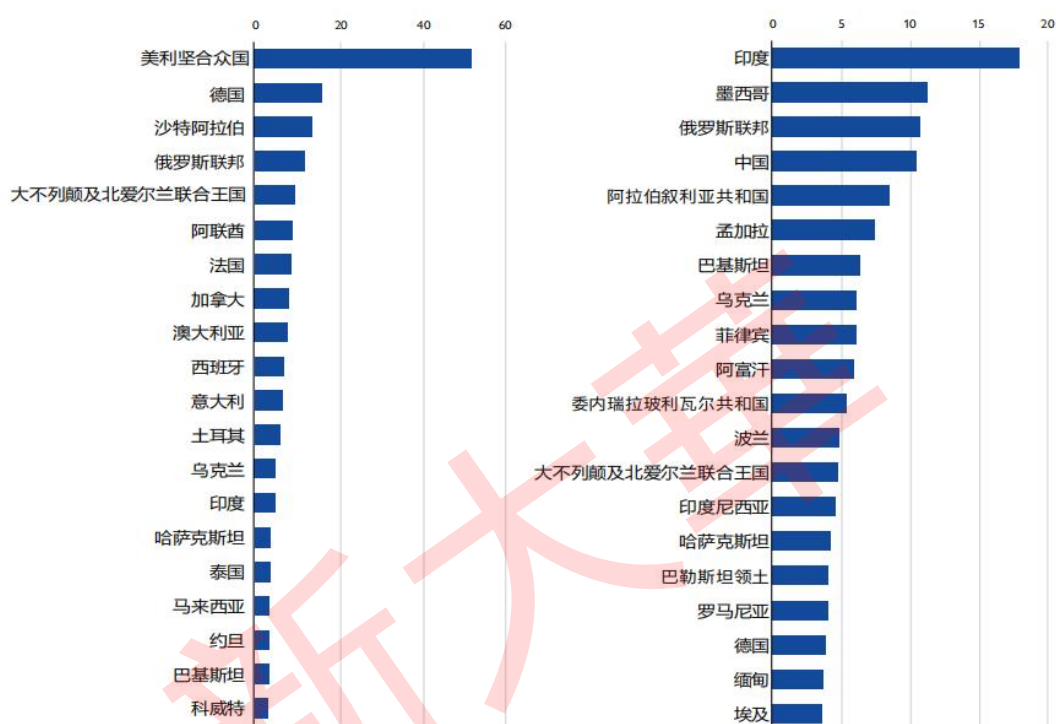
大洋洲的国际移民占总人口的比例最高（22%），北美的國際移民位居第二（15.9%），其次是歐洲（11.6%），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非洲和亞洲的國際移民占比分別為2.3%、1.9%和1.8%。

美国是最多移民的目的國，有5100多萬國際移民。德國已成為第二大移民目的國，擁有近1600萬國際移民。而沙特則是第三大國際移民目的國，有1300萬國際移民。俄羅斯和英國分別是第四和第五目的國之一，分別有約1200萬和900萬國際移民。

印度有1800万人居住在国外，是世界上移民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全球移民最多的原籍國；墨西哥是第二大原籍國，約1100萬人；俄羅

斯是第三大原籍國（1080萬）；中國（1000萬）位居第四；第五大原籍國是敘利亞，有800多萬人居住在國外，主要是由於過去十年中大規模流離失所而造成的難民。

2020年国际移民前20位目的国（左图）和来源国（右图）（百万人）



来源：UN DESA, 2021a

“移民走廊”是指一段時間內在一個國家出生、但居住在另一個國家的國際移民流動積累量的術語。墨西哥到美國的移民流動是世界上最的移民走廊，有近1100萬人；第二個是從敘利亞到土耳其，主要包括因敘利亞長達十年的內戰而流離失所的難民；世界上第三大走廊是印度到阿聯酋（超過300萬），主要是勞工移民；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走廊是世界第四位和第五位，大約有300萬出生在俄羅斯的人移居到烏克蘭，而幾乎相同數量的人又從烏克蘭移居到俄羅斯。

78%的國際移民處於工作年齡（15至64歲），自1990年以來，19歲以下（聯合國關於“兒童”的定義是指19歲以下）的國際移民比例從18.9%下降到14.6%，而64歲以上的移民者則穩定在12.2%左右。

目前世界各地的男性移民人數多於女性，2000年男女比例為50.6:49.4（即8800萬男性移民和8600萬女性移民）。到2020年，這一比例為51.9:48，即1.46億男性移民和1.35億女性移民。女性移民比例一直在下降，男性移民比例增加了1.4個百分點。

“**迁移**”（migration）是指從一個地方遷移到另一個地方的過程。比如從一個農村地區遷移到一個城市；或從一個特定國家的一個地區或省遷移到同一國家的另一個地區或省，又或者從一個國家到一個新的國家，它涉及到具體行動。

“**移民**”（migrant）是指由於某個或某些原因而移民的人。移民的界定**取決於具體環境**。雖然在許多情況下，移民確實進行了某種形式的遷徙，但情況並非總是如此，某些情況下，從未進行過遷徙的人也可能被稱為移民，比如通過買房、捐助等獲得第二國身份的。

在海外出生的人中，通常被稱為第二代、第三代移民，這可能會發生在甚至延伸到無國籍狀態的情況，即整個群體儘管在一個國家出生和長大，卻無法獲得公民身份，這些人也被稱為非正規移民。

国际移民流动

聯合國關於全球移民的資料庫只包括45個國家，這是因為：

第一，國際移民流動雖包括入境和離境，但很多國家只注重記錄入境人數。例如澳大利亞和美國記錄跨境流動只計算入境人數，而不計算離開人數；

第二，一些國家的移民流動數據來自與移民身份有關的（例如簽發/續期/撤回居留許可等）用作移民流動的統計依據；

第三，移民旅行往往很難與非移民旅行分開，如旅遊或商務。跟蹤移民流動還需要大量的資源、基礎設施和資訊和通信技術系統——這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特別的挑戰，在這些國家，收集、管理、分析和報告關於流動移民數據的能力往往很有限；

第四，許多國家的地理位置對收集有關移民流動的數據提出了巨大的挑戰。例如島嶼和孤立的邊界，都導致某些地區的入境和邊界管理特別寬鬆，也讓非正式移民流動的統計工作變得複雜和困難。

國關於國際移民流動的主要數據統計庫有兩個：聯合國數據安全局的“**国际移民流动数据库**”和經合組織的“**国际移民数据库**”。截至2021年7月，“國際移民流動資料庫”最新是2015年版本，包括來自45個國家的數據；經合組織自2000年以來一直在收集國際移民數據，對主要移民目的國進行趨勢分析。

最新統計顯示，2018年，永久移民流入比2017年增加了10%。美國是主要目的國之一，2018年新增移民入境者約110萬人；另一個有顯著增加的國家是智利，增長了64%！

經合組織中的歐洲國家，2018年移民總數增加了約13.6萬人（比2017年增加了3.2%）。英國和愛爾蘭的永久移民流入量分別下降了6.5%和

5.2%。歐洲新移民的增長主要來自**西班牙**（增加23%，約10.6萬）和**葡萄牙**（增加52%，約3.2萬）。

2000—2018年永久迁入经合组织国家的外国国民（百万人）



来源: OECD, n.d.a.

注: 数据未经过标准化统计, 因此与经合组织《国际移民展望》(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utlook) 系列中所载的某些国家的永久迁移迁入量的统计数据有出入。在经合组织统计范围内的通常是如下的35个国家: 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智利、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大韩民国、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某些年份没有特定国家的数据: 2000年只有31个国家的数据。值得注意的是, 2000年和2004年之间希腊的数据没有被统计, 土耳其的数据只在2010年、2016年、2017年和2018年被统计。

不安全的國際移民流動

一些移民走廊給當局帶來了挑戰。移民旅行有時具有不安全甚至致命的結果, 往往與社會、政治、經濟、環境和政策因素有關, 也深刻影響人們進行移民的方式。

2020年記錄死亡的數據總數最低(約3900宗), 相比2019年記錄了近5400宗死亡人數, 下降原因反映了同年疫情造成的限制。隨著全球旅行限制的解除, 總體死亡人數可能進一步回升。2014-2020年, 地中

海區域記錄超過21200人死亡，成為目前已知的移民死亡人數最高的區域。

注：大多數有記錄的死亡人數都是通過秘密路線旅行的人，這些路線通常是在海上或偏遠地區（以逃避探測），意味著往往找不到遺骸。很少有官方消息收集和公開有關移民死亡的數據。由於不準確和報導不完全，依靠移民同胞的證詞和媒體來源可能會造成數據不準確。

疫情对移民的影响

COVID-19是一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大流行，其高傳播、病毒株和疾病的嚴重性迫使決策者進入以前未知的領域，應對措施的一部分涉及對世界各地人民流動自由的劇烈變化，這反過來又嚴重影響了全球人類的流動性——與疫情相關的**静止状态成为對移民的巨大干扰**。

世界各國政府實施了各種措施來限制病毒的傳播，如在家辦公、工作場所關閉、學校關閉、限制集會、限制國內流動以及國際旅行控制措施，如一些國家停止進入外國公民；一些則禁止特定國家的公民，甚至一些國家完全關閉邊界停止離開和入境，包括自己的公民；一些國家也採取了檢疫措施，要求進入國家的乘客在抵達後立即被隔離（通常為10至14天）。

2020-2021年，與疫情有關的限制措施已經使全球近三百萬人滯留在世界各地，大部分是經常旅行的人，如季節性勞工、臨時居民、國際學生和遊客等，其中許多人得不到領事服務，包括為他們提供在當地的法律幫助，不少人則缺乏足夠的錢以獲得食物和住所，大多數集中在中東、北非及亞太地區。

疫情期間的流動限制給移民帶來了重大問題：除了導致行動不便外，還有返回家園的費用和物流問題。此外，移民來源國、目的國和過境國之間缺乏合作，也進一步加劇了移民流動受限問題及脆弱性，包括缺乏有效身份排除了政府支持的可能性，種族歧視等仇外心理和汙名化、滯留、生活在過度擁擠的避難所，以及無法獲得有效衛生支援的健康風險增加。

疫情限制措施的持續時間超過了許多人的預期，也使得移民流動性在幾個關鍵領域發生了轉變。其後隨著支持衛生相關措施的技術和後勤能力的發展和推廣，旅行邊境限制和衛生相關措施已發生變化。不同國家採取了旅行前測試、檢疫和疫苗接種證明入境，旅行限制在2020年10月之後逐步被衛生相關措施所取代。

勞工移民

2019年全球約有1.69億移民勞工，占當時全球2.72億國際移民的近三分之二，與全球工作年齡的國際移民人口相比（年齡在15歲以上的有2.456億人），勞工移民占68.8%。

67%的勞工移民居住在高收入國家，約有1.139億人；4900萬勞工移民（29%）生活在中等收入國家；610萬（3.6%）生活在低收入國家。

國際勞工移民在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國家的比例保持穩定，但隨著時間的改變發生了明顯的變化：2021年，高收入國家移民勞工比例下降了7.3個百分點（從74.7%下降到67.4%），而中高收入國家增加了7.8個

百分點（從11.7%到19.5%）。這種明顯轉變受到中等收入國家經濟增長及高收入國家勞工移民法規變化的影響。

超過六成的勞工移民居住在三個區域：**北美、阿拉伯國家以及北歐/南歐/西歐**。兩個地區勞工移民的性別失衡顯著：南亞（男性570萬，女性140萬）和阿拉伯國家（男性1990萬，女性420萬）。阿拉伯地區是移民勞工首選目的地之一，占整個工作人口的41.4%。

侨汇

“僑匯”是指移民直接向其來源國的家庭進行的金融或實物轉移。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即使疫情期間，2020年全球僑匯仍達到7020億美元，僅比2019年略降2.4%。三十年以來，僑匯已超過官方發展援助水準。實際規模可能比世界儀銀行現有的數據估值還要大。而印度、中國、墨西哥、菲律賓和埃及是全球前五位僑匯接收國，每個國家的僑匯流入總額都超過590億美元（見下圖）。

侨汇流入/输出国家前10位 (2005—2020年) (十亿美元)

侨汇接收国排行							
2005		2010		2015		2020	
中国	23.63	印度	53.48	印度	68.91	印度	83.15
墨西哥	22.74	中国	52.46	中国	63.94	中国	59.51
印度	22.13	墨西哥	22.08	菲律宾	29.80	墨西哥	42.88
尼日利亚	14.64	菲律宾	21.56	墨西哥	26.23	菲律宾	34.91
法国	14.21	法国	19.90	法国	24.07	埃及	29.60
菲律宾	13.73	尼日利亚	19.74	尼日利亚	20.63	巴基斯坦	26.11
比利时	6.88	德国	12.79	巴基斯坦	19.31	法国	24.48
德国	6.86	埃及	12.45	埃及	18.33	孟加拉国	21.75
西班牙	6.66	比利时	10.99	德国	15.58	德国	17.90
波兰	6.47	孟加拉国	10.85	孟加拉国	15.30	尼日利亚	17.21

侨汇输出国排行							
2005		2010		2015		2020	
美利坚合众国	47.75	美利坚合众国	50.53	美利坚合众国	60.72	美利坚合众国	68.00
沙特阿拉伯	14.30	沙特阿拉伯	27.07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40.70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43.24
德国	12.71	俄罗斯联邦	21.45	沙特阿拉伯	38.79	沙特阿拉伯	34.60
瑞士	10.86	瑞士	18.51	瑞士	26.03	瑞士	27.96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9.64	德国	14.68	俄罗斯联邦	19.69	德国	22.02
法国	9.47	意大利	12.88	德国	18.25	中国	18.12
大韩民国	6.90	法国	12.03	科威特	15.20	俄罗斯联邦	16.89
俄罗斯联邦	6.83	科威特	11.86	法国	12.79	法国	15.04
卢森堡	6.74	卢森堡	10.66	卡塔尔	12.19	卢森堡	14.20
马来西亚	5.68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0.57	卢森堡	11.19	荷兰	13.92

来源: World Bank, n.d. (检索日期 2021年6月)。
 注: 所有数字都是当前的(标值)十亿美元。

疫情讓僑匯數據打破了外界對全球僑匯大幅下降的預測，一些國家更創下新高。根據世界銀行2021年報告，僑匯流動在疫情期間被證明更具有彈性。2020年官方記錄的僑匯流量達到7020億美元，僅比2019年低2.4%，疫情提供額外推動力，利用技術進一步擴大僑匯管道並降低成本。

隨著支持僑匯的政策出臺以及經濟條件向好，從非正規管道（如跨境攜帶現金）轉向更加數位化的金融轉賬這一正規管道是僑匯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例如疫情期間邊境口岸受到限制，電子轉賬成為僑匯的唯一選擇，僑匯流量從非正式管道轉向正式管道。

一些國家採取措施鼓勵使用數字服務，移動貨幣平臺使僑匯比傳統的現金和銀行轉賬更便宜、更快捷。通過移動支付，僑匯也變得更加易於追蹤，使得這種方法比非正式管道更安全。

然而，僑匯成本仍然很高。截至2021年，全球範圍內的僑匯成本平均為**侨汇金额的6.38%**（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是降到3%以下），26%的國家管道總成本高於5%（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是管道最終達到零成本）。

僑匯依賴

“僑匯依賴”（Overreliance）是指以僑匯與國內GDP的比例衡量。目前有29個國家僑匯占GDP比例超過10%，前五位是：湯加（37.7%）、索馬里（35.3%）、黎巴嫩（32.9%）、南蘇丹（29.5%）和吉爾吉斯（29.4%）。依賴僑匯過度會在接收國培養出**依附文化**，降低勞動力參與率，減緩經濟增長，也使經濟更容易受到僑匯收入突變影響。

高收入國家幾乎是僑匯的主要來源國。美國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僑匯輸出國，2020年僑匯額為680億美元，其次為阿聯酋（432.4億美元）、沙特（346.0億美元）和瑞士（279.6億美元），第五大僑匯輸出國是德國（220.2億美元）。作為較大的接收國，中國（被世界銀行列為**中上收入国家**）也是重要的僑匯輸出國，2020年為181.2億美元。

难民与寻求庇護者

全球現有2640萬難民，其中2070萬屬於聯合國難民署的任務範圍，總數已達有史以來最高。還有大約410萬人在尋求國際保護，等待確定其難民身份，這些人被稱為尋求庇護者。2020年全球提出一審庇護申

請數量為110萬，與前一年的200萬相比，下降了45%——這是自2000年聯合國難民署在全球匯總庇護申請以來最大的單年降幅，也是受疫情限制的直接結果。接受庇護最多的國家仍然是美國，大約有250800份申請，比前一年（30.1萬份）減少了14%；排名第二的是德國，有102600份新申請，比2019年（14.25萬份）明顯減少，是近十年來的最低記錄。

截至2020年底，18歲以下難民約占難民人口的38%（難民署認證的2070萬難民中，18歲以下難民為800萬人）；“孤身失散兒童”提出的個人庇護申請估計為2.1萬份，比前一年的2.5萬份有減少。

主要國家尚未解決或重新出現的衝突很大程度上促成了目前的難民數量和趨勢。2021年聯合國難民署認證的難民中，排名前十的來源國是敘利亞、阿富汗、南蘇丹、緬甸、剛果（民主）、索馬里、蘇丹、中非共和國、厄立特里亞和布隆迪，占難民總數80%以上，是難民的主要來源國。

敘利亞持續十年的衝突中，來自該國的難民人數達到約670萬人，連續七年成為難民的主要來源國——諷刺的是，2010年，敘利亞還不到3萬難民，卻是世界上第三大難民收容國，當時收容了超過100萬伊拉克難民；

三十多年的不穩定及暴力因素使阿富汗成為世界上第二大難民來源國，有260萬難民；自2016年爆發大規模暴力事件以來，南蘇丹就是第三大難民來源國，2020年底有220萬難民。來自敘利亞、阿富汗、南蘇丹、緬甸和剛果（民主）的難民占世界難民總數一半以上。

土耳其連續第五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難民收容國，有超過360萬難民居住在此，主要是敘利亞難民；黎巴嫩、巴基斯坦和伊朗也位於十大難民收容國之列，其餘主要收容國為烏干達、德國、蘇丹、孟加拉和埃塞俄比亞。

絕大多數（73%）難民收容在鄰國。最不發達國家孟加拉、乍得、剛果（民主）、埃塞俄比亞、盧旺達、南蘇丹、蘇丹、坦桑尼亞、烏干達和葉門，卻收容了全球難民總數的27%（670萬難民）。

2020年共有近3.4萬名難民歸化入籍，與2019年近5.5萬相比，明顯減少。85%的歸化入籍難民是在歐洲，其中大部分（約25700名）在荷蘭，排名第二和第三的是加拿大（約5000人）和法國（約2500人）。

2020年，全球約有34400名難民被重新安置，與2019年超過107700的人數相比大幅下降，主要的安置國是美國和加拿大，分別大約有9600和9200名難民，歐盟共安置了11600名難民。敘利亞人是其中主要受益者，占被安置難民的三分之一，其次是剛果人(12%)。

難民安置人數急劇下降的部分原因是疫情嚴重限制了世界各地的流動。導致美國重新安置難民人數下降的原因是大幅降低了難民接納上限（每個財年接納重新安置的難民人數），及加強對來自“高風險國家”難民的安全檢查，都減少了接納這些國家難民的人數。

流离失所者

境內流離失所監測中心（IDMC）彙編了兩類流離失所者的數據：給定時期內的新流離失所者和給定時間點的流離失所者的總存量。該統計資訊按兩大流離失所原因進行分類：自然災害以及衝突和暴力。

截至2021年1月，全球59個國家和地區因衝突和暴力而流離失所的總人數估計為4800萬，是自1998年開始監測以來的最高記錄。與難民趨勢相同，因衝突和暴力而在境內流離失所的總人數自2000年以來幾乎翻了一番。

世界上因衝突和暴力而流離失所人數最多的前二十個國家，大多數位於中東或撒哈拉以南。敘利亞流離失所人數最多（660萬人），其次是剛果民主共和國（530萬人），哥倫比亞以490萬位居第三，其後是葉門（360萬人）和阿富汗（350萬人）。全球4800萬流離失所者中，超過3500萬（近74%）生活在前十個國家（目前無確切數據統計烏克蘭人申請難民的具體數量，故本報告並無單獨列出，仍以聯合國2021年底的統計為準——編者注）。

從人口比例來看，衝突已持續多年的敘利亞有超過35%的人口因衝突和暴力而流離失所，索馬里位居第二（19%），其次是中非、南蘇丹和葉門（超過12%）。然而，如哥倫比亞，一些返回來源地和家園的人仍被視為流離失所者——這是因為在某些情況下，尚未實現持久的解決方案。境內流離失所監測中心規定了構成持久解決方案的**八項標準**：安全保障、適當的生活水準、獲得生計、恢復住房/土地/財產、旅行檔、家庭團聚、參與公共事務以及獲得有效司法補救的機會，以確定人們不再被視為“流離失所者”。

新增流离失所者

“新增流離失所者”一詞是指某一年發生的流離失所人數，而不是一段時間內流離失所造成的境內流離失所者的累計存量。

截至2020年底，共有42個國家和地區因衝突暴力以及144個國家和地區因災害新增境內流離失所者4050萬人。這些新增流離失所者中，**76%由災害引發，24%由衝突暴力造成**。2020-21年，剛果（民主）和敘利亞在暴力衝突造成的新增流離失所人數最多的國家中高居榜首，緊隨其後的是埃塞俄比亞、莫三比克和布基納法索。菲律賓2020年經歷了最大的新增災難流離失所者人數（約510萬）。

無論哪年，因災害而流離失所的人數都比因衝突暴力流離失所的人數多，受災害流離失所影響的國家更多。從2020年發生新增流離失所的國家和地區數量來看，這點很明顯：受災害影響的有144個，受暴力衝突影響的有42個，與天氣有關的災害引發了絕大多數(3000萬)新增流離失所者，其中風暴占1460萬，洪水占1410萬。

衝突、暴力造成的流離失所者仍然處於歷史最高水準。棘手、懸而未決和反復發生的衝突暴力致使世界各地難民數量激增，**流离失所人数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在不久的将来還會更多。**

迁移和移民

儘管全球化程度不斷提高，但**地域**仍然是影響移民最重要的基本因素之一。許多跨境遷移者通常選擇在所處區域內遷移，前往容易到達、更熟悉和方便返鄉的臨近國家。而對於流離失所者來說，迅速獲得安

全是最重要的。因此，無論是境內還是境外，人們**傾向於搬遷到附近更安全的地方**。

世界是相互聯繫的，遷移的本質意味著其動態特徵，移民到亞洲和歐洲的居住率遠高於其他地區，近年來自高度發達國家的人口流動性更高。

本報告按六個聯合國界定的世界區域：非洲、亞洲、歐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北美洲、大洋洲分列各區域移民的主要趨勢和變化。

非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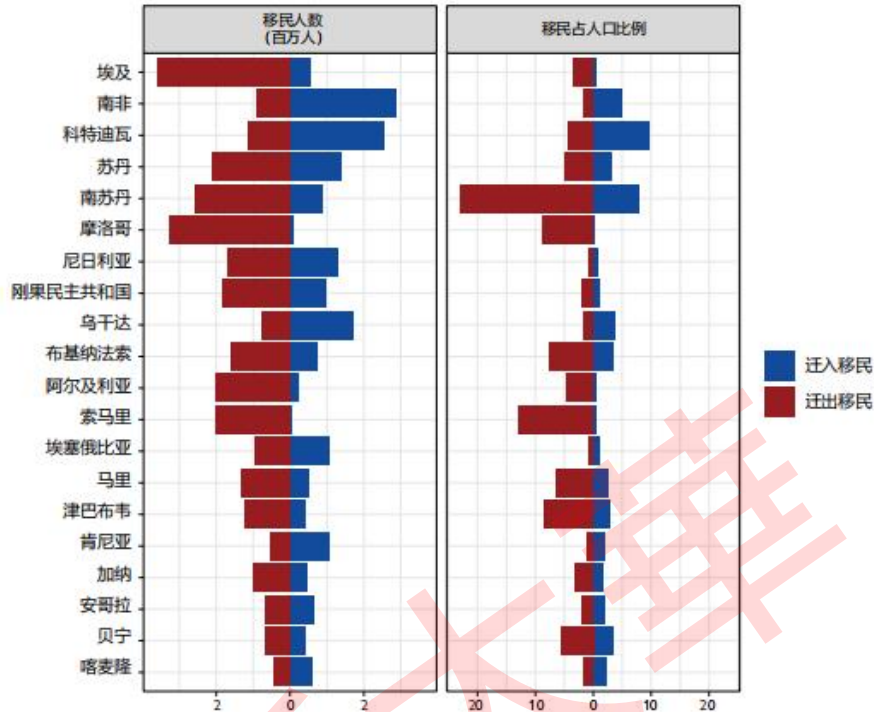
非洲地區遷入和遷出的國際移民數量都較大。2015年估計居住在非洲的移民人口約有1800萬，到2020年增至約2100萬。而非洲往外的國際移民規模也顯著增加，自1990年以來，居住在該地區以外的非洲移民人數增加了一倍以上。2020年，生於非洲、但生活在非洲以外的總移民人口增至近1950萬，其中移民歐洲的增量最顯著，約1100萬人居住在歐洲，約500萬人居住在亞洲，約300萬人居住在北美地區。

非洲國際移民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非洲以外出生、後來遷移到這裏的少數移民。從2015年到2020年，在該區域外出生的移民數量基本保持不變（約200萬），其中大部分來自亞洲和歐洲。

北非國家的移民數量最多，其中**埃及擁有最多的海外移民人口**，其次是摩洛哥。**南非是非洲最大的移民迁入国**，約有290萬國際移民居住在該國——但相較於2015年（320萬國際移民）下降了9%以上。移民

人口占比較高的國家有加蓬（19%）、赤道幾內亞（16%）、塞舌耳（13%）和利比亞（12%）。

2020年移民人數排名前20位的非洲國家



來源：UN DESA, 20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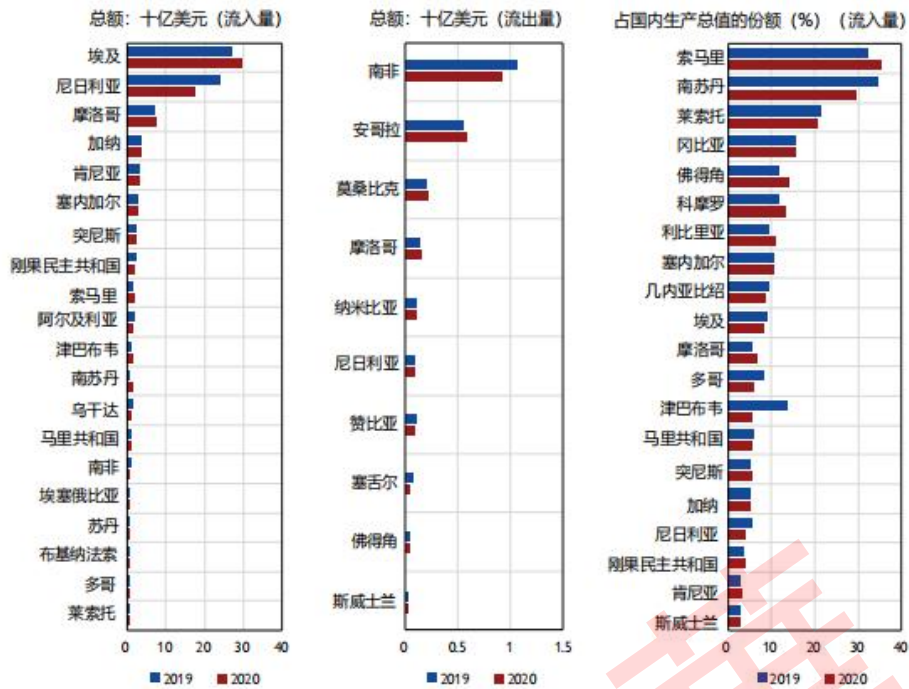
注1：用來計算遷入和遷出移民百分比的人口規模基於聯合國經社部（UN DESA）對一國總人口的統計，其中包括外國出生人口。

注2：“遷入移民”指居住在該國但出生在其他國家的移民。“遷出移民”指出生在該國但在2021年住在出生國以外地區的移民。

疫情初，大多數非洲國家都頒佈了一系列疫情相關的國際旅行限制。不過到2021年中旬，該地區大多數國家都停止實施限制措施。相較於國際旅行限制，疫情期間非洲國家較少實施國內流動限制。

埃及、尼日利亞、摩洛哥、加納和肯雅是非洲前五位僑匯接收國。僅埃及和尼日利亞兩國的僑匯流入量就超過150億美元，占該地區僑匯流入總額的56%。從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看，前五位僑匯接收國是索馬里（35%），其次是南蘇丹（30%）、萊索托（21%）、岡比亞（16%）和佛得角（14%）。

2019年和2020年非洲前20位侨汇接收国和来源国



来源: World Bank, 2021.

如上圖所示，南非和安哥拉是該地區的主要僑匯來源國。2020年從這兩個國家流出的資金分別約為9.21億美元和5.76億美元。

流離失所是非洲區域移民的一個主要特徵。非洲的大多數難民和尋求庇護者都由同處於該地區的相鄰國家接納。其中，南苏丹是非洲最大的难民来源国（200萬），排名世界第四。剛果民主共和國和索馬里分別為該區域第二和第三大難民來源國。乌干达是该区域最大的难民接纳国，也是世界第四大難民接納國，約有140萬難民居住在該國。

非洲最大規模的新增流離失所發生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大多數是由衝突造成的。在剛果（民主）和埃塞俄比亞，因衝突造成流離失所最為明顯：剛果（民主）有200多萬新增衝突流離失所者，埃塞俄比亞新增衝突流離失所者超過160萬。雖然中非共和國因衝突造成的流

離失所規模沒有那麼多，但流離失所者占全國人口的比例卻最高（約7%）。

索馬里和埃塞俄比亞因災難所致流離失所者人數分別位列第一和第二。在整個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與災害有關的事件進一步加劇危機，尤其在已陷入衝突的國家造成新增流離失所和二次遷移。

西非和中非

大多數來自西非和中非的國際移民是在區域內流動，許多是經濟因素移民，**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推出該區域內更大流動性的措施，促進了該區域內的人口流動。疫情暫緩了推動自由流動的措施安排，移民流量減少了一半，沿著茅利塔尼亞和乍得之間的移民走廊遷移的約5萬名移民滯留在西非和中非。疫情也對貿易和邊境社區的生計產生了破壞性、負面影響。雖然疫情後重新開放了邊境，但疫情使優先事項複雜化，包括與移民治理相關的事項。

一、萨赫勒中部地区危机

近年在自然資源爭奪和貧困等因素驅動下，薩赫勒（Sahel，位於布基納法索、尼日爾和馬里之間）中部地區的暴力事件不斷增加，導致了非洲最嚴重的人道災難之一。

由於當地政府已逐步遷往城市，爭奪自然資源的暴力被農村地區的非國家武裝團體利用。此外，農村地區不同群體間的暴力，如農民和牧民之間圍繞放牧的衝突，使本已不利的人道局勢愈發嚴峻。而氣候變

化的影響，如難以預測的天氣模式和創紀錄的高溫期，也加劇了社群緊張關係和暴力衝突。截至2020年底，薩赫勒中部地區周邊三國約有190萬人流離失所，還有數千人死於暴力。

二、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事件也是造成該區域移民增多的主因之一

在中非和西非，氣候變化導致了長期乾旱和多處降雨，影響了農民和牧民的土地使用模式。越來越頻繁的嚴重乾旱不僅破壞了生計，還迫使許多牧民流離失所。風暴潮和洪水也變得更加普遍，影響了該區域18個國家的二百多萬人，導致牲畜、土地和貨物被毀，並加劇了長期的糧食不安全狀況。

三、暴力导致的流离失所是西非和中非移民的一个显著特征

氣候變化使社區內因水資源和牧場面積減少而出現的緊張局勢愈加嚴峻，爭奪這些自然資源的暴力行為因此也相應增加。尼日利亞的中間地帶以及布基納法索和馬里兩國的邊界——武裝團體已開始利用這種暴力，為當前的緊張局勢推進自身行動。

在乍得湖盆地（地跨尼日利亞、乍得、尼日爾和中非共和國），“博科聖地”等極端組織對平民的襲擊和綁架日益猖獗，同時繼續招募兒童參戰。近年來還出現了新的極端組織，通過與區域內或國際組織建立聯繫進行擴張。他們在西非的擴張一定程度上歸功於走私者和販運網路以及區域內漏洞百出的邊界管理。這些極端組織利用潛在的種族仇恨、貧困和一些農村地區缺乏國家控制等弊病吸引新兵並推進他們的議程，不僅造成流離失所，而且導致死亡，並使乍得湖盆地和薩赫勒地區多年的發展進程倒退，嚴重擾亂了許多人的生活。在中非共和國，每四個人中就有一個是難民或流離失所者。

四、中非和西非女性占移民人口总数比例高

該區域的女性移民的原因很多，包括尋找經濟機會、與家人團聚和希望進一步接受教育的。來自西非移民中有近一半是女性並持續增加。經濟因素依舊是移民的主要驅動力，大多數女性移民依舊受雇於非正規行業，如貿易和家政等。該區域女性移民在移民過程中和抵達目的國後都面臨著挑戰和風險，包括途中的性剝削和暴力、目的國的就業環境不穩定和低工資。

东非和南非

疫情同樣使非洲東部和南部的數百萬移民承受巨大的損失。擁有世界上最大難民收容人口之一的烏干達，在疫情期間暫停了對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的“門戶開放”的移民政策，導致生活在擁擠的難民營和偏遠地區的移民面臨一系列挑戰，難以獲得或無法獲得檢測和治療服務，同時極易感染其他病毒。

疫情對該地區的非常規移民也產生了消極影響。疫情期間從該區域到達歐洲的非常規移民人數有所減少，但2020年中旬之後又再度上升。從非洲之角（又稱索馬里半島，包括埃塞俄比亞、索馬里、厄立特里亞等國）經葉門前往海灣國家的移民人數的減幅較大，在2020年減少了73%；同時數以萬計的非洲之角移民經葉門返回回國。

疫情擾亂了東非的和平進程，從而延長了衝突，加劇了該區域的流離失所現象。在南部非洲，疫情引發了更多的仇外心理，使移民成為替罪羊。無證移民和尋求庇護者及其他移民受到疫情的嚴重打擊，本已

困難的社會經濟條件進一步惡化，許多移民無法獲得相關援助服務，甚至被該區域一些國家針對，尤其是非常規移民。

一、数量可观的劳务移民是东非和南非的一个主要特征

區域內移民數量逐年增長，主要原因是該區域移民勞工數量的增長。東非一體化努力雖面臨挑戰，如《东非共同市场议定书》（EACMP）一直未落實——但人們跨境工作已更容易。2021年6月批准的《有關人員和畜牧季移議定書》在得到“政府間發展組織”（IGAD）成員國的批准和實施後，進一步促進了區域內移民。其他區域經濟共同體，如**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也制定了區域內自由流動方案，進一步促進成員國之間常規的勞務移民。

區域內的非常規移現象也很普遍，包括出於經濟原因的移民。與東非類似，**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內的國際勞工移民數量也在增加，由來自南部非洲的勞務移民組成。北美和歐洲一直是肯雅等東非國家移民的主要目的地。2022年，人數最多的肯雅僑民居住在美國（近16萬人）和英國（約14萬人）。海灣國家也成為越來越多的烏干達、肯雅和埃塞俄比亞移民的主要目的地。該區域的大量僑民帶來了巨額的僑匯流入。繼尼日利亞和加納之後，肯雅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第三大僑匯接收國，2020年收到的僑匯超過30億美元。該區域有大量移民國外的其他國家，如索馬里和烏干達，也躋身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十大僑匯接收國之列。**南非是该区域的主要移民目的国，是非洲最大的侨汇来源国。**

二、恐怖袭击事件激增是造成該區域流离失所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莫三比克，“先知的信徒”組織的暴力襲擊加劇，導致流離失所人數急劇增加。這些極端暴力襲擊使該國北部省份進一步陷入危機。衝突和暴力已導致莫三比克超過50萬人流離失所，其規模在2021年世界新增衝突流離失所案例中排名第四；在東非，一些國家也繼續經歷暴力和間歇性衝突：武裝組織“沙巴布”在索馬里的襲擊，以及政府與該組織之間的武裝戰鬥等，繼續迫使人們離開家園；儘管南蘇丹已在一定程度上恢復穩定，但各地民兵之間的衝突繼續存在；埃塞俄比亞提格雷地區的持續衝突，造成數千人死亡，是導致非洲之角流離失所最大的因素之一，約有170萬人因此而流離失所，其規模繼剛果（民主）和敘利亞之後排列2021年世界第三。

三、东非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来源地之一

南蘇丹是全球第四大難民來源國（超過200萬）。索馬里是該區域另一個多年受衝突和暴力影響的國家，有80多萬難民。東非和非洲之角以及大湖區（坦噶尼喀湖周邊地區）仍是非洲難民的主要來源地，超過500萬來自該地區的難民，該地區同時接納了約450萬難民，其中烏干達接納了140多萬難民，是世界上第四大難民接納國——因為烏干達一直保持著移民開放政策，同時也採用歐美國家的難民框架，受聯合國《移民問題全球契約》影響較大。

東非國家除受到衝突和暴力的困擾，在過去兩年中也經歷了破壞性的災害——包括洪水、乾旱和風暴在內的極端天氣事件正影響該區域的生計，亦導致大量流離失所者。肯雅、埃塞俄比亞、索馬里和南蘇丹受到了幾十年來最嚴重的洪水影響，導致爆發毀滅性的蝗災——這場蝗災在2020年破壞了整個區域的生計。在南蘇丹，災害（尤其是洪水

）在2020年造成了超過44萬新增災難流離失所者。同年，埃塞俄比亞記錄了大約66.4萬名新增災害流離失所者。

非洲南部國家也受到緩發和突發災害的影響。莫三比克至今還在為颶風“伊代”和“肯尼斯”的破壞所困擾，2021年的氣旋“埃洛伊塞”使數十萬人成為人道難民；在坦桑尼亞，最近的洪水也與印度洋海面溫度升高有關，這造成了類似拉尼娜現象的狀況，嚴重的乾旱導致坦噶尼喀湖水位下降。這些氣候影響對移民動因產生了影響，包括與經濟因素有關的影響，而依賴雨水灌溉的地區受到的影響最大。

北非

北非是非洲移民前往歐洲的主要過境地區，來自北非的不同移民路線之間存在很大差異，目前選擇地中海中部路線的人數有所增加。

疫情對北非移民的影響導致了非常規移民模式的改變、強迫的流動停滯、被迫回國和歧視。區域內的移民由於邊境關閉而陷入困境，被地方當局強行遣返，滯留在沙漠中。在“聯合國移民網路”（UNNM）發表聲明呼籲暫停這些措施之後，北非國家開始取消旅行限制，允許滯留移民安全返回。

在該區域大量移民人口的推動下，北非獲得了全球最多的僑匯。特別是來自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等**马格里布国家**的移民，是北非的一個主要特點。欧洲和亚洲是北非移民的两个主要目的地。來自摩洛哥、阿爾及利亞和突尼斯的在歐洲移民總數超過500萬。而亞洲國家，特別是海灣合作委員會（GCC）國家，是埃及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有近100萬埃及移民在沙特，約90萬在阿聯酋，超過40萬在科威特。鑒於其龐大的僑民數量，多年來該區域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僑匯接收地之一，其中埃及僑匯達到每年300億美元，占埃及GDP的8%以上，使其成為全球第五大僑匯接收國。流入摩洛哥和突尼斯的僑匯占其GDP的5%以上。隨著歐盟尋求通過歐盟人才庫和人才夥伴關係等手段增加了該區域的合法移民途徑，作為《歐盟新移民和庇護公約》的一部分，北非將是受益於此新計畫的主要區域之一。

一、北非是大量難民的來源和目的地，衝突和暴力是其主因

十年來，利比亞一直陷入衝突和政治動盪，迫使數十萬人離開家園，嚴重限制了當地人民獲得基本服務的機會。雖然有關用水、衛生和教育的基礎設施等服務成為常規化目標，但是人道援助經常受阻。2020年，利比亞有超過27.8萬人因衝突和暴力而流離失所。雖然2020年10月簽署的停火協議使得敵對行動有所減少，但仍有超過一百萬人等待人道援助。

蘇丹也繼續處於複雜的政治局勢之中。科爾多凡和達爾富爾等地區的暴力衝突使許多人流離失所。蘇丹也繼續接納世界上最大的難民人口之一：大部分來自南蘇丹，還有來自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里亞等鄰國的難民，以及更遠的葉門和敘利亞等衝突國家的難民。蘇丹目前接納了約100萬難民和230多萬名流離失所者。

二、北非移民面臨着眾多的保護挑戰，尤其是女性

除了言語和身體上的攻擊外，北非移民還遭受了剝削並處於惡劣的生活條件。在法治薄弱的國家，以及在民兵或偷運者和販賣者逍遙法外的地方，存在著重大保護的挑戰。例如在利比亞，移民經常被關押在

非正式拘留中心，在過度擁擠、衛生條件差並且缺乏安全飲用水的環境下遭受到種種虐待。很多移民則被關在倉庫或非官方拘留中心，任由偷運者和販賣者擺佈。然而，這不僅限於被拘留的移民；城市中的許多人也面臨著獲得基本需求和服務的障礙，女性情況更為嚴重，遭受性剝削的風險也在增加，生活條件困難、貧窮。

三、北非是非洲移民前往歐洲的主要過境和出發地區

數以萬計的非常規移民通過兩條主要路線從北非到達歐洲：地中海中部路線（從利比亞和突尼斯到義大利）和地中海西部路線（從摩洛哥和阿爾及利亞到西班牙）。即使疫情期間，通過地中海中部和西部路線入境歐洲的人數仍在增加——通過這兩條路線抵達歐洲的人數增加了86%（從4.1萬人左右人增加到近7.7萬人）！地中海中線以突尼斯人最多、地中海東線以摩洛哥人最多。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到達利比亞的移民主要沿著兩條路線偷渡：通過尼日爾、馬里和阿爾及利亞的**西線**，以及**東線**（主要是東非移民通過蘇丹和乍得）。

亞洲

作為46億人口的大洲，2020年源自亞洲的國際移民構成世界移民總人數的40%以上（1.15億），超過一半的國際移民（6900萬人）居住在亞洲國家，與2015年相比有顯著增長（當時約6100萬人）。其中歐洲人在該地區移民群體中所占比例最高，包含來自前蘇聯歐洲領土範圍但目前生活在中亞的移民；來自非洲的移民人數也在不斷增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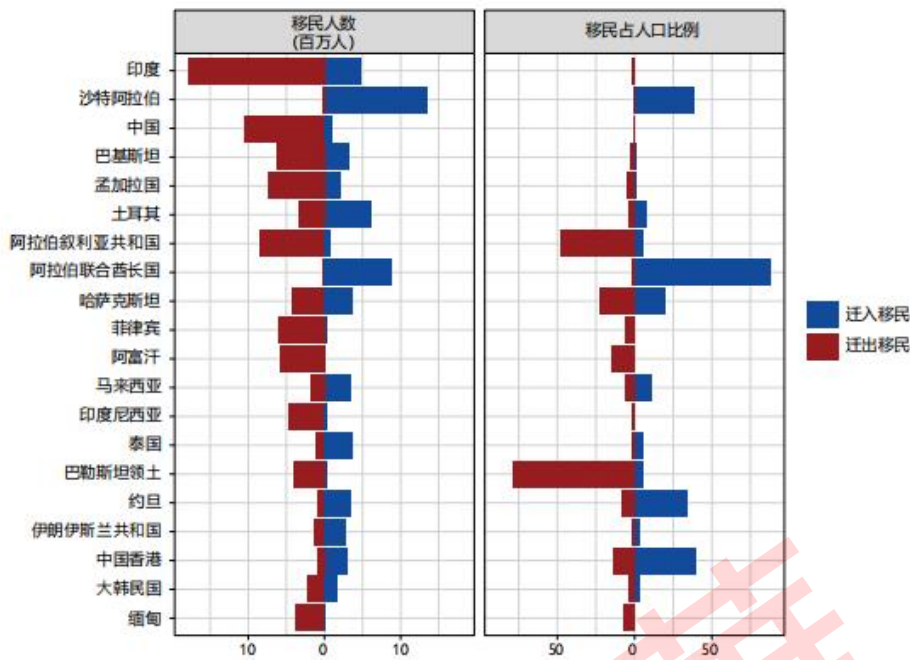
在過去的二十年，生於亞洲、但移民至北美和歐洲的人口也有大幅增長。截止2021年，前往北美的亞洲移民數量達到1750萬，與2015年1730

萬的人數相比略有增加；在歐洲，來自亞洲的移民從2015年約2000萬人，增加到2020年的2300萬人左右。前往北美和歐洲的亞洲移民也推動了其他地區的亞洲移民數量的顯著增長，有4600萬亞洲移民生活在全球其他區域。

亞洲兩個人口大國：印度和中國生活在國外的移民絕對數量最多——但這些龐大的移民數僅占印度和中國總人口很小的一部分。來自中國的移民數量是繼來自印度、墨西哥和俄羅斯之後，世界第四大移民群體。超過200萬來自中國的移民生活在美國，亞洲移民居住在美國數量比較多的還有來自印度、菲律賓、越南、孟加拉和敘利亞等。

在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GCC)，移民在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高。例如，2020年阿聯酋人口中88%為移民，科威特近73%的人口為移民，卡塔爾77%的人口為移民，巴林的移民也占總人口的55%。許多移民來自非洲、南亞（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和尼泊爾）及東南亞的印尼和菲律賓。

2020年移民人数排名前20位的亚洲国家/地区



来源: UN DESA, 2021.

注1: 用来计算迁入和迁出移民百分比的人口规模基于联合国经社部 (UN DESA) 对一国总人口的统计, 其中包括外国出生人口。

注2: “迁入移民”指居住在该国但出生在其他国家的移民。“迁出移民”指出生在该国但在2021年住在出生国以外地区的移民。

疫情期間，幾乎所有亞洲國家都全年實施國際旅行限制，包括篩查入境者，直至2022年底，隔離政策才逐漸寬鬆，進入2023年才完全放開旅行限制。

印度和中國是亞洲收到僑匯最多的國家，2020年超過1400億美元。其他主要僑匯接收國包括菲律賓、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從占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比來看，收到僑匯占比最高的國家有黎巴嫩（33%）、吉爾吉斯（29%）、塔吉克（27%）和尼泊爾（24%）。兩個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阿聯酋和沙特是亞洲最大和第二大僑匯來源國：2020年，來自阿聯酋的僑匯達到430億美元；來自沙特的僑匯更上升至340億美元。中國、卡塔爾和韓國也是亞洲重要的僑匯來源國。

敘利亞和阿富汗是世界主要的難民來源國。敘利亞難民主要被土耳其（超過360萬）、黎巴嫩（約90萬）和約旦（約70萬）接收；阿富汗難民主要被巴基斯坦和伊朗接收。2021年盟軍撤離和塔利班捲土重來導致來自阿富汗的難民數量大幅增加；針對羅興亞人的暴力，導致緬甸產生的難民人口在該區域位列第三，在全球位列第五，多數難民被孟加拉接收。伊拉克、巴基斯坦和伊朗等難民來源國自身也接收了大批難民。

亞洲最嚴重的新增流離失所主要是由災害造成的，例如，截至2020年底，菲律賓有超過400萬的流離失所者。災害包括由季風、山體滑坡和強烈旋風造成的洪水，在孟加拉（超過400萬人）、印度（近400萬人）和越南（約100萬人）引發了大規模的流離失所。

衝突也導致亞洲出現了大規模的新增流離失所者，其中敘利亞的人數最多（近200萬人）。其他因衝突所致嚴重流離失所的國家包括阿富汗（40.4萬人）和葉門（14.3萬人）。**也門的人道危機是全球最嚴重的危機之一**：2020年2月至9月的兩個密集雨季使當地二十多萬人流離失所，更加劇了該國現已存在的人道危機。

中东

該區域經歷了疫情帶來的重大挑戰，加劇了衛生脆弱性，惡化了經濟狀況，數以萬計移民更因此被迫返回來源國。中東地區的流離失所者和難民普遍受到了疫情的影響，在沙特和葉門等國的非非法移民令人擔憂。在海灣國家，疫情導致大量公司被迫歇業，許多移民也失去了工作或遭遇工資拖欠，這影響了他們滿足基本需求或償還債務的能

力，許多人被迫返回他們的來源國。將勞工移民與其雇主聯繫起來的“卡法拉制度”（Kafala system）加劇了海灣地區許多勞工移民的工作和生活困難，他們經常會被剝削的雇主纏住。

一、冲突和暴力是导致该地区流离失所的最大因素

伊拉克的停火協議導致流離失所人數下降，但敘利亞和葉門新的衝突再度導致大量民眾逃離家園。2020年敘利亞政府軍在伊德利蔔省的攻勢導致了自戰爭開始以來最嚴重的流離失所事件。與此同時，繼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持續數月的緊張局勢之後，2020年9月雙方在納戈爾諾-拉巴赫地區發生的為時兩個月的衝突導致多人死亡，數千人流離失所，這是自1994年休戰以來兩國之間最大的衝突升級。雖然阿塞拜疆、亞美尼亞和俄羅斯其後簽署了停火協議，但仍有許多人流離失所，仍有數萬人需要人道援助。

二、该地区近年气候变化导致的流离失所人数急剧增加

中東一些國家很容易受到氣候變化和天氣相關災害的影響，對於已處於衝突中的國家來說，災害加劇了持續的人道危機。2020年，葉門因洪水而流離失所的人數占一百萬新增流離失所者的近四分之一，首次超過了衝突和暴力因素。葉門最近面臨的雙重挑戰——大規模災難和衝突——凸顯了該國人道主義危機的複雜性。

約旦、黎巴嫩和敘利亞等國家近年來也頻發洪水，加劇了難民和流離失所者生活的艱難狀況。此外，由沙漠化等緩慢發生的災害，比如敘利亞，長期乾旱給當地人民的生計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也成為引發該國內戰的一系列複雜因素之一。

三、中东是全球接纳难民和寻求庇护者数量最多的來源地之一

叙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难民来源国，全球有近700萬難民來自該國。該區域的其他國家，如伊拉克，也有大量流離失所者。此外，中東也是最大的難民目的地之一，難民基本來自該區域內的國家，黎巴嫩和約旦是全球五大難民接納國之一（占全國人口的比例）：黎巴嫩每8個人中就有1人是難民；約旦每15人中有1人是難民，多數來自敘利亞或巴勒斯坦。在“聯合國巴勒斯坦領土難民救濟和工程處”的授權下，約570萬巴勒斯坦難民被接納，使中東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難民接納地之一。

中亚

由於疫情，嚴重依賴僑匯的中亞地區僑匯流入量大幅下降。主要目的國俄羅斯的封城和旅行限制，該區域的許多移民勞工失去了工作，工資被大幅削減，或被迫無薪休假。收入的損失產生了巨大的經濟影響，特別是對吉爾吉斯和塔吉克等嚴重依賴僑匯的國家。2020年，流向歐洲和中亞的僑匯下降了近10%，從俄羅斯流向塔吉克和吉爾吉斯等國的僑匯分別下降了37%和17%——這是因俄羅斯受疫情影響所致。流入中亞國家的僑匯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該區域內的移民模式。俄羅斯是該區域移民的最大目的地，也依然是中亞國家僑匯的最大來源國。

一、中亚近年经历了重大灾害事件，数以万计的人因此流离失所

隨著該區域的溫度上升，近年的一些突發災害與氣候變化的影響關係愈加緊密。僅在2020年，烏茲別克和哈薩克的暴雨和嚴重的洪水分別導致了7萬和3.2萬的新增流離失所者。預計環境變化將增加這類災害的頻率和強度，並使該區域的流離失所現象更為嚴重。相較於在旱地生活的人，在草原上生活的人面臨著更大的風險，更容易受到暴雨和洪水帶來的破壞的影響。這些災害對生計構成威脅，隨著嚴重風暴、乾旱、野火、洪水和泥石流的加劇，農業生產的風險越來越大，造成該地區大規模的糧食不安全。

二、中亚大多数移民迁往俄罗斯，是该区域移民最重要的目的国

截至2021年，近500萬來自中亞的移民生活在俄羅斯。其中大部分（超過250萬）的移民出生在哈薩克。出生在烏茲別克的移民是在俄移民的第二大群體（超過100萬）。俄羅斯國際移民中，約有40%來自中亞，其中大多數是勞工移民，他們因高失業率離開自己的國家，在俄羅斯尋找更好的薪酬和工作條件。哈薩克在石油等資源的驅動下經濟持續增長，也成為該區域的另一個移民目的國。

三、中亚移民大多数是男性，女性越来越多作为劳工移民到俄罗斯

雖然傳統上該區域的勞工移民多為男性，但近年來，在俄羅斯工作的女性勞務移民也越來越多。中亞的女性勞工多數來自吉爾吉斯，在俄羅斯的吉爾吉斯移民中，大約有51%是女性。大多數人在服務行業工作，如餐飲業和家庭傭工。近年也有越來越多的女性移民來自該區域的其他國家，如塔吉克，但比例較小。在俄羅斯的所有塔吉克移民中，女性約占41%（占全世界塔吉克斯坦移民的42%）。

缺乏經濟機會或尋求更高的工資和更好的工作條件是大多數移民遷出中亞的原因。然而，其他因素（如強迫婚姻、早婚和奴役性婚姻）也起著一定的作用。在吉爾吉斯，被稱為“綁架新娘”的習俗驅使大量女性移民，借此來逃避強迫婚姻和早婚。雖然勞務移民幫助其中一些國家通過輸出多餘的勞動力來減少失業，從而從僑匯流入中受益，但這也使許多家庭關係緊張，導致家庭破裂。

东亚

一、疫情增加了该区域内部和对来自该区域移民的仇外心理和歧视，而疫情限制對該區域移民和流动产生了广泛、深遠的影响

在世界其他地區發生的針對中國移民及其後代的歧視和排外事件得到大量報導。有時被認為是華裔的人遭到人身攻擊，因為他們越來越多地被錯誤地與疫情傳播聯繫在一起。另一方面，在該區域早期的疫情應對措施中，存在對移民的歧視性做法，例如，隔離要求、口罩配給、社會福利提供等措施都是以國籍為唯一依據。

此外，封城政策和旅行限制使許多移民無法返回其就業國。例如疫情期間日本禁止非本國居民和永久居民、以及持有工作許可證但因度假或工作而暫時離開該國的人入境，這些限制也中斷了日本等國近來通過進一步增加該國的移民勞工數量來填補勞動力缺口的嘗試。同樣到達韓國的勞工移民也有減少。

二、逾千万中国人生活在海外，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国群体之一，并且中国仍然是侨汇的主要接收国之一

截至2021年初，約有1000萬中國移民在海外，其中大量人口生活在加拿大、義大利、 澳大利亞、韓國、日本、美國和新加坡。中國龐大的僑民意味著該國占全球僑匯（7020億美元）的很大份額（近9%）。2020年，流入中國的僑匯僅次於印度，該國收到近600億美元僑匯。除了作為最大的僑匯接收國之一，中國還是亞洲第三大僑匯來源國（超過180億美元），僅次於阿聯酋和沙特伯，這反映在中國的國際移民數量也在不斷增加。

三、东亚是全球数量最多的国际学生的来源地之一，也成为其它区域学生的重要目的地

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國際學生來源國，大部分居住在北美。在2019至2020學年，估計約有37.2萬名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其中研究生推動了近期的大部分增長。該區域有大量國際學生的其他目的國還有韓國和日本。

東亞也成為國際學生的一個主要目的地。中早就實施了吸引國際學生的政策和計畫，在過去幾年內，該國已成為亞洲最大的留學目的地，擁有近50萬名國際學生，大部分來自亞洲的其他國家和非洲。在疫情前，韓國和日本的國際學生人數也在上升。截至2020年4月，超過15.3萬名國際學生註冊在韓國的大學。與中國一樣，韓國的大多數學生來自亞洲的其他國家。

四、近年该区域经历了一些大规模的因灾害引起的流离失所

2020年，中國的新增災害流離失所者，大多數發生在洪水季節。雖然土地使用和洪泛區的建設等因素造成了最近的流離失所，但氣候變化和多變也起了作用。近年來，隨著中國熱浪和強降雨的加劇，自然災害變得不可預測，極具破壞性。最近的洪水是由極端降水引起的，例如，中國南部降水的平均強度以及降水的次數和持續時間都處於幾十年來最高水準。該區域的其他國家，日本最近幾年也經歷了大規模的流離失所。2020年，日本約有18.6萬新增災害流離失所者。

南亞

疫情促使數以百萬計的勞工移民返回該區域，同時也推動了從城市中心遷往農村的大規模流動。例如，印度從2020年5月開始大規模疏散和遣返其國民。被官方稱為“致敬印度”（Vande Bharat）的任務最初幫助來自137個國家的50多萬滯留移民返回家園。截至2021年，超過300萬印度移民被遣返。該區域的其他國家，如尼泊爾，也有大量滯留海外的公民返回。疫情同時也扭轉了該區域內部的移民模式，在印度尤其明顯，數百萬城市勞工移民返回農村。旅行限制嚴重阻礙了該區域移民勞工的調集，包括印度和孟加拉在內的大型移民勞工來源國的外流人數急劇減少。

一、災害是南亞的重要特征，導致數百萬人流離失所

2020年，南亞是受災害影響最嚴重的區域之一。該區域有930萬新增災害流離失所者，占全球新增災害流離失所者總數的三分之一。南亞的平均氣溫在過去幾十年裏持續上升，是最易受到氣候變化影響

的地區之一，包括氣溫上升。該區域受到極端和頻發的天氣事件、暴雨和海平面上升的影響。該區域的暴雨每年都影響南亞各國，強烈的風暴和颶風也因氣候變化而加劇。颶風“安潘”導致孟加拉和印度等國數百萬人疏散。該區域洪水所致流離失所風險最高，而且該區域的許多人也容易受到氣溫持續升高的影響。

二、勞務移民是南亞另一個重要特征，僑匯流入量在世界排名前列

失業和工資較低促使大量南亞人離開該區域，到海灣國家工作。海灣國家的大量移民來自印度和孟加拉，其中大多數是勞工移民。目前有350萬印度人和100多萬孟加拉人居住在阿聯酋；沙特也是超過250萬印度移民和超過100萬孟加拉移民的目的國。由於印度的國際移民人口位列世界第一，也是全球最大的僑匯接收國。在2020年，該國收到830億美元的僑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也躋身世界十大僑匯接收國之列，2020年分別收到260億美元和220億美元僑匯，超乎預測地大幅增加。

三、由於該區域一些國家的衝突曠日持久，南亞也是大量難民的來源地和目的地

阿富汗經歷了三十多年的衝突，截至2020年底共有260萬難民，是世界上第三大跨境流離失所人口的來源國，85%的難民被巴基斯坦和伊朗接納。該國衝突導致了大量的流離失所者，約有350萬阿富汗人因衝突和暴力流離失所，雖然正在進行談判和停火，但仍是新增衝突流離失所者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該區域的其他幾個國家，如巴基斯坦、伊朗和孟加拉，是也世界十大難民接納國之一，共接納了全球13%的跨境流離失所者。

东南亚

一、东南亚的移民和流动受到了疫情的严重干扰，为控制疫情而采取的措施对移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截至2021年6月初，該區域已記錄了近3500萬新冠肺炎的確診病例，其中菲律賓受影響最嚴重。該區域的所有國家都制定了一系列的旅行限制措施，包括隔離政策、核酸檢測和關閉邊境。一些國家還對國內旅行和流動採取了措施，如暫停公共交通和限制國內航班。各種限制使該區域移民流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停滯期。

二、近年的宗教和种族紧张局势驱动了该区域规模最大的跨境流离失所

羅興亞是世界上最大的流離失所的無國籍人口。由於針對羅興亞人的暴力事件激增，許多人逃離緬甸，大多被孟加拉接納。在2020年11月緬甸大選後的幾個月裏，記錄在冊的流離失所人數進一步增加。緬甸軍方於2021年2月接管政府後，在幾個邦再次引發了與非國家武裝團體的衝突，並使2015年簽署的全國停火協議面臨風險。2020年底，孟加拉接納了超過86萬名難民，其中大多數是羅興亞人。孟加拉超過一半的羅興亞難民是兒童。該區域的其他國家，如馬來西亞，也接納了相當數量的難民，其中許多是羅興亞人。

三、东南亚极易受到环境灾害的影响，每年也会造成大量的流离失所

該區域發生的重大災難，以菲律賓、越南和印尼等國受影響最大。僅菲律賓在2020年就有440萬名災難流離失所者，而越南和印尼分別有130萬和70多萬名災難流離失所者。一些災害事件，包括颱風季節、火山噴發、旋風、風暴和洪水，導致該區域一些國家的人們被迫離開家園。在菲律賓，疏散造成了大量的流離失所者。2020年，菲律賓、越南和印尼共有600多萬人流離失所，這三個國家都是世界上災難所致流離失所人數最多的十個國家之一。

四、该区域的劳务移民是流動的一个关键因素

由於菲律賓在世界各地都有大量的勞工移民，是世界上最大的僑匯接收國之一。2020年，菲律賓的僑匯流入量達350億美元（占GDP近10%），僅次於印度、中國和墨西哥，是全球第四大僑匯接收國。美國是菲律賓最大的僑匯來源國（近40%），菲律賓的其他僑匯來源國包括日本、新加坡和沙特，這反映了菲律賓移民勞工的主要目的地。2020年越南也躋身全球十大僑匯接收國之列，僑匯收入為170億美元。

五、受偷渡网络驱动，来自东南亚的非常规移民现象十分普遍

整個東南亞地區的國家都是非常規移民的來源國、過境國和目的國。非常規移民與常規移民同時發生，兩者動機相似，這體現在移民的主要遷移路線上。在該區域內部，移民偷渡發生在兩條主要路線上：**馬來西亞**是來自菲律賓、孟加拉和印尼移民的主要目的國；而來自緬甸、柬埔寨和老撾的移民主要前往**泰國**。販運移民的情況也較為常見，包括泰國和馬來西亞在內的較富裕國家往往是目的國。該區域以外的其他國家也是東南亞被販運

移民的主要目的國。亞洲75%的人口販運受害者來自東南亞。大量的受害者因勞動和性剝削而被販賣。

歐洲

約有8700萬國際移民居住在歐洲，與2015年的7500萬國際移民相比，增長了近16%。歐洲的國際移民中超過半數（4400萬）是出生於歐洲、但生活在出生國以外的其他歐洲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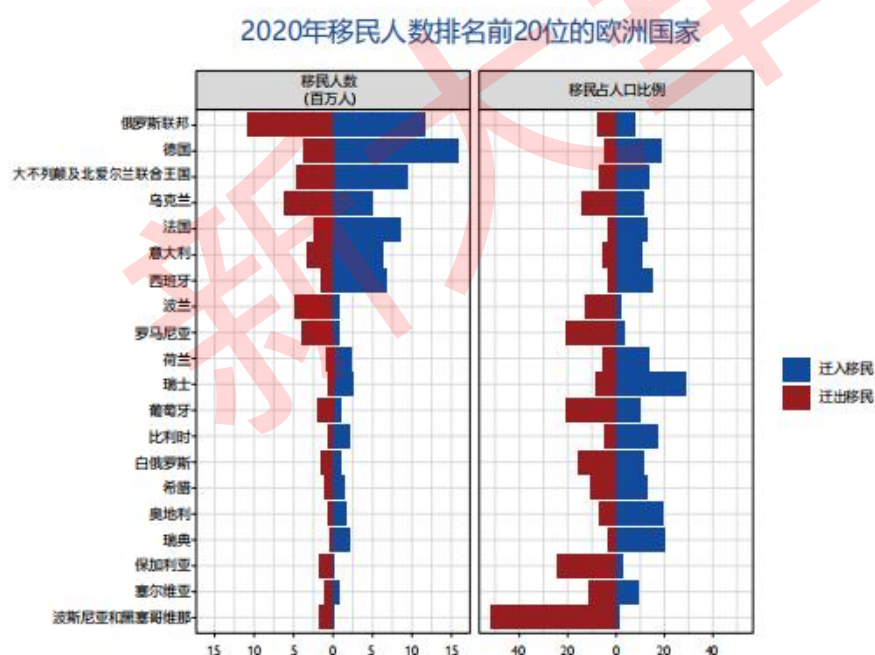
1990年，生活在歐洲以外的歐洲人與生活在歐洲的非歐洲人的數量大致相當。之後，居住在歐洲以外的歐洲人數量在過去三十年裏顯著下降，最近幾年才恢復到1990年的水準。目前約有1900萬歐洲人居住在歐洲大陸之外，他們主要生活在亞洲和北美地區。

東歐國家（如俄羅斯、烏克蘭、波蘭和羅馬尼亞）擁有該地區的最大遷出移民人口。俄羅斯有近1100萬移民，是歐洲所有國家中遷出移民人口最多的國家。繼俄羅斯和烏克蘭（600萬）之後，波蘭（480萬）和英國（470萬）的移民人口在歐洲分別位居第三位和第四位。波黑的遷出移民占其總人口比例最高，其中許多人是在前南斯拉夫解體期間離開的。葡萄牙、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有著悠久移民歷史的國家，在國外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也很高。

德國現有1600萬移民，是歐洲國家中外國出生人口最多的國家。2015年至2020年間，德國的移民人數增加了500多萬。其中，最大的遷入移民群體來自波蘭、土耳其、俄羅斯、哈薩克和敘利亞。英國與法國人口中，分別包括940萬和850萬外國出生人口。在北非國家出生的移

民構成了法國最大的外國出生人口。英國移民人口大多來自印度、巴基斯坦和波蘭。

西班牙和義大利的外國出生人口約為680萬和640萬，是歐洲第五和第六大最受歡迎的移民目的地。西班牙和義大利的移民來自歐洲其他國家，例如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或北非和拉美國家，如摩洛哥、哥倫比亞和厄瓜多爾等。來自烏克蘭、哈薩克和烏茲別克等前蘇聯國家的移民構成歐洲最大的移民走廊。從移民占人口的比例來看，在該地區排名前二十位的移民國家中，瑞士移民人口比例最高（29%），其次是瑞典（20%）、奧地利（19%）和德國（19%）。



來源：UN DESA, 2021。

注1：用來計算遷入和遷出移民百分比的人口規模基於聯合國經社部（UN DESA）對一國總人口的統計，其中包括外國出生人口。

注2：“遷入移民”指居住在該國但出生在其他國家的移民。“遷出移民”指出生在該國但在2021年住在出生國以外地區的移民。

法國在歐洲流入的僑匯份額最大，其次是德國。但流入這兩個國家的大部分資金不是家庭轉帳，而是與在瑞士工作、並居住在法

國和德國的跨境工人有關。占國內GDP比例最大的僑匯接收國是莫爾達瓦（16%）、黑山（13%）和烏克蘭（10%）。**法國是歐洲最大的僑匯接收國**，2020年收入約250億美元。同年瑞士以280億美元的僑匯成為歐洲最大的僑匯來源國，其次是德國、俄羅斯、法國和盧森堡。

德國是歐洲接納難民和尋求庇護人數最多的國家

在世界最大的難民接納國中，德國排名第五。德國大部分難民來自敘利亞，占約50%。法國和瑞典是歐洲第二和第三大難民接納國，分別有超過43.6萬和24.8萬難民。目前烏克蘭是歐洲最大的難民來源國，人數超過百萬。歐洲其他主要來源國還有俄羅斯（約5.3萬人）和克羅地亞（約2.3萬人）。

除烏克蘭外，歐洲大多數新增流離失所是災害而非衝突的結果。克羅地亞因災害而流離失所的人數最多（4.2萬人），該國爆發有史以來最大的地震，達6.4級，導致一萬多所房屋無法居住，使得4萬人長期流離失所。受災害影響導致新增流離失所者較多的國家還有希臘（1.3萬人）、法國（1萬人）和西班牙（近8000人），主要災害原因是風暴和嚴重洪水。

东南欧和东欧

一、疫情之後，該區域部分國家進一步強化了移民政策

疫情對歐洲各地移民勞工的影響也導致大量移民回流到該區域。東南歐和東歐的移民一直以來是**遷出而非遷入**，但疫情爆發在很大程度上終止甚至逆轉了這一狀況。該區域的許多移民，如來自保加利

亞和塞爾維亞等國的移民，因失業、缺乏社會保障或希望與家人團聚等原因，最終都選擇了回國。僅在2020年3月至5月期間，約有五十多萬保加利亞人回國。這個現象在羅馬尼亞也很明顯，在2020-21年，大約有一百萬羅馬尼亞人選擇了回國。

二、俄罗斯是国际移民的主要来源国及目的國

俄羅斯在全球國際移民的十大來源國和目的國中均排名前列。該國有1100萬海外僑民，是繼印度、墨西哥之後位居世界第三移民人數最多的國家。大多數僑民居住在**独联体自由贸易区**（CISFTA）成員國中，如哈薩克、白俄羅斯、烏克蘭和烏茲別克，以及美國和德國等國。另有約1200萬國際移民居住在俄羅斯，因此俄羅斯也是繼美國、德國和沙特之後的全球第四大移民目的地。俄羅斯的國際移民主要來自烏克蘭（超過300萬人）、哈薩克（超過250萬人）和烏茲別克（約100萬人）。由於該國有大量國際移民，俄羅斯也是全球十大僑匯來源國之一。

三、冲突導致跨境流离失所是该区域移民的主要特征

烏克蘭仍是該區域最需要人道援助的地區，2021年約有340萬人需要人道援助（烏克蘭戰爭截止2023年的最新數據尚未統計，這裏沿用2021年國際社會統計數據—編者注）。當地的人民財產和生計持續處於不安全狀態並受到損害。衝突也迫使數百萬烏克蘭人離開本國。

四、西巴尔干地区是亚洲、非洲非常規移民重要的过境区

近年，數以萬計到達北歐或西歐的移民通過西巴爾幹路線抵達波黑等國。雖然其中一些人是為了脫離當地惡劣的經濟條件，但也

有許多人是為了逃避衝突或不安全，比如來自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伊朗和敘利亞等國的移民。到達波黑的大多數移民是單身男性，移民群體也包括無人陪伴和失散的兒童以及有孩子的家庭。該區域的一些國家，如阿爾巴尼亞和北馬其頓，也成為移民的主要過境區。這些移民在偷渡者的幫助下通過以上國家踏上危險的旅程。西巴爾幹地區非常規移民人數的增加也加劇了當地社區的緊張局勢，同時也被用作地緣政治工具。

北歐、西歐和南歐

一、疫情对该区域的移民和流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改变了一些国家公众对移民的态度，影响了劳动力流动，同时也影响了移民的權利

疫情期間，移民對許多經濟體的重要行業做出了貢獻，這似乎改變了公眾的態度，尤其是在反移民情緒高漲的國家。例如，2020年英國當時的民調顯示，大多數公民（62%）贊成自動給予幫助應對疫情的護理人員公民身份；50%的人支持給予其他前線工人公民身份，如在超市和農業領域工作的工人。與五年前的民調相比，這是一項重大轉變。而在瑞士等其他國家，受訪者對外國人也表現出積極的態度，移民在疫情期間感受到社會支持。與其它地區一樣，旅行限制影響了勞動力的流動，對該區域的經濟反彈產生了廣泛影響。為了解決勞動力短缺問題，特別是在農業、衛生、社會福利和運輸等重要領域，一些歐盟國家採取了措施，為已經在該區域的第三國國民進入其勞動力市場提供便利。另一方面，行動限制也對移民的權利產生了不利影響。某些情況下，移民的家庭團聚被迫中止，一些國家暫停了申請登記和提交。然而，北歐、西歐

和南歐國家也實施了旨在幫助移民應對疫情的措施，包括暫時使沒有證件的移民身份合法化，並將他們納入當地醫保體系。

二、非常規移民是該區域移民的主要特征，持續影響該區域國家的移民政策制定和成為政治話題

截至2023年初，歐盟仍在就新的《歐盟移民和庇護公約》進行談判，除其他領域外，該公約旨在通過加強與移民來源國和過境國的夥伴關係；改善歐盟外部邊境的管理；促進責任的平衡分擔來應對非常規移民的挑戰。西班牙、義大利、馬爾他和希臘等前線國家在新公約中呼籲加強團結，以緩解他們面臨的非常規移民湧入的壓力。雖然通過東地中海等移民路線抵達的移民人數有所下降，但橫跨西地中海和大西洋前往西班牙的移民人數卻出現了大幅增長。2021年初，來自摩洛哥的數千移民抵達西班牙在非洲飛地休達，移民面臨的挑戰以及所經受的痛苦再次受到國際社會關注。為應對這一移民浪潮，西班牙當局隨即在該市部署了軍隊，同時將數以千計的移民強行送回摩洛哥。

三、區域內一些國家近期對庇護政策的提案和修改是有爭議的，公眾對這些政策可能對尋求保護者產生的影響表示擔憂

丹麥《外國人法》（Aliens Act）的修訂導致尋求庇護者被強行遣往不同的國家接納處理，被視作一項忽視國際法規定責任，未能保護弱勢群體的舉措。新法把庇護和國際保護擴展到歐洲以外的“夥伴國家”，這一措施可能使《歐盟移民和庇護公約》的談判進一步複雜化，而該公約的一系列條款原本旨在促使歐盟成員國更加團結地解決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的問題。該區域的其他國家，如英國，也在2022年提出了類似的新移民計畫，如在“安

全國家” 外包處理移民申請，這些法律都涉嫌違反了1951年《難民公約》和《難民問題全球契約》的精神，嚴重限制了庇護。聯合國因此發出警告：如果實施這些措施，將破壞國際保護體系。

四、各种突发灾害也使该区域成千上万居民流离失所

2020年的火災使得希臘、西班牙和法國新增2.3萬流離失所者。2020年也是歐洲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年，每個季節的溫度都比以往高。同年，格洛麗亞風暴導致法國和西班牙數以千計的人流離失所。在西班牙，許多人失去了生命。其他天氣事件，如丹尼斯風暴，導致英國一千多人流離失所；年底法國部分地區的洪水導致近五千人流離失所。2020年末貝拉風暴襲擊了這兩個國家，導致超過三千人流離失所。2021年初，歐盟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新的氣候適應戰略，闡述了歐盟將如何適應不可避免的氣候變化影響，並在2050年之前成為具有氣候適應力的區域。到2021年中旬，整個歐洲在夏季都出現了類似的流離失所狀況，其主要原因是嚴重的火災、風暴和洪水。

五、該區域非常規移民，女性占很大比例

在2018-2020年期間，通過海路和陸路跨越地中海東部、中部和西部路線以及非洲西部大西洋路線抵達歐洲的7.7萬人中，婦女占20%，其中70%的婦女通過**东地中海路线**到達歐洲（大部分到達希臘）；21%通過**西地中海和西非大西洋路线**到達西班牙；9%通過**中地中海路线**到達義大利和馬爾他。

與前幾年相比，近年進入歐洲的女性非常規移民人數驟減，這與受疫情影響而導致移民人數整體下降的趨勢一致。2020年，在歐盟外

部邊境被逮捕的移民中婦女移民占比不到十分之一，而在一年前，女性占比高達四分之一。同時，該區域的女性移民勞工因為移民和婦女的雙重身份仍然受到所謂的“雙重歧視”。一些國家的移民女性的失業率高於男性，在意大利、希臘和葡萄牙等南歐尤其如此。與本地出生的女性相比，移民女性不僅失業率更高，而且往往被迫從事低技能職業，如家政服務等。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移民的主要特徵是遷移到北美。現有超過2500萬移民向北遷移並居住在北美。生活在北美地區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人口1990年僅1000萬左右，歐洲還有500萬來自該地區的移民。這個數字自1990年以來，生活在歐洲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移民人數已經增長了三倍以上。在其他地區，如亞洲和大洋洲，來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移民非常少（分別為40多萬和20多萬移民）。

來自其他地區、生活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移民總數保持相對穩定，約有300萬。這些人主要由歐洲（其人數在這一時期略有下降）和北美（其人數有增加）的移民組成。2020年，居住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歐洲移民和北美移民人數分別為140萬和130萬。同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內部約有1100萬移民流動。

目前委內瑞拉的局勢對該地區的移民流動產生了重大影響，該國擁有世界最大的流離失所和移民危機之一。截至2021年6月，約有560

萬委內瑞拉人離開了該國，大約85%（約460萬）的移民移居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其他國家。

一、疫情對該區移民流動影響深遠，也加劇了過境移民的脆弱性

疫情期間，來自該區域的北上移民人數減少。許多移民推遲行程或被滯留在途中。疫情限制也迫使一些移民踏上更危險的旅程，包括通過**達里恩峽谷**（Darien Gap，被公認為全球最危險的移民路線之一）。儘管如此，該區域人口走私依然猖獗。除了擾亂區域幾個國家的庇護程式和其他再安置計畫外，流動限制使許多移民不得不住在衛生條件堪憂的臨時營地，食物和水的供應均有限。在巴拿馬的達連省，由於周圍幾個國家關閉了邊境，許多非常規移民，包括來自區域外的非洲人、古巴人和海地人，都被迫滯留在那裏。該區域國家向移民提供了一些援助，為滯留移民的返回和遣送提供便利，並讓他們接種疫苗。疫情還對一些關鍵行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例如旅遊業。該區域包括加勒比地區國家都非常依賴旅遊業。

二、該區域移民北遷仍是主要趨勢，但由於加強移民管控，來自中美洲北部地區的混合移民具有挑戰和不确定性

來自和經過中美洲的移民受到一系列複雜因素的驅動，如經濟、暴力犯罪和氣候變化等，許多人北遷是為了追求經濟和人身安全。截止目前，來自洪都拉斯、瓜地馬拉和薩爾瓦多的近90萬人被迫流離失所，其中50多萬人是跨境流離失所，絕大多數（79%）被美國接納。

“**移民大篷車**”（Caravan）是最近一個用來描述大量人群通過陸路跨境流動的術語，自2018年以來，移民大篷車的出現頻率都在增加，而且往往包括有兒童的家庭。通過巴拿馬達里恩峽谷遷移的兒童人數

急速增加。在2021年上半年，來自洪都拉斯、瓜地馬拉和薩爾瓦多的22.6萬名移民抵達美國邊境，其中約3.4萬人是無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對此，墨西哥和美國政府加強了移民執法，包括實施旨在防止移民過境的措施，在美國和墨西哥邊境的現役軍人增加，拘留和驅逐的移民人數增加，關於移民受到邊境官員過度武力對待的報告也在增加。

三、近年委內瑞拉移民增加了該區域移民的複雜性，加勒比地區的移民動態仍以遷出為主

大多數來自加勒比地區的國際移民是區域外的移民，北美地區（主要是美國）和歐洲是兩個重要的目的地。一些最大的“移民走廊”是在古巴和美國以及多明尼加共和國和美國之間。區域內移民總量較少，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數也在穩步增加。到2020年中，有近86萬來自該區域內的國際移民，自1990年以來這一數字幾乎翻了一番。區域組織“東加勒比國家組織”（OECS）和“加勒比共同体”（CARICOM）的**加勒比單一市場和經濟**（CSME）致力於加強區域內的自由流動，使得該區域內移民數量增加。

近年來，一些加勒比國家的移民也大幅增加，主要是由於委內瑞拉移民的遷入。2019年9月，約有10萬名委內瑞拉人居住在加勒比地區，而到2021年底，委內瑞拉人的數量增長到22萬以上。委內瑞拉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包括多明尼加共和國、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圭亞那和庫拉索島——目前超過10萬名委內瑞拉人居住在多明尼加共和國，占當地總人口的1%以上；在阿魯巴和庫拉索等地，委內瑞拉移民占人口的很大比例（超過10%）。為了應對加勒比地區委內瑞拉移民的增長，特立尼達和多巴哥、多明尼加和庫拉索等正在採取規範化措施，給予滿足條件的委內瑞拉移民合法居留身份。

四、环境变化和灾害影响该次区域的人口迁移和流离失所

包括熱帶風暴和颶風在內的嚴峻天氣直接和間接地影響了該區域的移民。例如，兩年前的勞拉颶風致使多明尼加、海地、古巴和美國的100多萬人流離失所，而埃塔和伊塔颶風在該區域的一些國家導致大約170萬人流離失所。在中美洲，山前地區的環境衝擊包括洪水和風暴、泥石流和滑坡，而乾旱地區主要受到旱災的影響。而在瓜地馬拉，由於乾旱和洪水破壞了農作物，從而導致糧食不安全和貧困，人們因此不得不遷移。為了進一步應對氣候變化和移民的挑戰，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國家將移民和流動納入其氣候戰略。例如，瓜地馬拉的氣候戰略關注人口流動，而墨西哥的“新國家自主貢獻”行動要求進一步關注氣候移民。

五、疫情干扰南美洲移民，对回迁和流离失所产生影响

2020年2月，巴西出現了南美洲第一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之後，該區域的確診病例數量居全球之首。到2020年4月，92%的美洲國家關閉了邊境，以遏制病毒傳播。一些國家也實施了封城和隔離措施。玻利維亞、哥倫比亞、厄瓜多爾和秘魯等國家採取了時間最久和最嚴格的封城措施。這些公共衛生措施阻礙了移民流動，使許多移民處於危險之中。一些居住在社會經濟條件惡化的國家的移民，因為疫情原因失去了工作，艱難抉擇下選擇返回來源國。大規模的移民往往通過步行返回，再加上流動限制，使得許多移民滯留在邊境城市，衛生條件惡劣。返回來源國的移民面臨社會經濟和法律方面的挑戰，如就業、獲得合法身份和應對仇外心理。

六、南美正面临着近代史上最严峻的人道危机之一，流离失所的委内瑞拉人是一项巨大挑战

自2015年以來，由於委內瑞拉的經濟和政治持續處於不穩定狀態，已有500多萬人離開了該國，400多萬委內瑞拉人遷往其他南美國家。哥倫比亞接納了最多的委內瑞拉人，截至2021年7月有超過170萬人進入該國。繼哥倫比亞之後接納委內瑞拉人數最多的南美國家是秘魯（超過100萬人）、智利（46萬人）和厄瓜多爾（超過36萬人）。一半以上的委內瑞拉人沒有取得合法身份。2021年2月，哥倫比亞實施了一項新政策，為流離失所的委內瑞拉人提供十年的臨時保護身份。該政策產生持久的積極影響——通過勞動力市場的整合和提供醫療保健、住房、教育等必要的保障，有助於促進社會包容和帶動經濟增長。由於許多國家從來沒有過如此規模的移民流入，發放適當簽證和給予庇護一直是挑戰。巴西和秘魯等國向大量委內瑞拉人發放了人道簽證。雖然一些國家已經向大量的委內瑞拉人發放了居留證，但許多人至今仍然未獲得合法身份。

七、南美区域移民增长迅速，女性增长明顯，约80%是内部移民

自2010年以來，南美的區域內移民人數已經增長至與居住在該區域以外的南美移民人數幾乎相等。這一增長有幾個因素，包括向歐洲移民的減少、國外移民政策的強硬化、區域國家層面的移民政策的正向發展、南美洲內部的就業機會增加、通訊手段的多樣化和運輸成本的降低，以及來自委內瑞拉的跨境遷移。在最大的目的國阿根廷和智利，女性在南美移民中占較大比例。由於人口老齡化和中產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增加，女性移民多承擔家務和護理工作。

八、暴力、冲突和灾害是造成该区域流离失所的關鍵因素

由政治和安全危機引發的暴力持續導致大規模的流離失所。哥倫比亞的暴力事件（部分是由准軍事組織的領土控制所驅動）導致新增流離失所者超過10萬。2021年，哥倫比亞因衝突和暴力導致的流離失所現象持續加劇，第一季度就有超過2.7萬人流離失所，與2020年同期相比增長了177%。

該區域還受到自然災害的嚴重影響，這些災害引發了人口流動和流離失所；洪水、滑坡和乾旱等突發和緩發的災害都對該次區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例如，因巴西的暴雨而流離失所的人數約占該國災害所致境內流離失所者（35.8萬人）的四分之三。

移居外國仍然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一個重要特徵。墨西哥約1100萬人生活在國外，是該地區最大移民來源國。墨西哥也是僅次於印度的世界第二大移民來源國，其中大多數人口生活在美國。其次是委內瑞拉和哥倫比亞，兩國分別有超過500萬和超過300萬的移民。按人口百分比計算，牙買加的迁出移民人口占比最大，其次是薩爾瓦多和委內瑞拉。阿根廷拥有该地区最大的外国出生人口（200多萬移民），主要來自巴拉圭和玻利維亞等鄰國。哥倫比亞的移民人數位居第二，位居第三的是智利。在移民人口占比最大的國家中，哥斯达黎加的迁入移民人口比例最大（10%），其次是智利。

2020年，墨西哥是繼印度和中國之後的世界第三大僑匯接收國，也是迄今為止該地區最大的僑匯接收國（430億美元）。瓜地馬拉、多明尼加、哥倫比亞和薩爾瓦多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前五大僑匯接收國，從占國內GDP的百分比來看，該地區前五大僑匯接收國分別是薩爾瓦多（24%）、洪都拉斯（24%）、海地（22%）、牙買加（21%）

和尼加拉瓜（15%）。2020年流向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僑匯達到1040億美元，這是迄今為止的最高記錄，比世界上任何其它地區都富有增長彈性。該地區僑匯流入量增長主要有幾個因素，如僑匯管道由非正式僑匯轉為正式，美國為應對疫情而採取一整套刺激經濟措施，以及移民繼續在目的國的重要行業工作等帶動。巴西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最大的僑匯來源國，其次是墨西哥和智利。2020年，僅巴西就匯出了約16億美元的僑匯。

繼敘利亞之後，**委內瑞拉跨境流離失所人口位居世界第二**。聯合國難民署將“在國外流離失所的委內瑞拉人”界定為一個單獨類別，以反映他們持續處於的流離失所危機，這一類別並不包括委內瑞拉的尋求庇護者和難民。到2020年底，委內瑞拉約有17.1萬名註冊難民，近400萬委內瑞拉人沒有正式的難民身份而流離失所。約有73%的難民和移民在鄰國尋求庇護。哥倫比亞繼續成為接納委內瑞拉難民和移民（超過170萬）的主要國家。另有約45萬來自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和洪都拉斯的難民在其他國家尋求庇護。

九、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大多数新增流离失所的原因是灾害，而非暴力和冲突

洪都拉斯與災害相關的流離失所者人數最多（93.7萬），其次是古巴（63.9萬）、巴西（35.8萬）和瓜地馬拉（33.9萬）。哥倫比亞和薩爾瓦多與暴力或衝突相關的境內新增流離失所者人數最高，哥倫比亞共有10.6萬，薩爾瓦多共有11.4萬。

北美洲

北美地區的移民以遷移至該地區為主，主要是向美國移民。共有近5900萬來自各地區移民居住在北美地區。自2015年以來，這個數字增加了約300萬。截至2022年，最大的移民群體來自於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約2600萬人），其次是亞洲（1800萬人）和歐洲（約700萬人）。過去三十年，由於來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和亞洲的移民湧入，以及北美地區的經濟增長，遷往北美地區的移民人數增長了一倍以上。出生於北美地區、但遷往其他地區的移民約300萬人。與其它地區相比，北美洲遷往其他地區移民的數量相對較少，與亞洲和非洲等地區形成鮮明對照。

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外国出生人口的国家。北美地區的外國出生人口有超過86%居住在美國，但加拿大人口外國出生人口的比例（超過21%）顯著高於美國（15%）。同樣，與美國相比，加拿大遷出移民的比例也更高。

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歷來是全球最大的僑匯來源國之一。2020年美國僑匯流出量約為680億美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僑匯來源國。

2020財年，美國接納了近34.1萬名難民。同年，接納了近一百萬名尋求庇護者。美國的大多數尋求庇護者來自拉美國家，如委內瑞拉、墨西哥和中美洲北部的國家，包括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和洪都拉斯，這些國家複雜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因素迫使大量人口流出。與此同時，加拿大在2020年接納了近11萬名難民和超過8.5萬名尋求庇護者。加拿大難民主要來自尼日利亞、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國家。

北美地區所有流離失所者都源於災害。在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國家中，美國每年新增的災害所致流離失所者人數一直居於首位。新增超過170萬人因洪水和野火而流離失所。全球2020年新增120萬人因野火而流離失所，其中100萬在美國，主要位於西部的加州、科羅拉多、猶他、俄勒岡和華盛頓等州。加拿大野火季節也引發了新的流離失所，與美國相比，規模要小很多。2020年加拿大有2.6萬名新增流離失所者，其中安大略省紅湖的大火致使3800人流離失所。

一、尽管疫情对北美移民流动产生影响，但该地区移民在社会经济层面对疫情卻发挥了关键作用

疫情期間，由於旅行限制、領館和邊境關閉以及簽證處理和移民法庭聽證會延遲等因素，登記到達美國和加拿大的移民人數顯著減少。加拿大2019至2020年期間，臨時居民的新申請和延期批准數量減少了48%（從240萬降至130萬），永久居民的授權和簽證發放減少了50%（從2019年的34.1萬降至2020年的17.2萬）。2020財年美國的移民和非移民簽證發放總數略微超過400萬，與2019年發放的920萬份簽證相比減少了54%！雖然疫情期間的旅行和流動限制降低了許多移民進入北美的機會，但美國和加拿大都保留了一些通道，尤其針對在關鍵行業臨時工作的外國人。此外，移民對該區域的經濟和對疫情的整體回應至關重要。例如，許多移民受雇為衛生保健工作者或工作於關鍵行業（如食品和農業）。在美國，約有六百萬外國出生工人受雇於一線行業，另有六百萬移民從事受疫情負面影響的行業，如酒店和餐館以及個人服務（包括美甲和美髮）。

二、美国和加拿大是重要的移民目的地，其移民的来源国愈加多样化

目前約有5100萬國際移民居住在美國，仍位居世界第一。前往美國的移民來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以及亞洲，包括墨西哥、印度和中國

等國。多年來，其移民的來源國愈多樣化。雖然墨西哥出生的移民仍占美國國際移民的最大份額，但隨著時間推移，其人數一直在下降，而來自多明尼加、菲律賓、薩爾瓦多、委內瑞拉、阿富汗和尼日利亞等國的移民人數持續顯著增加，這些國家的移民在過去十年中增長最快。

三、隨着人口老化，加拿大繼續增加移民目標數量

加拿大是2020年世界上第八大移民目的地，超過800萬國際移民居住在加拿大，其大部分移民來自印度、中國和菲律賓。加拿大近三年的移民數量達到1913年以來的最高值。2021年接收了40.1萬名移民，2022年接收了41.1萬名移民，2023年目標接收42.1萬名移民，該數據反映了加拿大人口結構的變化，目前移民人口增加構成該國82%的人口增長。加拿大的生育率平均為1.5左右，遠低於2.1的人口替代率。該國的勞動力也在迅速變化，預計到2036年，工作者與退休人員的比例將達到3:1，到2040年，預計超過23%的人口年齡將高於65歲。加拿大規劃將60%的移民納入經濟階級計畫，以反映出維持和發展加拿大勞動力市場的必要性。在地方層面，鑒於許多中小型企業家計畫在未來幾年內退休，各地重點支持移民企業家。此外，還有一些方案旨在促進實現更公平的移民分配，以應對區域化的長期挑戰，這一進程旨在促進移民遷入加拿大較小省份和城市。

四、美國的移民政策近年愈加強硬，但新的政策變化正在重塑美國移民制度

美國最新人口普查顯示，人口增長幅度近乎降低至歷史最低水準，2010年至2020年期間的人口增長率為7.4%，為1790年建國以來倒數第二。為了應對人口變化，美國努力試圖增加本國遷入移民，以維持人

口增長和現有勞動力規模。同時，特朗普政府實施的若干連鎖措施加大了移民和尋求庇護者遷入美國的難度。移民被視為對國家經濟的威脅，限制性政策和立法則旨在阻止移民。自2021年初以來，拜登政府快速對移民制度進行了改革，包括取消對穆斯林和非洲國家的旅行禁令，恢復“童年抵美者暫緩遣返計畫”（DACA），暫停在南部邊境修建隔離牆，並提議為所有未經法律認證的移民提供一條八年獲得公民身份的途徑。

此外，在2021年初，美國政府中止了與薩爾瓦多、瓜地馬拉和洪都拉斯的三項庇護合作協議，該協議要求來自該區域的尋求庇護者首先在這些國家尋求保護，並允許美國將部分移民轉移到以上三國。2021年3月，居住在美國的委內瑞拉人被授予臨時保護身份（TPS），使他們能夠在美國合法生活和工作。此外，2021年5月，美國政府修訂了難民接納上限，從1.5萬人增加至2021年的6.25萬人；2022年又進一步增加至12.5萬人。此外，美國還致力於幫助前些年被分離的移民家庭重新團聚。

五、美国非常規移民數量持續增加，其主因是南部邊境危機

美國非常規移民（非法、無證及逾期移民統稱）總數大約在1100-1140萬之間。在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的非常規移民人口數量減少了大約12%，主要是由於在此期間約有190萬非常規移民被遣返回墨西哥。生活在美國的非常規移民的來源國越來越多樣化。近年來自中美洲和亞洲的非法移民大量增加，這些移民主要來自薩爾瓦多、瓜地馬拉、洪都拉斯、委內瑞拉和印度。

大洋洲

約有830萬國際移民在此區域生活。該地區的外國出生人口主要由來自亞洲和歐洲的移民群體構成。過去三十年，來自亞洲的移民群體的規模在增長，而來自歐洲的移民人數則保持穩定。在世界區域中，大洋洲遷出的移民數量最少，反映了該區域人口規模較小。大部分出生於大洋洲、但生活在該區域以外的群體主要居住在歐洲和北美地區。

大洋洲的國際移民絕大多生活在澳大利亞或新西蘭。該地區的大多數國家移民都有明顯的偏向，屬於大型移民淨輸出國或移民淨接收國。例如，薩摩亞和斐濟的遷出移民人數相較於其本土人口比例較高，而外國出生人口的比例很低。這些國家的遷出移民主要生活在新西蘭和澳大利亞。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外國出生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均較高，分別達到約30%和29%。

澳大利亞是該地區收到僑匯最多的國家，其次是新西蘭和斐濟。從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來看，最大的僑匯接收國為幾個較小的經濟體，如湯加、薩摩亞和馬紹爾群島。澳大利亞不但是大洋洲最大的僑匯接收國，也是該地區最大的僑匯來源國。2020年澳大利亞的流出僑匯超過40億美元。

2020年，大洋洲接納的難民和尋求庇護者人數超過15萬。澳大利亞是該區域最大的接納國，其後為巴布亞新幾內亞和新西蘭。這些國家接納的難民來自一系列國家，包括阿富汗、印尼、伊朗和伊拉克等。

大洋洲的大多數新增流離失所因**災害**而非衝突所致。瓦努阿圖記錄了最多的災害流離失所人數（8萬），主要由哈羅德旋風引發——這場五級風暴對該國近四分之一的人口造成影響。澳大利亞（5.1萬）、

斐濟（3.7萬）和新西蘭（近5000）也有其他與災難相關的大規模流離失所記錄。在澳大利亞，2019年7月至2020年2月期間，為應對嚴重叢林火災季節而進行的預防性疏散是造成新增流離失所的主要原因。大火摧毀了三千多座房屋和約一千七百萬公頃土地，嚴重影響了位於東南部的維多利亞州和新南威爾士州。

一、疫情期間大洋洲经济陷入困境，劳工流动受阻，旅游和酒店等重要行业受重創

疫情期間大洋洲各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公共衛生安全措施，以遏制病毒傳播，並設法將病例數量降到最低。然而這些先發制人的措施，如旅行限制、關閉邊境、暫停航班和隔離措施等，對工作於關鍵行業的移民產生了負面影響，尤其是勞工面臨重大挑戰。例如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季節性工人專案的太平洋島嶼移民處於非常不穩定狀態，湯加、斐濟、圖瓦盧和瓦努阿圖的勞工移民根本無法前往工作地點，而那些已經在國外就業的移民不得不與他們雇主協商繼續工作，或尋找新雇主另謀出路。季節性工人專案中的移民面臨著回國和原合同期滿後穩定就業的挑戰。

構成太平洋島嶼的主要收入來源的旅遊業和酒店業更受到疫情的衝擊。在斐濟，旅遊業經濟下滑預計影響整個國內生產總值的38%！

經濟危機導致的僑匯流動也構成了太平洋島國的一大挑戰，這些太平洋島嶼國家十分依賴僑匯。在減少了現金服務之後，世界銀行的報告表明，使用數字平臺是一個重大轉向；斐濟銀行報告表明，數字平臺

總交易額從2020年3月的275萬斐濟元增長至2020年4月的462萬斐濟元。

二、季节性劳工移民制度持续促进移民从太平洋岛屿国家流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太平洋勞工移民計畫，如澳大利亞的季節性工人專案、“太平洋勞工計畫”以及新西蘭的季節工作簽證（RSE），主要從太平洋和東南亞招募移民，並安排他們從事農業、住宿業（在澳大利亞）和園藝、葡萄種植業（在新西蘭）。由太平洋島國遷入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移民人數很多。大多數參與這些季節性移民勞工專案的工人都來自瓦努阿圖和湯加——湯加現勞動人口中有13%是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工作。這些季節性勞工移民專案的結果表明，經濟機會推動來自周邊太平洋島國的移民參與這些專案，而移民的離開會影響人口增長和傳統社會制度，並增加這些地區本地生產的機會成本。此外，絕大多數工人都是男性。如在澳大利亞，參與者中只有14.6%是女性。

三、环境变化和自然灾害对该地区的移民流动产生重要影响

大洋洲災害頻發，極易受到地震、洪水、森林火災和旱災的影響。近期澳大利亞發生毀滅性的叢林大火，從2019年7月到2020年2月，火災蔓延至1700萬公頃土地，這一歷史性事件使得6.5萬人流離失所。而自然災害導致的流離失所問題更加嚴重，2019年6月巴布亞新幾內亞的火山爆發致使約2萬人流離失所；2020年4月襲擊瓦努阿圖的哈羅德旋風則使8萬人流離失所，約占其總人口的四分之一。環境變化和自然災害促使許多移民流動，人們決定遷移與否與環境變化有關，這將持續影響該地區的人口變化。

四、该地区的另一个突出移民特点是寻求庇护者和难民

大洋洲地區接納尋求庇護者和難民的前三大國家是澳大利亞（13.8萬人）、巴布亞新幾內亞（1.1萬人）和新西蘭（2500人）。過去十年中，再安置的難民中約有11%是在澳大利亞。2018/2019年度，澳大利亞人道方案下的名額增至18762個；2019/2020年度，澳大利亞提供了13170個人道名額，而該年度分配的名額總數為18750個。由於疫情旅行限制，2020年3月，澳大利亞政府全面暫停發放境外人道簽證，因此該方案在2019/2020年度沒有完全得到實施。在2020/2021年度，澳大利亞政府再度減少5000個人道計畫名額，恢復到2017年之前的水準，即每年13750個名額。截至2021年7月，由於持續的旅行限制，仍有一萬名獲得境外人道簽證的難民滯留海外，無法進入澳大利亞。經2021/22年的聯邦預算確認，未來澳大利亞境外人道簽證名額數量將維持在13750個/年。澳大利亞在2012年至2020年期間撥款約83億澳元為近四千名尋求庇護者處理海外滯留問題。

第二章 疫情对全球移民和流动的影响

隨著新冠病毒出現並在全球傳播，2020年作為“疫情之年”被載入史冊。到2021年，疫情影響了地球上每個人的生活。眾多相關的新詞匯出現在日常用語中，“zoom”（線上會議平臺）、“封城”、“社交距離”、“個人防護設備”、“口罩”或“接觸者追蹤”以及對移民有特別影響的兩個詞：“邊境關閉”和“隔離”。

面對疫情，除了在國家內部持續實施的旅行限制外，各國家、地區和地方還實施了超過10.8萬項與疫情相關的國際旅行限制。因此，疫情嚴重打擊了全球旅遊相關產業。世界各地最初實施的限制對航空業造成重大打擊——全球國際航班數量減少了約80%以上。世界上最大行業之一的旅遊業也面臨類似的下滑，損失約2萬億美元，占全球GDP的2%！聯合國統計，疫情使國際移民存量的增長就放緩了約200萬，比預期增長低27%。

疫情是一場健康危機，也是一場經濟危機——企業被迫關閉，工人被解雇或停職。全球經濟下降了5.2%，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衰退。疫情期間，低收入工人（通常是無證移民）成為基層服務工作者，他們收割作物、加工包裝運送食物，在超市服務、並照顧家庭成員和弱勢群體。護士和醫生成為英雄，許多其他專業人士開始在家遠程工作，工作模式及性質發生改變。

疫情至今仍有很多未知之迷，但世界各地感染、傳播和影響存在的差異卻是非常清晰的：**因国家而异**。造成這種差異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世界各地政府政策的類型與有效性——或有效回應、或自滿、或否認。作為一種沒有確實可用疫苗的新疾病，疫情造成的死亡人數（聯合國估計至少為300萬人）已遠遠超過任何一年因流感導致的年度預期死亡人數（29~65萬人之間）。疫情對全球範圍內的一系列社會、經濟和環境都產生了重大影響，包括對移民的影響，確切後果將在未來幾年內陸續浮現。

疫情下的“移民”和“流动”

在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同時需要有關當地互動和流動的資訊，“流動”這個術語包括短期流動，如國際商務和旅遊流動，以及通勤、跨境勞工和其他形式的短距離互動，以及長期的移民和流離失所。疫情加劇了移民和流動之間的張力，使人們進一步關注流動性如何支持和促成不同形式的移民，以及移民停滯在整個移民週期中成為移民過程的主要干擾因素。

從生物學角度來看，病毒並沒有顯示出對特定人類宿主的偏好。該病毒的感染率與公民身份、種族、性別、年齡、信仰和移民身份無直接

關聯。誰接近了病毒，誰都容易被感染。因此，移民並不是應對疫情的主要優先事項：

“幾乎所有重大事件的證據和經驗都表明……雖然國際和國內旅行是參與感染傳播的重要因素，但移民（包括常規和非常規移民）並不是一個重要的風險因素。”

事實上，在疫情蔓延期間，人們基本上無法進行遷移。然而，人們與病毒的接近程度確實與**系統性不平等**和**社會經濟**因素有關。因此，已經在目的國的移民，特別是低技能或低收入移民，更有可能從事使他們面臨接觸病毒風險的工作。在歷次危機中，仇外種族主義罔顧事實和證據，經常將移民視作目標，這次疫情中尤其體現為針對亞裔。

疫情的背景信息

疫情是一個多世紀以來，也是自1919年所謂的“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疫情。該病毒在被發現後的頭六個月內，就導致了一千萬例確診和五十萬例死亡，遠遠超過了最近其他如2003年SARS和2012年MERS之類的冠狀病毒疫情，即使與以前的嚴重疫情，包括1957年的“亞洲流感”和1968年的“香港流感”比，新冠肺炎的感染人數要多得多。參考以往疫情，關鍵的應對措施都是防止人員作為病毒傳播者在國際和國內的流動。隨著全球化加深了跨國連接，全球對國際運輸的依賴性激增，防止流動變得更具嚴峻的挑戰。

其實在2014年出版的一本關於全球化的書中，作者就已發出預警，全球化的加劇**必將導致**包括極端的全球疫情在內的重大風險：

“不可避免的是，隨著我們的連接更為廣泛，越來越多的人生活在靠近機場的大城市。這些機場不僅是全球化‘好的一面’，同時也是‘負面事物’的超級傳播者，這種影響將蔓延至世界各地。”

疫情給各國政府、世界衛生組織（WHO）帶來了極大的壓力，以緊急應對疫情。高傳播率和高重症率迫使全世界許多政策制定者進入這個未知領域。因此，各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限制病毒的傳播，包括限制國際/國內行動以及公共活動的集會。企業、學校、公共和私人交通系統被關閉，社會活動被嚴令勸阻或禁止。一些國家對國際性活動實施重大限制；一些國家禁止特定（高風險）國家公民入境；另一些國家則禁止所有外國公民入境，或者完全關閉邊境，甚至禁止包括本國公民在內的所有人員出入境。儘管如此，也有因一系列不同原因而不關閉國境的例外情況。

極少數例外

然而，即使在嚴格封鎖的地方，某種程度的流動仍然存在，以確保繼續提供基本的商品（如食品、藥品、醫療產品）和服務（如醫院、保健、食品零售、物流、衛生、郵政、安全）等。收入低的職位往往由勞工移民擔任，他們處於第一線，更容易接觸到病毒，而收入更高的專業人員有能力限制他們的流動性。那些收入最低、就業最不穩定的勞工移民，如季節性工人，對社會運作至關重要而不受旅行限制，從而突出了一種由來已久的矛盾：**一些人尽管地位低下，但卻在社会日常运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疫情期間的國際旅行限制分三個階段，現將移民政策研究所（MPI）和國際移民組織相關報告摘錄如下：

一、移动出行封锁

疫情初期各國出臺了大量的旅行限制和衛生政策，以應對快速演化的公共衛生狀況。許多國家完全關閉了大多數入境點或禁止來自受影響地區的旅行。關閉邊界的規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甚至歐洲無邊界的申根地區也與鄰國重新設置了臨時邊界。全世界每個國家、領土和地區都受到至少70項旅行禁令的限制，人們在封鎖下避難，各類流動因而大幅減少。

二、分阶段重新开放

疫情危機應對的第二階段帶來了一些入境點的重新開放，特別是機場入境點，陸地和海港入境點也在較小程度上重新開放。在此期間。對來自特定地區或穿越特定地區旅客的禁令日益被衛生措施所取代，包括出發前的核酸檢測證明、隔離措施或健康申報。許多地區首先重新開放了航空旅行，因為航空旅行提供了更大的空間來實施新的衛生措施和區域安排，如“旅行氣泡”（travel bubbles）等。

三、应对新的疫情和病毒变异

疫情後期喜憂參半，各國既要努力建設自己以衛生措施取代旅行限制的能力，又要與第三波或第四波感染作鬥爭，並努力應對病毒新變種的出現。而部分國家，則選擇開放。健康證明成為最常見的與健康有關的旅行措施，而隔離和篩查的要求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消失——也許因為隔離被證明是昂貴的，而篩查是無效的。

旅行限制只是眾多措施之一，但卻是最重要的措施之一。各國政府為儘量減少疫情傳播而不斷調整為減輕病毒傳播採取的措施政策時，實施複雜多樣的措施及控制其影響的過程中權衡取捨是必需的，而這需

要更廣泛的治理和政治考慮，而人員流動正是關鍵要素之一。因此，所有國家都面臨著艱巨的任務，即平衡公共衛生和社會措施對健康、收入、自由、教育和其他產出的不確定性的影響。

疫情旅行限制對旅行產生了重大影響——有據可查的航空旅客總量從疫情前的2019年約45億人次下降到疫情2020-21年的18億人次，下降了60%以上！

疫情对移民停滯的影响

事實證明，疫情打破了現狀，對移民產生的負面影響遍佈了整個國際移民週期：從離開來源國開始，到進入過境國和目的國，在過境國和目的國停留，以及返回來源國。疫情迫使人們的流動停滯，強化了特定類型的流動，或將正常流動推向非正常管道。影響因環境而異。移民因疫情政策而無法流動導致的張力，給許多移民帶來了磨難，下表總結了這些破壞性影響。

新冠肺炎疫情对整个移民周期的影响

设置	影响
离开来源国	移民无法按照移民旅行计划出发，如计划地工作、学习或家庭团聚。需要寻求庇护或离开不稳定国家的人被阻止，使他们面临暴力、虐待、迫害和（或）死亡的风险。
进入过境国或目的国	随着限制措施的逐步实施和（或）加强，移民（包括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进入过境国和目的国日益困难。在特定行业，如季节性农业，其严重影响已初见端倪，全球食品供应链已经中断。
在过境国和目的国停留	对移民尤其是社会中最脆弱的群体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无法获得社会保护和医疗保健，还面临着失业、仇外的种族主义和移民拘留的风险，同时无法返回家园。此外，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在难民营和类似难民营环境中受拥挤和恶劣的生活条件的影响，无益于实施隔离或其他新冠疫情控制措施。
返回来源国	一些国家宣布关闭边界，导致大量移民返回来源国，因为他们担心被滞留，没有收入或社会保护。但由于无法返回，大量移民滞留在世界各地。一些国家实施了大规模的遣返行动，但其他许多国家无力承担或组织遣返工作，使移民处于危险之中。

来源: McAuliffe, 2020.

強制的移民停滯

有意移民者受與疫情相關的邊境關閉和旅行限制的嚴重影響。幾乎所有國家在疫情期間都引入了四種形式的入境限制減緩甚至制止了移民：（a）邊境限制或封閉；（b）簽證計畫中斷；（c）隔離措施；（d）不飛或限飛，對除必要者以外的所有旅行者關閉邊界。人們無法離開自己的國家。但《國際衛生條例》規定：邊界最好保持開放，**只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才实施控制**，其中不僅包括公共衛生問題，還包括國家安全或緊急情況。

《國際衛生條例》規定了人離開任何國家並返回自己國家的權利。而此次史無前例的實施防止本國公民離開的限制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是自二战結束以來的首次。離開自己國家的權利並不伴隨著進入另一個國家的相應權利，這使得大多數移民入境的決定（通常以入境簽證的形式）是在國家層面上，基於雙邊關係，結合政治、經濟和其他考慮的背景下做出的。根據“不驅回原則”，這不適用於難民。然而，在疫情期間，各國甚至將尋求庇護者排除在其邊境之外，並將他們趕回過境國。事實上，尋求庇護者、難民和其他流離失所者受旅行限制的影響尤為嚴重。尋求庇護者被禁止在邊境才提出申請，也導致非常規移民和庇護申請大量減少。一些國家政府不僅關閉了邊境，而且實施邊境軍事化管理，亦導致了非正常移民和移民偷運的增加。移民的脆弱性加劇，弱勢人群更缺乏保護措施，包括一些移民通過跨境遷移獲得鄰國包括醫療保健在內的基本公共服務等。

世界各地的移民也由於國際旅行限制以外的原因而滯留在過境國和目的國。許多勞工移民甚至被關在擁擠的勞工住宿設施中等待著目的

國重新開放。失去工作和收入、沒有航班、失去居留證和缺乏返回家園的資源是疫情影響其行動的幾類主要表現。

返回和隔離

邊境關閉困住了大批移民，使他們無法返回家園。這些移民失去了工作或擔心失去工作。在發展中國家，包括勞工移民在內的回流人口在來源國附近的目的地定居，例如在東南亞，成千上萬的勞工移民在疫情期間離開了泰國，前往老撾、柬埔寨和緬甸。這些移民試圖遠離疫情而出現了經濟困難。由於許多勞工移民缺乏社會保護，不回國他們就有可能挨餓和無家可歸。疫情造成的絕望，使得移民決定返回他們因社會經濟困難而逃離的國家。然而，無論是獨立返回還是通過其政府贊助的遣返計畫，並非所有移民都能成功返回。例如，在印度實行全面封鎖後，數千名尼泊爾工人被滯留在該國1700公里邊境沿線的不同地點。目的地與不願意或無法提供遣返航班的來源國之間也出現了緊張局勢。委內瑞拉政府甚至拒絕本國公民進入其領土。

一些國家沒有對移民流動性施加全面限制，而是轉向一種更有針對性的間接控制形式：隔離。許多國家對從被認為是疫情流行區域並可能對本國人口構成風險地點抵達的人實行7至14天的隔離期。隔離措施允許居民回國，但往往要付出巨大的經濟代價，引起了來自受病毒影響較小國家和地區人們的強烈不滿。

而在一些國家，將回流的移民被定為刑事犯罪者。委內瑞拉政府最初將回國者定為傳播病毒的“生物恐怖分子”，並將試圖繞過官方邊境口岸的回國公民投入監獄。此外，回國後的強制隔離往往是在不衛生

的條件下進行的，某些時候甚至缺少自來水和醫療服務。回國者往往無法確定自己何時獲釋——這些類似於任意拘留，而非保護措施。

移民的脆弱程度加劇

留在目的國的勞工移民，特別是受雇於非正規經濟或在封鎖期間受到嚴重影響經濟部門的低收入工人，往往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困難。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移民且在沒有社會福利制度的目的國者尤其如此，海灣地區和東南亞部分地區的情況就是如此。收入的損失在不同方面影響了移民人口的生活品質，例如住房的可及性和品質，也影響了他們向家人匯款的可能性。此外，移民往往被排除在包括醫療保險或失業保險的公共福利之外，非常規移民更被排除在醫療服務之外，或害怕接近醫院或醫療機構，因為他們害怕被拘留或被驅逐出境。

此外，仇外心理，特別是反亞裔種族主義在全球範圍內抬頭，一些大眾媒體、公眾人物和政治團體錯誤地將移民與病毒的傳播聯繫起來。由於與疫情有關的錯誤資訊和恐懼，全球許多國家對移民的仇恨和歧視加劇了。聯合國秘書長將與疫情有關的事件稱為“仇恨和仇外心理的海嘯”。

所有這些問題都對全世界移民的心理健康產生了負面影響。移民人口往往較少獲得醫療保健資源，包括與心理健康有關的服務，且移民也受到一些特定的壓力源的影響。一些移民在第一線的基本部門工作，包括高技能的移民（特別是在醫療保健部門）和低技能移民（例如護理人員、清潔工、保安、農業或零售業特別是超市的工作人員）。脆弱的移民們失去了工作，無家可歸或被迫生活在過度擁擠的條件下。另外，非常規移民缺乏來自家庭和朋友的社會支持網路、不懂目的國

的語言等因素導致全球移民的情緒狀況出現惡化。而國際學生從校內轉移到校外學習後，嘗嘗被滯留在目的國，也面臨著經濟和情感上的困擾。在學生宿舍因封鎖而關閉的國家，許多國際學生不得不在沒有有力支持網路的情況下，自己在目的國尋找住處並支付房租。

对移民和流动的长期影响

疫情對移民產生的一些最令人不安的影響與強制移民停滯，造成了高度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加劇了一些重要的長期趨勢，如限制人口多樣性和助長反移民情緒傾向。與疫情有關的錯誤資訊和虛假資訊的增長——所謂的“錯誤資訊流行病”也強化了由科技支持的“部落主義”（tribalism）的出現。虛假資訊被用來故意破壞和掩蓋移民的許多貢獻，使後疫情時代的移民和流動恢復更具挑戰性。

疫情的影響是高度可變的，這取決於國家在全球系統中的位置，包括老年人口的死亡率高於青年人口在內的人口變化；不同的季節、氣候和空氣品質條件；以及政策和政府反應的有效性不均衡。一些發達目的國的衰退以及相關的經濟結構的調整很可能導致國際移民人數下降，從而對來源國產生深遠影響。雖然經濟影響在全球範圍內是不平衡的，但無疑，疫情減少了移民，並在兩個方面（社會經濟和數字化的深化）會對未來幾年的移民和流動情況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對社会经济的影响

據估計，全世界約有4900萬人因疫情而陷入極端貧困。這場疫情揭示並加劇了包括移民在內的原有社會經濟不平等，並將波及移民來源國和其來源社群。儘管移民對全世界的疫情的應對做出了貢獻，但隨著勞動力市場的收縮和工作機會的大幅收緊，移民將變得更脆弱。

國際移民作為一個幾十年來不斷增長的現象，日益受到數位化進程和相關技術進步的影響。各國在移民政策和實踐中進行了大量投資，數位化已經深入移民管理的各個方面，如資訊收集與傳播、簽證申請和處理系統、邊境管理系統、身份管理（如生物識別）和身份檔、融入支持、誠信核查、合規和欺詐預防以及難民安置等。疫情期間更進一步加強，因為國家、行業和社區都需要迅速適應疫情影響。

数字化的進一步深化

移民領域正在加強人工智慧（AI）技術的應用。雖然自九十年代起，人工智慧已被逐步部署在移民管理環境中。最初是被應用在簽證入境和邊境處理系統中，後逐步擴展到整個移民週期中。為了持續應對疫情危機，以人工智慧方式解決問題的現象加劇——這在公共衛生領域及其與人口流動的交叉部分上表現得最為明顯。**接觸者追蹤、人口監測和隔離追蹤**已被迅速開發為數字工具，其已建立在機器人學習的最新發展上，在如與面部識別和生物識別分析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疫情期間和後疫情時代對隱私的影響已成為學術界和政策界關注的話題。

移民者自己也在以創新方式使用新技術，主要聚焦在資訊和通信，以及移民、潛在移民及其親屬網路如何以資訊和通信技術（包括便捷轉賬）方式參與移民。在2015-2016年歐洲難民潮期間，對資訊技術科技和移民的關注得到了加強，因為當時移民在旅途中嚴重依賴線上APP應用程式。

疫情加強了國家、行業、社區和移民對數字解決方案的依賴，也帶來了挑戰和顯而易見的機遇與高效能：一方面，數位化程度的加深為工作、學習、社交以及即時資訊傳播提供了更好的虛擬平臺，使大量的資訊和經驗得以傳播交流；另一方面，國家監控技術能力的提高、獲取能力（所謂的“數字鴻溝”）、及日益增加的對人們“數字素質”的要求等挑戰，給許多移民群體帶來了窘境。各國正愈發將自動化和人工智慧應用於農業和社會護理等關鍵部門，以便在後疫情世界中最大限度地減少風險和降低勞動力成本，以應對下一個危機大事件的發生。

移民的未来：现在预测为时过早

疫情不僅在全球範圍內奪走了數百萬人的生命，也改變了我們的日常生活。每個社群都受到了疫情的影響，對移民的流動干擾的程度更加顯著，尤其是對於那些在疫情之前就已經移民、或屬於高度流動的勞工/旅行者群體的人——許多人被困在流動停滯狀態和失業狀態中，沒有收入支持或其他社會保護。**疫情导致了移民人口的大规模滞留。**

對以前可以輕鬆到達世界大部分地區的人來說，國際旅行不再那麼理所當然。持有“強勢護照”或“黃金護照”、可以免簽證前往全球大部分地區的人也無法旅行。許多國家被列入高風險名單，其公民被禁止進入其他國家。高收入國家的許多人經歷了無法旅行、收入損失和高度不確定性，使他們得以深刻體會疫情之前世界上許多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最邊緣化的一群人，也是在危機時期最不可或缺的一群人——不平衡的經濟、財政和社會制度，以及日益嚴重的不平等——驗證了一味增加旅行消費的模式最終會被證明是不可持續的。

疫情對移民系統構成了極大挑戰，並對移民產生了迥異影響。以前被廣泛接受且被認為是國際流動基石的規範，在疫情期間就被各國擱置一邊，離開自己國家和返回自己國家的權利都被嚴重阻擾了；更諷刺的是，作為人權基石的“**不驅回原則**”，竟然受到包括此一國際保護體系最初設計國家的高調擱置；同時，隨著行業和政府尋求擴大數位化以提高效率、回應能力和降低風險，對勞工移民的依賴將降低，情況將不再如前。

以前貨物和服務供應等的高流動性，凸顯出全球化的長期性以及深深植根於世界各地的普遍不平等現象塑造出來的移民模式，在疫情期間缺陷暴露無遺。這場疫情進一步暴露了被迫遷移、流離失所和人道應急方面的嚴酷現實：在這一時期，許多工業化經濟體為滿足其需要，給一些最邊緣化的國際勞工（如季節性勞工）提供了旅行豁免；對移民來源國來說，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公民對領事援助的需求突出，勞工移民卻發現自己處於弱勢地位，特別是在那些對公民提供很少或根本沒有保護的國家；僑匯反而創下了新高，因為移民和僑民在危機期間轉向數字管道來幫助支持其處在老家的弱勢家庭都凸顯了國際勞動力流動和匯款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社會和經濟。

聯合國《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約》的確定和實施，表明了移民對絕大多數國家的重要性。雖然疫情曾抑制了人類在關鍵領域的活動，但這始終只是一個暫時狀態。在疫情結束後，密集的人類活動正在反彈，疫情造成的環境效益影響最終會化為泡影。

第三章 移民的动力

事實上，除了衝突造成的嚴重的傷亡和財產毀壞外，還有許多生活在這些環境中的人們常常被迫離開家園、社區乃至祖國以尋求安全和保障。目前全球仍有2640萬難民和410萬尋求庇護者。此外，還有約4800萬人因衝突和暴力而流離失所，達到歷史最高水準，這並非一種新現象——過去十年因武裝衝突、暴力而流離失所的人數增加超過一倍，預計到2030年，世界上貧困人口的三分之二生活在高度不安全、衝突或暴力頻發中。而全世界86%的難民目前是由發展中國家接納的。

另一方面，儘管近年來衝突明顯激增，但**另一些国家卻變得更加和平与安全**。在這些國家生活的人們享有更高水準的人類發展水準，經濟更加繁榮，因此來自發達社會的人們在移民和流動方面有更廣泛的選擇，這與來自不穩定環境、選擇有限的人們截然不同。某程度上，能否進入常規移民管道不僅取決於一個國家的經濟地位或狀況，以及它與更廣泛的國際社會的互動方式，還取決於它的安全、繁榮和穩定程度。

最近的國際協議，如《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約》（即《移民問題全球契約》）和《難民問題全球契約》都是針對這些現實挑戰而擬訂的。除了承諾減少衝突、暴力和氣候變化等移民的消極驅動因素外，《移民問題全球契約》強調支持合法的移民途徑，因生活在受衝突和不發達影響的國家而被迫進行非常規、不安全的移民之旅的人民格外需要的。與此同時，《難民問題全球契約》作為聯合國在移民、和平與安全、預防衝突與構建和平等領域的努力，尋求促進在分配接納與支持全球難民和尋求庇護者責任方面的更多合作。

術語解釋

“和平”被定義為“國家內部或國家間沒有戰爭、衝突或暴力”。然而，這種概念長期以來因其過於消極、不足以充分理解和平的含義而受到挑戰。普遍認為，和平還包括一系列鞏固和平的積極因素，例如司法、人權和問責制等因素。

“安全”的含義也隨著時間推移發生演變。“人類安全”等概念的出現就是將發展、人權與國家安全等各個方面整合起來。

“非常規移民”是指人員流動發生在來源國、過境國或目的國法律、法規或國際協定之外。

“常規移民”是指符合來源國、過境國和目的國法律的移民行為。

“流離失所”是指遭強制或有義務逃離其家園或居住地的人員流動，尤其是由衝突、普遍的暴力、人權侵犯以及自然或人為災難造成規避其影響。

“投胎彩票”（lottery of birth）是指來自不太和平、且不發達國家的人們在獲得安全移民和流動的選擇上面臨更大的劣勢。

隨著冷戰結束，存在衝突和暴力的國家往往在社會經濟發展各方面也表現不佳。反之，低水準的社會經濟發展和高度不安全、衝突頻發相關。和平與安全能夠促進發展，而發展又能加強社會穩定。

雖然和平與安全並非是支撐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唯一因素，但它是促進國家繁榮發展的重要因素。事實上，過去六十年，高度和平國家的人均GDP增長是較不和平國家的三倍。和平與經濟繁榮之間存在明顯的正向聯繫——反觀近年受衝突影響的國家的貧困水準正不斷上升。

冲突、流离失所与非常規移民

和平與安全可最大限度減少流離失所和非常規移民，使移民更加常規化、安全和可預測。衝突和暴力是導致非常規移民最重要原因之一。即使在疫情肆虐的2020-21年，仍有近60個國家和地區數百萬人因衝突和暴力而流離失所，其中大多數屬於中低收入國家。近年衝突、政

治不穩定和經濟不安全在內的多種因素導致通過非常規手段進入歐洲的人數大幅增加，包括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其中大多數來自阿富汗、厄立特里亞、伊拉克、索馬里、蘇丹和敘利亞等。近期從“北方三角國家”——薩爾瓦多、洪都拉斯和瓜地馬拉通過非常規方式進入美國的人數也在激增，很大程度上也應歸咎於高度的不安全性，以及幫派等犯罪組織空前程度的暴力。然而，衝突和暴力只是移民故事的一部分，非常規移民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往往涉及一系列包括社會、經濟和政治層面的重要決定因素。

两种不同的移民体验

獲得常規移民管道的機會高度不平等——某些國家公民比其他國家公民擁有更多的移民及流動選擇。這種不平等與幾個因素有關，包括社會經濟、政治和安全原因。與來自低收入和政治動盪國家的公民不同，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優勢國家的公民往往能夠免簽證旅行，或者在需要簽證前往的地方更有可能獲得簽證和入境許可。不需要簽證的公民往往被認為是低風險而理想的（desirable）；而來自脆弱環境下的人們則會被視為“構成更大的風險”，通常與逾期逗留或安全問題相關，並且被視為“不被歡迎的”（undesirable），因而大多必須在入境之前申請簽證。

對簽證限制的研究分析了如何導致了不同國家人群前往外國的管道不均的現象，得出的結論是：

“對於來自经合组织国家的护照持有人來說，世界各國很容易到達，而且限制相對較少。但對於來自貧窮、專制且有暴力政治衝突的國家的護照持有人而言，旅行依然受到嚴格限制。”

關於免簽證計畫的研究發現，雖然這些計畫自1960年代後期以來規模大增，但**并未使所有國家受益**——非經合組織國家，尤其是非洲和欠發達國家國民不僅被排除在擴大的免簽證計畫之外，其自由流動權利相較1969年還有所下降。2020-21年的《全球流動報告》證實了這一點，表明儘管隨時間推移，個人無需事先辦理簽證即可訪問的國家數量顯著增加，但這一趨勢主要是由高收入國家推動的，而低收入國家則保持不變。

另一項針對誰能獲得美國B1/B2類簽證的調查分析進一步凸顯了這種動向，顯示較貧窮國家的國民獲得短期旅行簽證的可能性遠遠低於較富裕國家的國民。拒簽率隨著移民來源國GDP總值的增加而下降。申請簽證的成本顯示出相似模式，世界各地的簽證價格存在巨大差異。與來自較富裕穩定國家的公民相比，來自政治不穩定和較貧窮國家的公民的簽證價格高得多——這阻礙了某些國家公民通過常規移民管道前往富裕的目的地。

和平、經濟繁榮國家公民的移民基本上是安全、有序而常規的。而低收入和不安全環境下的公民的遷移則可能是不安全而非常規的，並且往往是由其國內的危機推動的。來自低收入國家的國際移民**几乎一半**是尋求庇護者或難民。此外，低收入和脆弱環境下的大規模流動和流離失所事件構成了近年來流向高收入國家的人群的最重要特徵。

全球和平、国家脆弱性、人类发展和流离失所情况对比（部分国家）

国家（按GPI排名排序）	2021年全球和平指数（GPI）排名	2021年脆弱国家指数（FSI）排名	2019年人类发展指数（HDI）排名	2020年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人数（按来源国计）	2020年（冲突和暴力造成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
冰岛	1	177	4	10	
新西兰	2	176	14	67	
奥地利	6	166	18	33	
加拿大	10	171	16	192	
新加坡	11	165	11	116	
日本	12	161	19	162	
挪威	14	178	1	21	
瑞典	15	172	7	41	
澳大利亚	16	170	8	40	
德国	17	167	6	242	
不丹	22	96	129	7,219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33	150	13	259	
哥斯达黎加	39	149	62	1,033	
博茨瓦纳	41	122	100	344	
塞拉利昂	46	45	182	14,151	5,500
乌拉圭	47	158	55	455	
智利	49	144	43	2,792	
法国	55	159	26	222	
大韩民国	57	159	23	854	
多米尼加共和国	82	107	88	4,806	
孟加拉国	91	39	133	83,583	427,000
中国	100	95	85	283,451	
科特迪瓦	103	28	162	71,815	308,000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105	73	107	1,923	
危地马拉	111	59	127	170,668	242,000

国家 (按GPI排名排序)	2021年全球和平指数 (GPI) 排名	2021年脆弱国家指数 (FSI) 排名	2019年人类发展指数 (HDI) 排名	2020年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人数 (按来源国计)	2020年 (冲突和暴力造成的) 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
泰国	113	87	79	3,918	41,000
乌干达	114	24	159	19,136	1,000
缅甸	131	23	147	1,096,724	505,000
埃塞俄比亚	139	11	173	276,393	2,060,000
墨西哥	140	90	74	127,137	357,000
哥伦比亚	144	61	83	152,008	4,922,000
尼日利亚	146	12	161	426,013	2,730,000
马里	148	19	184	175,730	326,000
俄罗斯联邦	154	74	52	97,133	1,100
利比亚	156	17	105	23,034	278,000
索马里*	158	2		868,351	2,968,000
伊拉克	159	20	123	574,121	1,224,000
南苏丹	160	4	185	2,193,685	1,436,000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161	3	151	6,782,383	6,568,000
也门	162	1	179	54,904	3,635,000
阿富汗	163	9	169	2,833,569	3,547,000
排名第一表明	极高的和平程度	最脆弱国家	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低排名表明	极低的和平程度	最不脆弱的国家	低人类发展水平		

来源: 全球和平指数2020(IEP,2020); 脆弱国家指数2020(Fund for Peace,2021); 人类发展指数2019(UNDP,2020); 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人数(UNHCR,2021); 境内流离失所者(IDMC,2021)。

注: 索马里未被列入HDI排名。

由上表可看出:

首先，一個國家，不僅要看“**全球和平指数**”（GPI）上排名靠前，也要看在“**人类发展指数**”（HDI）上是否表現良好——後者是衡量國家在預期壽命、教育和體面生活水準等綜合指標。比如塞拉里昂、不丹和博茨瓦納等國家在全球和平指數上排名較高、但人類發展指數卻較低。這表明較高的人類發展水準與較高的和平程度之間是呈正相關的。

其次，“**脆弱国家指数**”（FSI）是由和平基金編制、根據178個國家的穩定程度和面臨壓力，對它們進行的年度排名。該指數包括社會、經濟、政治和軍事指標。在“脆弱國家指數”中排名靠後的國具有較高的人類發展水準，而那些高度脆弱的國家幾乎所有都與低人類

發展指數相關的——當然，並非所有穩定、或脆弱程度低的國家都有較高的人類發展水準。

第三，和平指數評分高的國家產生的難民和尋求庇護者也較少，並且因衝突引起的流離失所者較少或完全沒有。這點在敘利亞尤為嚴重，曠日持久的衝突導致全國一半以上的人口被迫流離失所。在高收入國家，難民和尋求庇護者僅占它們所接納的國際移民的3%左右，而在低收入國家卻高達50%！數據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低收入國家由於毗鄰衝突國家，因而持續承擔著接納絕大多數難民的重大負擔。南蘇丹、阿富汗和索馬里等國有數百萬流離失所者，而烏拉圭、日本和博茨瓦納所記錄的流離失所者數量則是零，進一步證實了和平與安全不僅能促進發展，而且有助於減少不穩定的人口流動。

勞工移民的分佈進一步說明了和平與經濟繁榮的國家促進了常規且更可預測的自願移民。國際移民人數過去二十年都有所增加，但在低收入國家，這種增長主要是由流離失所驅動；在高收入國家，很大程度上是勞工移民促進。在歐盟尤其如此，人們常受就業和更高待遇等與工作有關的因素的激勵，因而流動性較強。高收入國家仍然是勞工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全球1.69億勞工移民中，67.7%在高收入國家就業，只有3.6%在低收入國家就業。高收入國家的移民勞工主要集中在北歐、南歐與西歐（近24%）和北美（約22%）。

移民是和平与安全的积极参与者

對移民參與和平與安全建設的討論以往側重於移民在和平與安全中的負面作用，比如加劇衝突和緊張局勢，對其來源國造成安全威脅。然而，這類偏見局限於對移民群體內小一部分人的關注。移民正越來越

被視為受衝突影響的國家以各種形式的和平建設工作的關鍵，尤其是移民對於當地習俗、傳統知識，及對持續性衝突的深入瞭解，形成了相對於非政府組織和援助機構的比較優勢。移民龐大的跨國網路以及他們彙集大量資金的能力也使他們對來源國產生了積極影響。例如，移民開展活動反對持續不斷的衝突，併發聲以提高人們對其來源國存在的問題的認識和關注。1980-1990年代愛爾蘭移民在美國的活動常被引用為成功的例子，他們宣傳和遊說以在其目的國參與政治，以幫助加速其來源國的和平進程。

移民领导的和平建设行动

烏干達有近90萬名來自南蘇丹、因逃離2013年爆發的內戰而來到此地定居的移民。在2020年南蘇丹聯合政府成立之前，分別在2015年和2018年簽署的和平協議都被推遲執行，因而導致海外移民返回南蘇丹的前景並不樂觀，但也推動了由移民宣導、積極嘗試從烏干達定居點開展“**我們想要的南蘇丹**”行動。

其做法是讓更多南蘇丹移民瞭解和平協議的政治進程，包括在互聯網通常受限的定居點舉行資訊會議和研討會，移民團體說明和平協議的細節，並為參與者提供空間以公開表達他們對執行進程的意見，再將這些資訊傳遞給決策者。同時，移民團體倡議非暴力衝突，主張通過對話與工作，旨在減輕仇恨言論來減少種族成見。

移民最終促進了和平進程——無論是作為談判者或對話的積極參與者——他們在其中擔當橋樑的建設者，並促進建設性對話。他們的背景知識幫助調解者找到參與衝突的各方，並敦促這些團體參與和平談判。他們的見解在加強衝突參與方和調解者的信心和信任方面發揮了

重要作用。又例如，阿富汗移民持續積極參與本國的和平進程，包括組織和參與和平談判；而來自索馬里和蘇丹等幾個國家的移民也為其來源國的和平進程談判做出了不少貢獻。

移民對和平建設的貢獻還包括恢復和創立重要機構，如移民機構等；參與討論和起草可能決定一個國家未來的關鍵政治檔和法律；返回來源國實施社區專案；擔任政府關鍵角色或參加競選政治職務等。

發展是維持和平的基礎。移民對國家發展的貢獻，由來已久並在過去幾十年成為研究對象。有關國際匯款不僅對支持家庭和當地社區至關重要，而且在宏觀層面上也是重要的經濟資產，在一些國家的國內生產總值中佔據較大份額。在中低收入國家，移民僑匯數額甚至超過了官方發展援助和外商直接投資。

對於處在經濟困境或危機、並面臨衝突風險的人們而言，僑匯的增加可以降低衝突風險。在國家無法滿足公民的福利需求時，僑匯可以通過幫助滿足相應需求，從而降低經濟困難時期的內戰誘因。通過減少貧困和提振平均收入，僑匯可以防止和抑制暴力，從而減少社會衝突和內亂。總之，隨著經濟前景的改善，個人參與暴力的可能性降低。即使國家已處於衝突之中，僑匯也有助於緩和敵對行動，發揮了積極作用。但也必須承認，僑匯並非總是能促進和平或減少衝突。例如一些僑匯與對武裝組織或叛軍活動的支持有關。有些僑匯對國家治理品質的負面影響，在某些情況下降低了公民的參與程度，從而降低了國家機構的品質。

除僑匯外，移民對發展的其他貢獻，如投資債券、創新與創業、人力資本儲備（包括帶著新的專業知識、技能和專長歸國）以及幫助填補勞動力短缺，對國家的和平建設極為重要。

本章總結

非常規移民和流離失所仍然是世界各國關注的關鍵移民領域。移民在非常規遷移過程中遭受虐待甚至死亡的悲慘故事及圖像，加上衝突和暴力導致的流離失所人數大幅增加，繼續佔據國際媒體新聞頭條。

在和平、安全的移民目的地，人口流動不僅可預測，也更不容易受到流離失所的影響，而且還能推動經濟增長和發展，而經濟增長和發展反過來又能減少非常規移民，以及減少國家陷入衝突的可能性。在高度和平與經濟繁榮的國家，由衝突引起的流離失所和非常規移民的情況明顯較少。與不穩定和脆弱國家的公民不同，這些國家的公民享有更多的常規移民管道，安全、可預測的自願移民是常態。

展望未來，所有相關的行為者——包括政府和國際組織在內——必須承認並利用移民能夠並持續為和平、穩定和發展做出的許多積極而獨特的貢獻，繼續努力執行大多數聯合國會員國通過的《移民問題全球契約》和《難民問題全球契約》。

第四章 國際移民特點與規律

人們移民是為了獲得更好的生活。同許多鳥類一樣，人類是一個需要遷移的物種。遷移的概念就像人類自身一樣古老。對任何歷史時期進行審視，就能發現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都有著一貫在地區間流動的傾向——可能受不同的動機驅使而進行遷移，但總有從物質上改善生活的願景。

關於到達一個新國家的移民如何白手創業成功的故事並不少見：他們成為受尊敬的民間企業家，其後開始資助家鄉一整代人接受教育，或通過努力獲得了極高的個人成就。同樣，我們也看到一些批評抱怨人們將移民作為進入當地福利體系或得到特定職位的手段，其中大多數批評夾雜著負面、甚至政治化的措辭——但這些批評恰好亦說明遷移能給移民帶來一些積極、實在的好處。**很少有人會主动向更差的地方移民**。如果國際移民帶來了更壞的結果，那麼更多是出於戰爭、災害或其他原因的“被迫移民”（亦稱“流離失所”）。

移民已成為不少國家幾十年來廣泛經濟議程政策的一部分，它促進了國際貿易、外交及和平的發展，締造了文化紐帶，還提供了來自國外的收入。一些國家在國家建設的進程中，因國家間的競爭愈發劇烈，對“全球化人才”的需求也在擴大，國際移民隨即也成為重要的政治杠杆。

國際移民的數量從1970年的8400萬人增長到了2020年的2.81億人，占全球人口比例卻仅仅從2.3%上升到3.6%，且世界各地移民存在顯著差異和非常不同的移民趨勢：例如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人強烈傾向移民到北美；而移民到歐洲的人數幾乎翻了一番；一些國家的國際移民中所占人口比例龐大（例如阿聯酋境內的移民比例從1990年的71%上升到2019年的88%）；而另一些國家則面臨著遷出移民人數增加和生育率下降的問題，如拉脫維亞、立陶宛、波黑自2009年以來都經歷了10%以上的人口下降。

移民与“投胎彩票”（lottery of birth）

移民機會與出生國賦予的各項條件有一定關係，尤其是取決於希望移民的人持有哪國護照。下表概述了部分國家的人類發展全球指數、脆弱性和入境許可權（簽證准入）情況。

部分国家人类发展、签证和脆弱性指数排名

	国家 (人类发展指数排名)	人类发展指数2019	护照指数2021	国家脆弱性指数2020
		排名	排名	排名
极高人类发展水平	挪威	1	8	177
	德国	6	3	166
	澳大利亚	8	9	169
	新加坡	11	2	162
	加拿大	16	9	171
	美利坚合众国	17	7	149
	法国	26	6	160
	意大利	29	4	143
	马来西亚	62	12	120
高人类发展水平	斯里兰卡	72	99	52
	墨西哥	74	23	98
	泰国	79	65	82
	突尼斯	95	72	95
	黎巴嫩	92	100	40
	利比亚	105	101	20
	印度尼西亚	107	72	96
	埃及	116	90	35
	中等人类发展水平	吉尔吉斯斯坦	120	79
伊拉克		123	109	17
摩洛哥		121	78	80
印度		131	84	68
孟加拉国		133	100	39
柬埔寨		144	88	55
肯尼亚		143	72	29
巴基斯坦		154	107	25
低人类发展水平		乌干达	159	75
	苏丹	170	100	8
	海地	170	92	13
	阿富汗	169	110	9
	埃塞俄比亚	173	96	21
	也门	179	106	1
	厄立特里亚	180	98	18
	排名第一表明:	人类发展水平极高	移动公民护照持有率高	脆弱性最高的国家
排名最后表明:	人类发展水平低	移动公民护照持有率低	脆弱性最低的国家	

来源: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19年人类发展指数”, 出自《2020年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2020); Henley & Partners, “2021年护照指数”, 出自《亨利签证指数 2021, Q2》(The Henley Passport Index 2021, Q2); 和平基金 2020年脆弱国家指数 (The Fund for Peace Fragile States Index 2020.)。

注: 数据是撰写本报告时的最新数据。

“护照指数” (passport index) 是根据公民的入境许可权对各国进行的全球排名, 表明某国公民是否容易进入哪些国家取决于其国籍。它衡量了全球227个国家、领土和地区的签证限制, 显示了个人可以轻松前往其他国际目的地的能力。而入境权限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and 关系, 表明了该国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稳定、安全和繁荣程度。该指数反映出人类发展水准高的国家的国民无需签证即可前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同时这些国家也是备受青睐的移民目的国。

另一方面, 针对低人类发展水准国家实行的入境限制也显示, 常规的移民途径对这些国家公民来说是很大问题, 而非正规途径 (偷渡或非法移民等) 可能是对来自这些国家的潜在移民最现实的选择。低人类发展水准国家更是大量流离失所人口或大量难民的来源国。

然而，國籍這個因素並不能解釋不斷變化的移民模式，**渴望改變並不一定就渴望移民**，即使這種願望確實存在，**渴望移民也不一定就真的能够移民**——是否存在移民基礎設施是影響移民結果的一個重要因素。“**移民基礎設施**”（migration infrastructure）被定義為“促成和塑造移民的各種因素（如移民仲介、偷渡組織者、監管制度和政策框架、資訊與通訊技術和運輸等科技因素以及跨國社交網路等）”。

作為移民基礎設施的一部分，能否**獲得簽證**極其重要——與仲介、資訊與通訊技術、運輸和聯網網路的顯著增長不同，這一要素隨著時間的推移並未得到根本性擴展。相反，簽證准入造成了人口流動的差異，富國公民比窮國公民更有能力進入受管制的流動體系——這點很重要，因為只要有可能，移民就會選擇常規途徑——即持簽證移民。持簽證和未持簽證有著明顯的區別——從移民的角度來看，這兩種會產生巨大差異，尤其是對移民及其家人（包括那些留在來源國的人）產生以下截然不同的影響：

（a）簽證標誌著進入一個國家的權利，因此在過境和入境時具有合法性。有效的簽證保障了持有者免受剝削。相反，如果沒有簽證，人們在旅行中將面臨更大的風險，可能被當局拘留和驅逐出境，或被提供非法移民服務的人（如偷渡組織者或人口販運者）剝削和虐待，而且基本上是在監管體系之外運作；

（b）雖然可供選擇的旅行方式有許多，但從後勤角度來看，持簽證旅行無疑要容易得多，也意味著旅程是否可行；

（c）簽證讓人們在旅途中有更大程度的確定性和信心，使旅途更有可能按計畫進行，這其中也包括對成本的控制。

因此，在做出移民決策時，潛在移民者們十分重視能否獲得簽證或相

關官方許可，這是他們在討論移民可能性時的一個關鍵因素，包括人們在進行海外職位搜索時，能否獲得簽證也是一個決定因素。

有潛在移民意图并不一定會導致移民行為，按不同階段（“期望” → “規劃” → “準備” → “首付/實際付款”）的移民路線來看，隨著時間的推移，能夠保持其渴望、並實現其移民意圖、處於最終付款階段的人在數量和比例上都非常小。

“移民駝峰”

曾有觀點認為，通過提供更多國內發展機會的援助形式，能夠穩定低收入國家人口，從而抑制來自這些國家的移民潮，但這種想法後來遭到普遍質疑和摒棄。

低收入國家的經濟發展與遷出移民呈正相關關係——經濟增長提高了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的遷出移民人數。人們在獲取簽證以進行國際移民時所面臨的重大限制——低收入國家的遷出移民率低，因為低收入水準阻礙了積累資金。移民會隨著收入水準的提高而增加，但當收入水準增長到某一特定值時，又會成為穩定或抑制遷出移民的因素。換句話說，隨著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遷出移民的人數最初會上升，隨後會減少。如果人均GDP超過7000-8000美元，遷出移民率就會開始下降。這種現象被稱為“移民駝峰”。

然而，向富裕國家流入的移民和從富裕國家遷出的移民都是近年移民模式的關鍵特徵，而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移民相對有限，這意味著不能確定遷出移民是否會隨著收入的增加而減少；遷出移民的普遍性是非

線性的——意味著遷出移民率與收入水準之間**并不是**簡單的正相關關係。

谁在移民

普遍公認聯合國經濟社會事務部（UNDESA）的統計數據是全球國際移民的**主要數據來源**，其擁有關於各類移民（包括勞工移民、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等）的權威資料庫。

移民的動機不能僅從經濟角度理解發展一樣，改善經濟方面以外福利待遇也影響著全球的移民趨勢。因此，本報告分析利用了人類發展指數內所涉及的一系列廣泛的指標，最新移民存量數據來自2020年底。

“**人类发展指数**”由經濟學家Mahbub ul Haq編制，該指數在1990年首次被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用作《1990年人類發展報告》的核心，目的是更好地將人的元素納入以經濟指標為主的發展分析中。最初，人類發展指數涵蓋130個國家，1995年增至163個，目前達到總共189個國家，但敘利亞除外（2015年從中等級降至低等級）。截至2019年，66個國家（占34%）被列為人類發展指數極高的國家，53個國家（占27%）被列為人類發展指數高的國家。

全球國際移民人數從1995年的約1.61億人大幅增加到2020年的2.81億人，人口占比略有增加，從占全球人口的2.8%增加到3.6%——國際移民占比在非洲、亞洲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略有增長；在歐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的國際移民比例均有約4%以上的增長。下圖展示了按移民來源國和移民目的國人數排列前二十名國家的情況。歐洲和亞洲國家既是數以千萬的移民來源國，也是目的國。

前 20 位来源国和目的国移民人数（百万人）和占总人口的比例

来源国					目的国						
1995		2020		1995		2020		1995		2020	
国家	迁出移民 (%)	国家	迁出移民 (%)	国家	迁入移民 (%)	国家	迁入移民 (%)	国家	迁入移民 (%)	国家	迁入移民 (%)
俄罗斯联邦	1138	7.1	印度	17.79	1.3	美利坚合众国	24.60	9.3	美利坚合众国	43.43	13.1
印度	7.15	0.7	墨西哥	11.07	7.9	俄罗斯联邦	11.91	8.0	德国	14.22	17.0
墨西哥	6.95	7.0	俄罗斯联邦	10.65	6.8	德国	7.28	9.0	沙特阿拉伯	13.00	37.3
乌克兰	5.60	9.9	中国	9.80	0.7	印度	6.69	0.7	俄罗斯联邦	11.58	7.9
孟加拉国	5.37	4.5	孟加拉国	7.34	4.3	法国	5.96	10.3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8.92	13.1
中国	4.70	0.4	巴基斯坦	6.14	2.7	乌克兰	5.77	11.3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8.43	85.3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3.61	5.9	乌克兰	6.05	12.2	沙特阿拉伯	4.94	26.5	法国	8.09	12.4
巴基斯坦	3.33	2.6	菲律宾	6.01	5.2	加拿大	4.69	16.1	加拿大	7.81	20.7
哈萨克斯坦	3.30	17.2	波兰	4.82	11.3	澳大利亚	4.11	22.9	澳大利亚	7.41	29.1
意大利	3.20	5.3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4.62	6.4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3.99	6.9	西班牙	6.63	14.2
德国	3.04	3.6	印度尼西亚	4.58	1.6	哈萨克斯坦	2.89	18.3	意大利	6.13	10.1
土耳其	2.73	4.5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4.49	13.6	巴基斯坦	2.46	2.0	乌克兰	4.57	10.4
菲律宾	2.43	3.4	哈萨克斯坦	4.20	18.3	中国香港	2.09	24.4	印度	4.48	0.3
印度尼西亚	1.93	1.0	罗马尼亚	3.98	17.1	科特迪瓦	2.02	14.2	泰国	3.53	5.1
葡萄牙	1.91	15.9	德国	3.85	4.4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78	7.36	哈萨克斯坦	3.39	18.1
摩洛哥	1.88	6.5	埃及	3.57	3.4	意大利	1.70	3.0	马来西亚	3.08	9.5
波兰	1.76	4.4	土耳其	3.28	3.7	以色列	1.55	29.5	科威特	2.98	69.8
白俄罗斯	1.74	14.7	摩洛哥	3.25	8.1	约旦	1.53	33.4	中国香港	2.85	38.1
大韩民国	1.68	3.6	意大利	3.25	5.1	阿根廷	1.51	4.3	约旦	2.69	26.4
阿富汗	1.67	8.5	越南	3.07	3.1	乌兹别克斯坦	1.43	6.3	日本	2.49	2.0

来源：UNDP, 2020; UN DESA, 2021.

注：乌兹别克斯坦直至 2000 年才有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评分。彼时，人类发展指数将乌兹别克斯坦归类为中等人类发展指数国家。根据联合国经社部的定义，迁出移民是“出生于国外的”，所以主要的政治变化（例如 1947 年印巴分治，苏联解体）能否反应在数据中（更多关于定义的讨论请见第二章）。一些国际移民类别没有出现在表中（统计方法请见附录 C）。

二十五年来，移民来源国的前二十名只有**4个国家**发生了变化：1995 年的前二十名中包括葡萄牙、白俄罗斯、韩国以及阿富汗，但现在已被委内瑞拉、罗马尼亚、埃及和越南所取代。中等人类发展指数的移民来源国变得更少，而人类发展指数低的来源国甚至消失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各国的發展進步和國家的重新分類有關。高人类发展指数和極高人类发展指数國家作為移民來源國的普遍性已相當明顯，佔據了前二十個來源國中的**16個**！

移民目的國與移民來源國相比，排名前二十位的變化更為明顯：有**5個國家**退出了名單——巴基斯坦、象牙海岸、阿根廷、以色列和烏茲別克，取而代之的是西班牙、泰國、馬來西亞、科威特和日本。目前

排名前二十位的大多數移民目的國的移民人數均大幅增加，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國、沙特、德國、英國和阿聯酋。這表明，長期存在的國家對國家的“**移民走廊**”（corridors）依然是國際移民的主要途徑。

移民趨勢

國際移民已經發展成為家庭、家族和社群實現機會的一種必要手段。大多數國際移民（76%即1.9億人）居住在人類發展指數極高的國家，排名前10位的所有目的國都是人類發展指數極高的國家，其餘目的國也大多是人類發展指數極高的國家或高人類發展指數的國家，這符合移民長期趨勢和現有認知。

有趣的是，國際移民集中在人類發展指數極高和較高的國家。前二十個移民來源國的大多數也都是人類發展指數極高的國家（8個）或發展指數較高的國家（8個）。人類發展指數極高的國家產生了高比例的遷出移民（4.6%），超過了其他水準國家，共產生了7600萬移民，僅次於高人類發展指數的國家（8600萬國際移民）。更多的遷出移民出生在較富裕國家，而且希望移居到其他較富裕國家。較富裕國家遷出移民的比例雖各不相同，但有兩個重要的變革進程卻是共同的：

- 人類發展指數分類方式的重大變化；
- 高度發達國家遷入和遷出移民現象的加劇。

中等和較低人類發展指數的國家移民人數和比例較低，前二十個移民來源國只有4個來源國是中等人類發展指數國家。人類發展指數低的國家遷出移民則更少。

“階梯上升”原則

很少有人向人類發展指數低的國家遷移；更多人遷移到人類發展指數中等的國家；然後更多人再遷移到人類發展指數高的國家，而遷移到人類發展指數極高的國家的移民人數最多。

隨著時間的推移，從人類發展水準高的國家向水準極高的國家的移民現象十分明顯，自1995年以來顯著增加，人類發展指數極高國家的遷入和遷出移民，是現有移民趨勢下的一個非常清晰的特徵。

更有意義的是政策因素，以及各國的簽證和流動政策如何演變——這種政策可以使移民選擇從“不可能的夢想”轉變為具體的選擇，導致流動的不平等性正在加劇。

移民模式

移民政策主要是在國家一級制定和實施的，往往受到國家之間在雙邊層面（即兩個實體之間）地緣政治關係的影響，並可能導致兩個或更多國家之間達成互免簽證安排。例如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之間的《跨塔斯曼海旅遊協定》、俄羅斯與韓國之間的互免簽證協議，以及歐盟和巴巴多斯之間關於短期停留簽證豁免的協定。目前類似的雙邊協議有數百項。

政策有助於各國建立應對國內（如技能短缺）和國外（如雙邊關係）變化的制度，並確定誰可以進入一個國家。因此，出於為政策進程提供資訊的需要，數據對於確定區域遷出、遷入和區域內移民的趨勢十分重要。擁有資源、知識和專長的國家能夠捕捉、分析數據，以便提早做出政策反應，特別是在常規移民方面。

另一方面，關於發生在管制之外或違反管制的非常規移民數據，是基於可用於為政策制定進程提供資訊的現有小規模數據的估計和預測。而各國制定移民政策，如雙邊簽證協議或雙邊勞工移民協議，需要在全面分析框架的指導下覆蓋來源國和目的國相關數據和趨勢的系統性程式。在很大程度上，由於主要關注的是雙邊談判和協議制定，因此，重點必然放在國家一級的移民動態、趨勢和數據上。

簽證政策作為人口流動的控制措施，使得每個國家都能對潛在入境者（如商務旅遊者、遊客、學生和移民勞工）行使**境外控制**。鑒於與非國民入境和停留相關的單一國家層面的政策數量且具有複雜性，大多數分析都是在國家層面進行的。不過，簽證政策在1995-2019年間（2020-22年疫情除外）有所發展，邊境管制、入境和出境政策**日趨嚴格**。目的國制訂協定，給予其盟國自由入境簽證，卻對欠發達國家或認為不友好的國家加以限制。相較於發展中國家公民，高人類發展指數國家的公民因此獲得更多移民機會。從長期來看，這會導致國家間的結構性不平等，進一步加深國家和區域之間的人口流動不平等，並造成更大的移民壓力，也導致人口販運和移民走私更加盛行。

嚴苛的法律要求會阻止一些移民選擇更理想的目的國，而監管制度較寬鬆的國家會在不知不覺中創造一種缺乏有效監管和充足資源的環境，使得非常規移民快速發展。確保常規移民的安全環境對於減少移民者面臨的風險十分重要，否則他們別無選擇，只能選擇非常規移民方式。人員、貨物和服務的自由流動以及基於成員國之間相互理解的勞務環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區域內與移民相關的風險。

使人口流动更便捷的区域协定

以代表全球各地區流動的協定，如申根國和西非經共體（ECOWAS）關於自由流動的議定書為例說明，在雙邊安排的基礎上，通過多邊方式達成的人口流動協議有助於推動人口流動、支持發展、進一步實現公平並減少包括與販運和走私相關在內的壓力。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協議產生了不同的變化，在實施人口自由流動的方式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自1985年以來，申根協定逐步發展，一方面取消了成員國之間內部邊界檢查的同時，另一方面加強了申根地區的外部邊界。儘管一些事件（如2015-2016年申根地區大規模的難民流入和內部流動以及疫情大流行）對歐盟邊境、入境和庇護/難民政策等方面構成了很大壓力，但申根協定仍然完好無損，四億歐洲公民依然在申根區內部正常自由流動。

下圖為申根協定成員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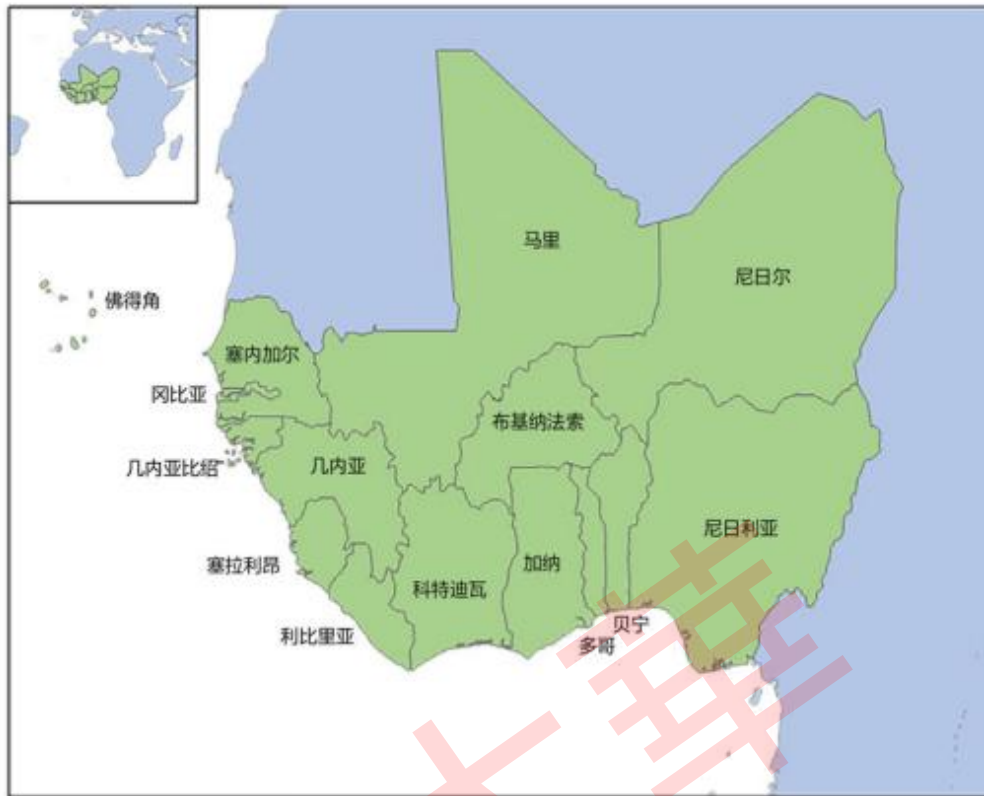
申根地区成员国



在全球高人類發展指數的國家中，申根成員國占**39%**（66個國家中的26個），但申根國的移民增長比例遠遠高於非申根國。

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流動自由化自1979年以來持續進行。最初貨物、服務、人員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加上該區域各國發展不平衡及成員國之間出現衝突，各國開始弱化自由流動這一概念，因此跨國流動受到了更加嚴格的管控。因國家安全的重要性被置於貿易利益之上——利比理亞因爭奪資源而發生的衝突以及成員國之間非常規移民的增加，導致一些現行政策被削弱。另一方面，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也缺乏一個能夠用於監控販運人口、武器和毒品等問題的有效機制。想要減少來自西非國家的非常規移民，其關鍵不在於限制人口流動，而在於使人們更普遍地認識到非常規移民的風險，並增加區域內的人口流動帶來的創業和發展機會。

西非经共同体成员国



涉及西非經共體國家的移民幾乎完全局限於該區域成員國之間。與申根區相比，這裏的移民規模較小，並且西非經共體的大多數國家被歸納為低人類發展指數國家。儘管存在這些差異，但機制的相似性體現在人口流動比例的相似性。平均每年有1000萬國際移民遷入或遷出西非經共體國家，其中超過600萬人在西非經共體內部流動——事實再次證明——當人們有能力通過移民獲得更多機會時，多數人會選擇這樣做。

本章總結

關於移民的長期敘事是以機會這一概念為基礎，即國際移民旨在創造更美好的生活。移民已與成就及個人、家庭、社群和國家的社會、經濟進步緊密相連。但必須看到：國際移民提供的機會已遠不如從前，

發展中國家數以百萬的國際移民通道不僅沒能成為一個機會階梯，還**进一步变窄了**。

近二十五年來，來自低水準人類發展指數和中等水準人類發展指數國家的移民雖有增加，但增幅有限。移民願望與移民基礎設施兩個因素的結合並未導致來自低水準人類發展指數和中等水準人類發展指數國家的國際移民高速增長，在歷史上來自低收入國家的國際移民一直非常有限。

有悖於以往對高收入國家遷出移民的理解——即隨著國家收入水準提高並超過某一閾值，國際移民率將會下降，現在來自高水準人類發展指數和極高水準人類發展指數國家的遷出移民的規模和比例顯著增加。事實上，世界出現了“兩極化”效應：移民活動漸與高度發達國家相聯系。這種關聯性使簽證准入和相關移民政策成為關鍵。世界各地的潛在移民的願望，是希望通過國際移民獲得機會，但卻無法做到。富裕國家的公民比貧窮國家的公民**更容易**進入受管制的人口流動體系中。

第五章 虛假信息對移民的影響

生活中許多領域都受到虛假資訊影響。虛假資訊是古老的現象，但它也把數字環境作為滋生土壤。在擴大獲取和表達資訊的機會方面，數字技術是革命性的，創造了一個新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操縱資訊和協調開展針對個人、群體（包括移民）、組織甚至國家的惡意活動變得更加容易。

監管並沒有與時俱進。全球大約一半人口也就是近70%的15至24歲的人都在上網，其線上活動大部分由少數科技大企業主導。世界上最大的社交媒體“臉書”擁有28.5億用戶，且擁有10億用戶的WhatsApp。在此類平臺上，虛假資訊傳播的速度、規模十分可觀。

長期以來，各平臺一直很難遏制有關移民的虛假資訊以及相關的激進言論。然而，反移民的虛假資訊不能僅僅歸咎於技術。激進勢力網上網下動員，新聞媒體和政客們則歪曲移民問題，誤導公眾。疫情更加劇了關於移民的虛假資訊，移民被認為擴散了病毒或導致了病例的增加——最終這次疫情造就了許多國家極端主義意識形態重新抬頭。同時，虛假資訊直接影響了移民以及潛在移民。許多人缺乏可靠資訊來指導移民選擇，經常被網路中流傳的謠言和虛假說法造成的障礙所困擾。

對網上虛假資訊採取有效的反制措施絕非易事。這些問題複雜、難以厘清，目前沒有任何單一方法是全策，需要由各種利益相關方，包括科技企業、決策者、研究人員、媒體和企業家等共同推進。

本章節引用了一些反移民的虛假資訊的事例，提供對資訊環境結構的全面理解，從而使破除移民虛假資訊成為可能，並概述了擬定的反制對策。

“虛假資訊”通常以**其邪惡意图**為準，是指為了經濟、政治或社會利益製造或傳播的虛假資訊，目的是欺騙公眾；而“錯誤資訊”是在**沒有欺騙意图**情況下分享的假資訊。實際上，虛假資訊和錯誤資訊往往重疊。例如，虛假資訊可能會宣傳關於移民的錯誤故事，而公眾可能會相信並分享這些故事，信以為真。

关键定义

虛假資訊(Disinformation):被故意製造傳播的錯誤的資訊。

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由於失誤而產生或傳播的錯誤的資訊。

資訊真空(Information void):缺乏可靠資訊的重大議題。

虛幻真相效應(Illusory truth effect):反復接觸後相信虛假資訊的傾向。

不良行為者(Bad actors):故意製造和傳播虛假資訊的人。

協同性運動(Coordinated campaign):協同操縱輿論的不良行為體網路。

放大器(Amplifiers):在其網路中傳播虛假資訊有影響力的人。

超黨派媒體(Hyperpartisan media):具有強烈意識形態立場的媒體。

捏造的內容(Fabricated content):完全虛假的內容。

受操縱的內容(Manipulated content):被歪曲的真實內容。

脫離語境內容(Decontextualized content):脫離了原背景的真實內容。

虛假資訊的危害(Disinformation harms):虛假資訊對個人、團體和社會的消極影響。

仇恨言論(Hate speech):以某人或某一群體的身份為由，對其使用貶義或歧視性語言。。

仇外心理(Xenophobia):由於個人或群體的真实或被認為的地理起源而被剝奪平等權利。

詞義解釋

當一個主題對資訊需求量很高，但缺乏可靠資訊時，就會出現“**信息真空**”。比如疫情初期，人們對病毒相關資訊需求量很高，但可靠的科學資訊供應卻很少。這種不足造成一種真空，使虛假資訊和謠言得以流傳。隨著時間推移，反復接觸虛假資訊會產生一種“**虛幻真相效應**”——因為熟悉的資訊更容易回憶起來，看起來更可靠。所以，糾正虛假資訊的最佳做法是避免不必要地重複虛假說法。

“不良行為者”是指那些故意製造和傳播虛假資訊者的總稱。他們可能是國家、公司、社會運動或個人，其動機跨越政治、意識形態和經濟利益範圍，其目標受眾和參與協同程度也有很大不同。

“放大器”是媒介專家、政客、名人和網紅，無論是否有意，通過其龐大網路傳播虛假資訊，幫助普及虛假資訊。

“超黨派媒體”是經常放大虛假資訊的意識形態管道。例如在美國，超黨派媒體經常證實虛假故事，從經濟到國際關係議題上推動虛假資訊的宣傳議程。尤其是針對移民的虛假資訊的散播與極右、民族主義和仇外意識形態的媒體高度同步。

“捏造的內容”包括完全虛構的內容，包括假新聞或完全由電腦技術產生的“深度偽造”（deep fake）視頻。

“受操纵的内容”是指被扭曲的真實內容，比較常見的是選擇性剪輯的視頻片段。例如，2019年線上視頻欺騙性地結合了比爾·蓋茨談話中的內容，造成其支持絕育和人口控制的印象，該視頻2021年重新出現在多個社交媒體平臺上。

“脱离语境的内容”是指已脫離其原始語境的真實內容，例如附上虛假標題的老照片，將其與當今事件聯繫起來。美墨邊境危機期間，對近100萬條推文分析，發現脫離語境的圖片是最突出常見的虛假資訊類型——也是最容易被高知名度網紅或個人分享放大的類型。

僅關注虛假資訊內容可能會掩蓋協同性虛假資訊宣傳的運作，不良行為者們通過網路合作、操縱公眾輿論。臉書在其官網公佈使用“**協同性不可信行為**”（coordinated inauthentic behaviour）這一概念描述了“共同誤導他人關於他們是誰或他們正在做什麼”的網頁和帳戶。這些組織活動延伸到多個平臺，其力量來源於無休止地重複移民和少數族群的負面故事產生的累積效應。

虛假資訊的危害伴隨著助長敵視、歧視移民的仇恨言論和仇外心理，反過來又合法化反移民政策和方針，同時對其決策和權利意識產生負面影響。

協同性运动

自2014年以來，反移民的虛假資訊攻擊增加了250%，預計這一趨勢將會持續——因為疫情造成的長期經濟衰退可能會造成政治不穩定。各國激進分子之間的合作也在快速增加。研究2015-2016年歐洲難民危機期間超過700萬條推文發現，反對2018年聯合國通過的《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約》的協同性運動負責制作了一半的針對關於聯合國《移民問題全球契約》的流行網路視頻，並製造各國將對批評移民的行為進行定罪的虛假說法。由於這些活動大多圍繞著穆斯林移民問題展開，應是仇視伊斯蘭教的不同極端團體的聯合行動。

網路虛假資訊就是一個涉及不同參與者和連續階段的演進過程。不良行為者們利用網路平臺作為推廣手段製造、推動和傳播虛假資訊，而受眾則基於其參與意願賦予虛假資訊以意義和影響力。

網路平臺促進了無成本或低成本以及有針對性的迅速傳播，使虛假資訊成為可能。參與度、推薦演算法和線上廣告亦激勵各種低質和聳人聽聞的內容。以往人們對不良行為者的瞭解大多來自研究人員和調查新聞，而不是平臺提供的數據。現在各平臺已主動採取措施刪除虛假帳戶，而獨立技術開發商已開發出許多可用的工具，識別受操縱內容和欺騙性活動。根據《歐盟虛假資訊自律守則》，平臺已減少對不良行為者的激勵，提高問責制，提供了更大的線上廣告的透明度。

受眾是此過程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因為虛假資訊只有找到願意支持或分享它的受眾時才會成為問題。許多因素影響著受眾對虛假資訊的接受程度，包括以往的知識與偏見、對虛假主張的反復接觸以及批判性審查新資訊的意願或能力。虛假資訊內容往往迎合了目標受眾

的現有偏見，並在激起憤怒方面具有高度煽動性。此領域干預措施的核心重點是教育與賦權舉措，以幫助受眾評估內容可信度。

然而，也必須瞭解到——技術不能脫離其他社會力量而獨立運作。最近對18個國家網路虛假資訊抵禦能力水準的研究發現，網路的脆弱性歸咎於以下因素：（a）以民粹主義和社會分化為特徵的**社會环境**；

（b）以新聞信任度低、公共服務媒體薄弱、廣告市場龐大和社交媒體使用頻繁為特徵的**媒体环境**。因此，要全面應對虛假資訊，就需要考慮解決這些因素。

背景

針對移民和少數族裔的虛假資訊宣傳活動在全球有很悠久的歷史。例如1903年俄羅斯出現的《錫安長老議定書》，預示著虛假故事、捏造證據和高知名度放大器將使當代虛假資訊更加生動。而這份偽造文獻被說成是被洩露的猶太人統治密謀——結果，這種陰謀論通過新聞、小冊子，以及包括美國工業家福特在內的主要公眾人物支持，在國際上受到關注，廣為傳播。從此案例中可得出一個重要教訓：成功傳播的虛假資訊會放大現有偏見，並依賴於傳播權力和影響力的結構。

社会与政治

在許多國家，高知名度的政治人物將有關移民的虛假資訊正常化，並依靠支持其政治主張的媒體做到這一點。而這些討論往往集中在經濟問題上——儘管失業率和工資緊縮是國家經濟政策導致的，而不是移民導致的，但公眾對經濟影響和社會變革的憂慮卻被成功轉移到了移民身上。典型的例子就是南非，無論各黨派的研究都一致證明移民給該國帶來了淨經濟利益，但卻被當作高失業率的替罪羊；在美國，特

朗普在2016年競選中引發了對墨西哥人湧入南部邊境的恐懼，並承諾“建牆”保護國家完整性。雖然特朗普言論主要針對墨西哥人，但超黨派媒體機構將這種恐懼情緒延伸到穆斯林身上；在英國，支持脫歐的言論主要針對來自東歐、中東的移民。合法歐盟移民經常被與尋求庇護者混為一談，因為脫歐運動激起了民眾對數百萬土耳其人即將到來的恐懼，而右翼媒體則放大了這些觀點。

同時，不良行為者們積極主張對精英和體制的不信任。在許多方面，所謂“**後真相危機**”（post-truth crisis）其實就是一場信任危機。疫情更導致信任進一步下降。2021年《愛德曼信任度調查報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指出——大多數受訪者認為政府領導（57%）、商業領袖（56%）和記者（59%）故意誤導公眾。而在其缺乏自由的國家，以國家導向的社交媒體反而為移民和流動人口提供了自我表達的機會。

媒体

媒體經常因負面報導移民受到批評。一些媒體將恐懼作為一種構思手段，導致關於移民犯罪、公共騷亂暴力的壞消息長期不斷。因此，新聞媒體為不良行為者提供了可被重新利用、脫離原有背景重新解構的故事，推動其宣傳議程。2015-2016年歐洲難民危機中，歐洲媒體誣陷抵達的難民在歐洲危機中推波助瀾，而對移民本身與其經歷卻很少給予關注。對移民的刻板印象和負面形象使“移民入侵”或“移民負擔”的話語長期存在，為偏見和敵視態度火上澆油。這些觀點與反移民政黨的崛起和政治中反移民言論的加劇有關。

當然，也有媒體揭露移民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新聞編輯資源不足，記者往往缺乏時間、金錢提供深入且符合移民情境的報導。記者也可能缺乏足夠培訓來實現這一目標，一些新聞編輯則受到政治和金融利益控制，導致自我審查（self-censorship）文化盛行。因此，許多媒體對移民的報導缺乏必要的情境資訊，膚淺、簡單化和消息閉塞，甚至帶有政治偏見。即使在媒體自由度高的國家，新聞報導也傾向於反映政府的優先事項和關切。

技術

雖然互聯網的出現為表達自由和獲取資訊提供了新領域，但網路世界仍由少部分企業所主導。這些企業的發展已遠超出了其最初重點——網上購物、網路搜索、社交網路，而成為整個社會經濟生活依賴的巨大基礎。其商業模式相對簡單：它們為用戶提供免費內容和服務，同時積累數據，通過個性化廣告和其他基於數據的服務產生收入。

由於這些平臺旨在最大限度提高參與度，而不是促進資訊交流或公民辯論，導致虛假資訊氾濫。參與度指標（流覽、喜歡、分享、粉絲和追隨者）激勵更能吸引注意力的內容，包括各種假資訊，而不透明的演算法影響了內容創作，有時會推入極端主義和陰謀論的“兔子洞”（（rabbit hole））。作為廣告企業，穀歌和臉書涉嫌為虛假資訊的產生和氾濫提供資金——虛假資訊網站75%的廣告收入是通過穀歌獲得。社交媒體平臺催生了一種“**數字仇恨文化**”：以前民族主義、種族主義和仇外言論較為邊緣化，僅僅存在於邊緣網站，而現在它們卻在流行的社交媒體平臺上獲得了更廣泛的受眾。

雖然社交平臺對日常生活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但它們並沒有被要求建立與之相稱的治理和問責結構。為抵制假資訊，技術平臺與事實核查人員和媒體機構合作，開始嘗試對受眾進行干預。以前依賴人工審查評估內容，現在則由**技术或自动化的内容审核方法**構成平臺核心方法，主要優勢是可快速審查大量內容，但在準確性、可靠性和監督方面卻存在重大缺陷。比如對內容審核的監督外包給資訊匱乏的承包商之後，路透社的調查顯示，臉書演算法審核根本無法理解這些地區的語言。

虛假信息是移民有害观点的催化剂

最近一項調查虛假資訊如何在臉書上驅動對羅興亞難民的敵意研究歷時九個多月，分析了孟加拉和馬來西亞的臉書頁面上的帖子評論。80%孟加拉和77%馬來西亞帖子對羅興亞難民情緒都積極或中立的，但這些帖子產生的評論大多數都是負面的：在來自孟加拉的評論中占58%、馬來西亞的評論中占70%。負面評論中的普遍主題都是難民獲得了各種優惠待遇，使東道國的資源更緊張。這些內容和相關主張在整個事件期間愈演愈烈，導致對羅興亞人的社交媒體敵視與線下同時發生。

後真相危機也是一場信任危機。數字通信快速發展，卻沒有制定充分的規範來指導人們在網上相信誰或相信什麼。因此，許多企業已經開發了新工具檢測虛假資訊，並為用戶提供指導。例如，免費驗證平臺“**InVid**”可以評估線上視頻的可信度；“**Logically**”結合了人工和智能來評估線上資料和故事的可信度。主要科技企業和媒體，包括微軟、Twitter、BBC和Adobe已成立了《**内容真实性倡议**》，為可信的線

上內容制定標準。雖然不良行為者勢必尋求新方法來逃避檢測，但長久意義為網上資訊的生產和接收制定了標準規範。

建立能够应对虚假信息的社会韧性

認知能力低、專題知識少和媒體素養薄弱的人群更易接受虛假資訊。研究發現，老年人和有強烈黨派偏見的人更有可能相信虛假資訊。在許多國家，關於移民的虛假資訊受公眾知識水準低下影響，也和對移民有敵意的民族主義情緒抬頭相關——這都促成了反移民的假資訊。然而，情景因素（如停下來思考、資訊準確性）和認知因素（如評估資訊能力）比已有的知識或黨派偏見更重要——以受眾為中心的反制措施可能會產生重大影響。

信息纠正和预先揭穿:

提供正確資訊無疑可以減少對移民的負面態度，同時也可以增加事實性知識。更正的內容和形式都很重要——因為僅僅說明資訊錯誤，對消除誤解作用不大。相比之下，提供解釋會更有效，因為能幫助受眾更新知識。但形式也很重要，因為聽眾可能只流覽內容。如果更正時沒有優先考慮正確資訊，或過分強調錯誤說法，則會忽略重要事實。最佳實踐建議採用“真相三明治”方法（truth sandwich），即在解釋虛假資訊的性質和為什麼它是不正確之前，先給出正確的資訊，最後再次加強正確資訊。

資訊纠正（correction）是一種在虛假資訊傳播後對其做出反應的防禦性策略。但考慮到流通中的虛假資訊的數量以及接觸到所有接觸過這些資訊的人的挑戰，此策略有一定的局限性。

预先揭穿（pre-bunking）是一種進攻性策略，它可以預見虛假資訊，並對公眾發出關於操縱策略（manipulation tactics）的警告。此方法核心思想是：一旦人們學會了識別操縱策略，並且已掌握正確資訊，遇到虛假資訊時就能夠拒絕它。預先揭穿的優勢在於規模，因為它可嵌入媒體文字材料中，並通過網路遊戲和其他吸引人的形式傳播。比如2018年，荷蘭研究人員與媒體平臺合作，開發了“壞消息遊戲”——在這款免費遊戲中，玩家使用誤導性策略建立自己的假新聞帝國。另一項由一萬五千名志願者加入的大規模測試發現，玩家在遊戲後識別和抵制虛假資訊能力得到提高，不管其教育程度、年齡、意識形態和認知風格如何。

阻止虛假信息传播

目前有種傾向令人不安——認為虛假資訊分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指向公眾信仰水準。但來自非洲、亞洲和歐洲的研究表明，人們分享虛假資訊有多種原因，包括自我表達、娛樂和希望警告他人注意潛在危險。有一個動機值得注意：虛假資訊經常利用人們情緒，產生對親人和所在社群安全受威脅的恐懼。在此情況下，向他人提供資訊的願望和成為第一個分享新資訊的人的社會願望助長了虛假資訊的傳播。因此，關鍵在於如何利用民眾的公民責任感來鼓勵積極實踐。

科學研究發現，只要人們停下腳步，思考資訊的準確性，就能極大提高他們拒絕虛假資訊的能力，同時也能減少其分享虛假資訊的意圖。大多數平臺通過在內容上附加資訊標籤，探索了這種方法的一個解決方案。目前許多媒體活動普遍支持“停下來思考”（stop thinking）的資訊。最典型的就是疫情期間，聯合國發起的“暫停”（pause）活

動鼓勵人們網上分享資訊之前先思考。該活動由視頻、圖片和動畫組成，強調了只分享可信賴和準確基於科學的社交媒體內容的重要性。

可信賴与易获得的信息来源

虛假資訊糾正通常依靠專家資訊來源，一般來說專家被認為比同輩更可信。然而，值得信賴有時比專業知識更重要。這種情況下，受信任的同輩在助推可靠資訊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例如為抵制疫情假資訊，“聯合國驗證”倡議一種新方法，邀請人們成為資訊志願者，每天接收可靠資訊，並優化資訊以便社交分享。疫情是推進**同輩领导运动**的催化劑，這類方法也開始用於移民領域。例如哥斯大黎加“口口相傳的錯誤”運動（the Mistakes by Word of Mouth）依靠**参与原则**和**值得信任的同輩**來抵制關於移民的謠言。通過根據受眾喜歡的形式、管道定制資訊，可靠資訊就會為目標受眾接受。對許多人來說，視覺資訊比文字更有吸引力，也更容易獲取。

问题与挑战

知识缺口：

在虛假資訊的影響及其反制措施的有效性方面，存在著巨大的知識缺口。虛假資訊最初由一個可靠來源提供時，人們在糾正之前已多次接觸虛假資訊時，最初接觸和糾正之間有時間延遲時，糾正效果較差。糾正可能會減少錯誤認知，但**并不能**改變人們的潛在態度。

平台监管：

技術平臺虛假資訊的重大知識缺口持續存在，意味著自我監管失敗。為關注虛假資訊並對相關問題給予回應，各平臺目前均採取了透明倡議，但這種沒有問責制的透明收效甚微。問責制應由有能力和許可權

的專家獨立監督或審計，以公眾利益和保護基本權利為前提進行評估。

定义模糊：

虛假資訊一詞被泛化到所有被認為有問題或令人反感的內容。一些國家雖已出臺反對虛假資訊的新法律，但虛假資訊的定義模糊為立法帶來了挑戰，並產生了更廣泛的影響——這些法律是否會因此對言論自由造成潛在的寒蟬效應，如何平衡基本權利和減輕公眾傷害一直備受爭議。

許多情況下，虛假資訊、觀點與對證據的解釋之間的界限並不明確。社會、政治性質問題帶來了特殊難題，因為事實往往並不絕對。例如關於移民問題，一直在爭論如何評估關於移民犯罪的統計數據，這一話題激發了媒體的轟動報導和反移民人士的激進主義。

其他情況下，不良行為者製作內容的類型本不符合事實，例如針對移民的在使用諷刺和玩笑方面表現出一種“惡意創造力”，但這種內容非常棘手，往往不屬於事實主張的範疇，且模糊性質給確定其違法意圖的定性帶來了困難。

以下是針對政策制定者、技術平臺、非政府組織、媒體和研究人員的廣泛建議：

决策者：

- 要求數字平臺承擔更大責任；
- 制定數字平臺共同監管機制；
- 與利益相關方接觸，確保應對措施得當，符合最佳循證實踐；

—投資監測、評估和打擊虛假資訊的舉措。

技術平台：

- 為研究監督提供足夠的數據訪問許可權；
- 在所有可能出現有害虛假資訊活動地區開展干預措施；
- 與經過審查的利益相關方合作，及時發現威脅；
- 為標籤化處理線上資訊制定並嵌入最佳的實踐規範。

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利益相关方：

- 確保移民能夠獲得可靠及可用資訊；
- 為記者提供培訓和資源，以便負責任地報導移民問題、並避免有關移民的虛假資訊；
- 以易獲取的形式提供反對虛假主張的重複性糾正資訊；
- 對公眾進行媒體素養和虛假資訊方面的教育。

研究人員：

- 研究反制措施的有效性；
- 與資源匱乏國家的研究人員合作，減少地緣鴻溝。

移民需要獲得可靠資訊，而虛假資訊運動已具有跨國性質。需要加強跨部門、跨國界合作，以發現和打擊虛假資訊運動，在移民問題上尤其如此。疫情的一個積極成果是它促進和鞏固了更多的國際合作，如“疫情真相聯盟”——該聯盟於2020年啟動，聯合了來自70個國家的100多名事實核查員，使各國從共用資源和數據庫中受益。

第六章 气候变化對移民的影响

過去十年裏，氣候變化與移民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受關注，如今人們更加意識到解決這個複雜問題的必要性，體現在全球原則的發展上，如《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約》所闡述的原則，以及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通過制定的建議，探尋如何解決、支持各國在不斷變化的氣候中，以益於受影響的人口的方式管理移民。

一些國家試圖解決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對移民的挑戰，即便如此，這種努力仍然相對有限。主要困難是所涉問題的複雜性——移民的決定往往是由不同因素共同決定的。而不利氣候影響下的移民原因是多元的——各種環境和氣候因素都會影響遷移的決定或必要性，如颱風和洪水等突發性災害，以及如海平面上升和土地退化等緩發性過程。

另一個複雜問題是，在環境變化的背景下，移民形式也逐漸多樣化：人們的遷移或近或遠、或在國內或跨越國界、或短期或永久。2010年《坎昆適應框架》是第一個涉及移民問題的重要氣候政策檔，提到了氣候變化引起的流離失所、移民和有計畫的遷移的概念，概述了從

以強迫形式到以自願形式發生的移民行為的連續體，以及氣候變化對流動停滯和被困人口的影響。

緩慢發生的氣候變化，特別是極端高溫 and 乾燥條件（即極端性的降水減少或乾旱），比突發性災害事件更可能增加移民的規模。當這些變化再與其它因素（如武裝衝突）結合在一起時，會產生更複雜的流動模式。

“由於發生了戰爭，我們沒有得到政府的任何支持。因此，有些綜合因素——旱災和戰爭，使我們飽受苦難。如果戰爭沒有發生，那麼我們也許可以留下來，但現在土地被劫掠，我們沒有辦法索賠。”

——聯合國難民署和聯合國大學的研究人員收集、調查東非難民和境內流離失所者的證詞。

人類現處在生態危機的十字路口：生態系統越來越受到緩發性環境事件和變化過程的威脅。例如持續的熱浪導致農業用地的損失和生產力的下降；海平面上升和鹽水入侵威脅到淡水資源——直接影響到人類安全，減少了基本資源，如食物和水，並產生其他間接影響，如自然資源更加稀缺時會爆發衝突。對人類安全的威脅反過來也促使更多人移民，以尋找獲得其他收入和滿足其生存需求的方法。

缓发性气候变化影响与移民

“移民”作為一個總括性術語，也包括了在氣候和環境變化背景下發生的被迫和自願的流動形式。當人們為了應對降雨改變導致生計受影響而進行遷移時，他們往往採取**循环或季节性迁移**模式，在不同的地點之間反復遷移，而不是永久性遷移。這種遷移模式的目的不僅是

在降雨量不穩定的時期彌補損失的收入，也是保持與留守在原籍地的家庭和社區的聯繫。

“我的祖父、父親和我都在這些土地上工作。但時代已經改變了...現在雨下得晚了，所以我們的產量減少了。唯一的解決辦法只有離開至少是離開一段時間。每年我都要在懷俄明州工作3到5個月——這是我的主要收入來源。但是讓我永遠離開我的村莊？不，我在這裏長大，也將繼續留在這裏。”

——由環境變化和被迫移民情景研究專案（EACH-FOR）收集的、描述了墨西哥農村的情況以及向美國移民的經歷。

當人們為了應對收入減少而選擇移民時，他們很少會跨越國際邊界。人們一般會盡可能就近遷移來尋找其他工作。有時並非家庭全部成員會一起搬家，而是一個家庭成員先搬遷，只有隨著情況惡化，整個家庭才搬遷到了新的地方。

“我搬到附近的集鎮去賣產品，到那裏需要步行五小時。我還在鎮上當木匠。當下雨的時候，我就會回來種地.....由於我的缺席，我的妻子無法獨自維持農活的運作，所以有一次，當很久沒有下雨的時候，全家人都決定搬到集鎮上。”

——由為聯合國難民署和聯合國大學的研究人員收集、研究居住在東非難民營中的難民和境內流離失所者的原因。

与气候和环境影响有关的移民数据

近年來，關於移民、環境和氣候變化之間聯繫的知識和證據的成果已大量增加，使人們能夠更好地瞭解環境影響——包括緩發性氣候事件

和災害，如何影響全球、區域、國家和地方的移民模式。乾旱和荒漠化都是緩慢發生的事件，是收集與氣候遷移有關的案例研究最多的災害。

被引用最多和受到廣泛認可的主要數據來源是“境內流離失所問題監測中心”（IDMC）發佈的關於流離失所問題的年度報告，該報告彙編了與災難有關的流離失所資訊。2020年，在145個國家和地區發生的災害引發了3070萬新增流離失所者，其中有4.6萬人因極端氣溫流離失所；3.2萬人因乾旱流離失所。在2008-2020年期間，超過240萬新增流離失所者是乾旱造成的，超過110萬是極端氣溫造成的。但並非所有國家都報告了緩發性災害所引發的流離失所。

緩發性災害可以促成突發性災難。例如海平面上升會引發洪水，氣溫上升可能導致熱浪。生活在災難導致的流離失所高發地區，人們會逐漸無法應對緩發性災害對他們依賴環境的生計（如漁業或農業）所造成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如西非的沿海地區，緩發性氣候變化過程與突發性災害結合在一起，可能會影響人們移民的決定。例如在馬達加斯加，對乾旱影響的監測顯示，自2013年以來，該國南部經歷的長期乾旱導致越來越多的人從南部遷移到該國其他地區，一些村莊的人口甚至減少了30%；在蒙古，數十萬人從同一省份的農村地區向城市遷移與極度嚴寒（蒙古特有的週期性、緩慢發生的氣象，特點是夏季乾旱、冬季嚴寒，草場惡化和缺水）密切關聯；2019年，在索馬里，近70萬名境內流離失所者中，67%因為乾旱而遷移。

《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在摩洛哥收集的資訊中，強調了環境變化是如何影響移民決定的。在調查中，雖然大多數受訪者表示，缺乏就

業是他們移民的主因，然而，環境變化（如乾旱和農業生產力下降）對他們的移民決定起了主要或部分作用。

未来预测

另一類經常受到公眾關注的涉及到對氣候移民數量的未來預測，可以使人們注意到問題的潛在規模，並給政策制定者施加一種緊迫感。但在提出預測時必須小心，特別是在移民這樣一個兩極分化的話題上。對龐大數字的簡單分析可能導致容易引發恐慌而被廣泛傳播，從而對公眾的看法和決策選擇產生負面影響。

世界銀行在2018年發佈的一份開創性報告估計，如果缺少全球國家層面的緊急氣候行動，到2050年，世界三個地區（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亞和拉丁美洲）的1.43億人可能因為氣候帶來的不利影響而在國內遷移。報告強調，由於緩發性氣候變化的影響，如農作物生產力下降、水資源短缺和海平面上升，貧窮的人群被迫遷移。此外，《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的研究表明，到2059年，乾旱環境下的非洲移民人數會增加約2200萬，南美洲增加1200萬，亞洲增加1000萬。到2100年，美國和孟加拉的移民人數將因海平面上升而增加；氣溫上升也會導致向歐盟申請庇護的人數增加。

高危人群

緩發性災害造成的不利影響預計會惡化。世界許多地方都有關於高危人群的數據。氣溫上升是一個愈發受到關注的問題，因為暴露在高溫下不僅會影響環境的宜居性，還可能導致勞動生產力的損失。例如，2017年的一份報告估計，如果全球溫度上升1.5°C，將有3000萬至6000萬人生活在炎熱之下，氣溫過高導致人類無法正常工作；全球變暖將

使數以百萬的人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威脅，氣溫上升1°C會使2.2%的全球人口直接面臨海平面上升的威脅。

雖然許多個人和家庭可能會通過遷移來應對氣候影響，但很明顯，並非所有生活在風險地區的人都希望或有機會移民。只有無法做出適當的決策時，面臨風險的人從受影響地區被迫遷出。

有時很難區分氣候因素與促使人們決定移民的其他社會、經濟、政治和安全因素，尤其適用於緩發性災害，因為它們通常不會立即導致大規模移民。許多被認為因經濟原因遷移的移民，其中部分可能是由於氣候對其生計的影響。無疑，不穩定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因素交織在一起時，人口流動更會加劇國家的脆弱性並導致衝突。

全球气候政策和移民政策发展

移民和氣候變化的話題已經越來越多地被納入聯合國及其它框架下進行的全球政策討論中。2015年，《巴黎氣候變化協定》授權在關於損失和損害問題的《華沙國際機制》內設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流離失所問題工作組”（UNFCCC），由具有互補性專業知識的成員組成。通過協商，就如何解決氣候變化背景下的流離失所移民問題提出建議。這些建議是針對《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國、聯合國系統和其他利益相關方的。建議的要點包括：

（a）促請各國制定法律、政策和戰略，以處理與氣候影響有關的所有形式的移民，同時考慮到各國的人權義務；

（b）促請各國在不利的氣候影響背景下促進有序、安全和正常的移民，並與在《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約》下開展的工作產生協同作用。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締約國在2018年就認可了這些建議，並將流離失所問題工作組的任命期限延長，體現了在氣候談判的議程上保留移民討論符合各國利益——這也開始影響國家層面的決策，例如塔吉克和吉爾吉斯政府正在審查其國家政策框架與流離失所問題工作組的建議的相符程度，並依此制定具體政策，在全國範圍內解決移民和氣候變化問題。

氣候移民是適應氣候影響和減少損失的一種方式，不同情況下，自願移民和有計畫的重新安置等流動形式既可以是一種損害的形式，也可以是一種適應措施。

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全球移民政策的討論越來越多與氣候和環境方面的問題同步進行。這方面的里程碑是聯合國2016年通過的《難民和移民紐約宣言》（簡稱《紐約宣言》），隨後各國在2018年又通過了《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約》（簡稱《**移民問題全球契約**》）。《移民問題全球契約》包括各國可以實施的行動：

- (a) 應對環境和氣候的移民誘因，包括緩發性的誘因；
- (b) 加強常規移民途徑的可用性和靈活性，例如為受氣候影響（包括緩發性災害）的人群提供簽證選擇。

《移民問題全球契約》只涉及國際移民，而在緩發性環境退化的情況下，許多移民行為是在國內進行的，例如，從農村到城市地區。從實施的角度來看，對國際移民的關注是外交部門或內政部門在發揮主導作用。執行《移民問題全球契約》的目標，對國內和國際移民都將產生積極的影響。為支持《移民問題全球契約》的實施而設立的**移民多**

伙伴信托基金已開始資助與氣候移民有關的聯合方案。各國已對資助移民方案表示了支持。

缓发性气候影响背景下的移民

由於氣候移民的多因性，不同領域的政策制定可以幫助解決這一關係的不同方面。在某些情況下，人們不可能留在被緩發性災害破壞的地區，也不可能再返回這些地區；在這種情況下，必要的對策是促進正常遷移。這方面是移民政策可以發揮重要作用的關鍵工作領域之一，例如通過提供常規移民選擇的雙邊勞工移民協議。

國際移民組織對**移民管理**的定義如下：

*“由負責移民的機構制定的政策、立法和行政框架的實施和運作的計畫方法。”*審查和擴大現有的政策做法將為移民帶來相對快速的積極變化，加強在應對極端氣候影響時防護能力，並為那些無法繼續留在或返回被緩發性環境影響破壞的地區的人們提供替代選擇。

在跨境移民方面，一項公認的應對方式是為那些由於緩發性氣候變化的影響而不能留在原籍地或返回原籍地的人制定**更多的簽證選擇**，例如向那些逃離極端環境惡化的人發放此類簽證，其模式類似於巴西在2010年海地地震後向海地移民提供人道簽證，或秘魯出於人道因素發放臨時簽證。對於已經在國外，但由於緩發性氣候影響而面臨回國困難的移民，可以採用其他移民管理方案，如實施廣泛的常規化方案，調整移民執法行動或給予居留許可。也可改進現有做法，如利用關於教育、培訓或勞工的雙邊協議，為那些最容易受到氣候影響的人提供替代選擇，並利用**区域自由流动协议**的規定，接納受影響的移民。在

有可能返回但返回的地區環境脆弱的情況下，與自願返回和重新融入社會的政策和方案相關的具體挑戰也是至關重要的。

在促進國內移民方面，確保移民政策考慮城市化問題尤為重要。世界上許多地區都有從農村地區向城市中心遷移的情況，這些地區可能會受到緩發性氣候事件的影響。在這些地區移民可能有多樣的謀生機會或更容易獲得基本社會服務。然而，城市也可能成為風險熱點地區，例如許多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面臨著緩發性氣候變化事件和過程，如熱浪、海岸侵蝕、乾旱和海平面上升。因此，移民管理政策需要考慮到這些方面，例如由孟加拉牽頭的倡議，鼓勵國內移民不要遷往大城市，而是遷往更具氣候適應性和對移民更加友好的二級城市。

有計畫的搬遷政策對於促進安全和有序的移民也是重要的。已有60多個國家生活在因緩發性退化（如海平面上升）而被不可逆轉地破壞的整個社區居民，已經開始有計畫地搬遷。未來可能需要管理更多的計畫性搬遷——通常被認為是最後的選擇。預計大多數計畫中的搬遷將在境內進行，也可能跨國界進行，例如在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脅的小島嶼發展中國家——這反過來會引發複雜的國際法挑戰。從氣候移民的損失和損害框架的角度來看，這種政策選擇可能是一把雙刃劍。為移民和有計畫的搬遷提供便利，可以通過減少對不利氣候影響的暴露來減少損失和損害，但也可能給移民和收容國社區帶來損害。

最大限度扩大移民对气候行动的贡献

在某些情況下，匯款可以為發展中國家（如某些島嶼發展中國家）提供氣候融資的替代來源，也可以促進個人和社區層面的韌性建設，例如當移民能夠建造具有氣候韌性的房屋，或投資於不受氣候影響的社

區的基礎設施。當移民獲得新的技能和教育時，移民匯款也會在建設應對氣候衝擊的韌性方面發揮關鍵作用。例如在塔吉克，海外僑民的匯款越來越多地被用於創建企業和社區農業，為一個更具氣候適應性的未來創造機會。然而，政府需要為移民提供激勵措施，以鼓勵他們加大國家和社區對氣候變化的抵禦能力上的投資，因為移民缺乏必要的資訊或技術知識來引導將匯款用於氣候行動。支持移民投資的政策措施的這方面例子有墨西哥的“3×1移民計畫”，以及塞內加“向僑民貸款計畫”等。

实践案例

近年來，為解決與氣候影響和環境變化相關的移民問題，相關的國家和地區已經制定了應對措施，這表明國際社會對氣候移民的認知正在不斷提升，也有解決這個問題的強烈意願。現有的政策一般不將緩發性災害有關的移民和與突發災害有關的流動區分開來。這些政策可以成為專門旨在解決與氣候變化與移民有關問題的獨立機制。其他機制則強調其他領域的氣候移民問題，如移民和人口流動政策、氣候適應和緩解政策、減少災害風險的政策。這些政策範圍也不同：一些尋求解決國內的移民流動，而另一些則著眼於如何管理來自其他國家的移民潮。

瓦努阿图：

瓦努阿圖（Vanuatu）2018年制定了《氣候變化和災害所致流離失所問題國家政策》，包括與緩發性氣候影響有關的移民，如海岸侵蝕、環境退化、海平面上升和乾旱。這項政策旨在推動政府一體行動以儘量減少流離失所的誘因，確保在充分尊重人權的情況下，有尊嚴地進行有計畫遷移，並為流動的人口制定可持續解決方案。這項政策還強調，管理良好、安全的國內移民可以成為適應氣候影響的一項戰略。

政策顯然符合全球原則框架，如流離失所問題工作組的建議以及太平洋地區正在進行的區域工作。

南美洲：

南美洲移民會議是一個關於移民問題的區域協商進程，其成員國2019年制訂了《關於保護跨國界流離失所者和受自然災害影響國家的移民的區域文書》，以保護因災害跨境的流離失所者。該準則主要關注突發事件，但也適用於與緩發性災害及其演進有關的行動。準則促進了基於人道理由的常規和**特殊移民法**的更多靈活應用，是一個創新的決策範例，說明各國可以在區域層面進行合作，最大限度減少移民的環境誘因，管理災民的入境和居留。

東非：

代表七個東非國家的政府間發展組織（簡稱IGAD或伊加特）在2020年通過了《伊加特地區人員自由流動議定書》。該議定書對災害的定義很寬泛，包括突發事件和緩發性環境破壞。它強調各國有責任為受災害影響的其他成員國公民入境、登記和居留及延期提供便利。

新西兰行动计划

該行動計畫由新西蘭外交部長辦公室制定，並由新西蘭內閣於2018年通過。該計畫承認太平洋島國的氣候影響波及新西蘭，其中包括了移民問題。同時也承認太平洋島國所表達的願望，即首先關注解決氣候導致的移民問題，以便人們能夠留在自己的國家安居樂業。因此，該計畫強調，新西蘭應向這些國家提供財政支持，以推進有效的氣候行動，作為預測及預備跨境氣候移民的一種方式。該計畫建議，考慮常規移民途徑的選擇，如擴大勞動力流動計畫和使用人道簽證。

這些實例都符合全球層面所採用的建議和做法，針對具體需求制定了因地制宜的對策，以不同方式展示了全球如何在國家層面採取行動。這些政策的成功實施不僅會幫助國內移民，而且還可能會減少引發國際移民的環境誘因。

發達國家越來越多地致力於瞭解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變化如何影響流向其領土的移民。2021年美國出臺的《關於重建和加強難民安置計畫和規劃氣候變化對移民的影響的行政令》，要求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與國務卿、國防部長、國土安全部部長、美國國際開發署署長和國家情報局局長合作，向總統提交關於氣候變化及其對移民影響的報告——該報告需明確氣候相關人員流動的安全影響，及確定用以保護和重新安置直接或間接因氣候影響而流離失所的個人的政策選項。該報告還將就如何利用美國的對外援助來減少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提出建議。這份報告涉及各政策領域的高級別國家利益相關方，表明了美國希望通過在全球與其它國家、國際機構密切合作，以解決氣候問題對國家及移民層面的影響。

第七章 移民人口贩运

今天，有組織的犯罪集團幾乎在每個國家都販運移民，反映出問題的廣泛性。受害者往往來自社會經濟弱勢群體或收入較低的國家，他們通常被販運到較富裕的國家，在那裏人販子通過剝削他們獲得最高的經濟回報。因此，在《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中，人口販運（human trafficking）被明確認定為一項挑戰，該議程提到了消除強迫勞動、現代奴隸制和人口販運。可持續發展和打擊人口販運是相互關聯的，消除人口販運需要消除貧困、性別平等、增加體面工作機會和獲得司法救助。因為在某種程度上**人口販運的根源在于不平等**。人口販運行為剝奪了作為人類的尊嚴，它也對社會發展和福祉構成了障礙。

人口販運對全球、區域和國家層面的移民治理構成挑戰，當移民處於不安全、無序和非常規條件時，移民面臨被販運的風險更大。因此，**“預防、打击和消除国际移民中的人口贩运”**是《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約》所規定的核心內容，《可持續發展議程》也提及需要

對移民和人口流動採取管理良好和治理完善的方法，從而實現移民帶來的效益，充分激發移民的潛力，以有效應對人口販運的風險。

被販運的移民在2.81億國際移民中只占很小的比例，但這種做法對受害者及其家庭和來源國和目的國社會均造成了嚴重後果。人口販運對經濟和社會產生負面影響，對受害者身心健康產生長期損害，且人口販運具有高度的性別化差異：婦女和女孩更容易被販運，以達到性剝削、強迫婚姻和家庭奴役的目的；而男性則更經常成為與漁業和採礦業相關販運活動的受害者。

這種罪行的複雜性是阻斷人口販運活動需面臨的主要障礙。當移民被跨國販運，刑事司法應對工作和受害者保護工作就會增加另一層複雜性。當人口販運網路跨越多個國家時，往往又與其它犯罪活動交織在一起（如移民偷渡及洗錢）。有組織的犯罪分子善於利用最新的數字技術，包括社交媒體、暗網和加密貨幣，來實施犯罪並掩藏其收益。

人口販運的定義

人口販運的概念產生於多個世紀以來的國際法演進歷程，涉及的問題包括禁止以性剝削為目的買賣/販運婦女和兒童、奴隸制和類似的做法，以及涉及強迫賣淫的販運和剝削行為。2000年，隨著《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關於預防、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行為的補充議定書》（簡稱《**人口販運議定書**》）的出臺，補充了《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國際上才真正達成將“人口販運”行為認定為犯罪的共識。

“人口販運”的定義包括三個要素：行為、手段以及目的（剝削）。這三個要素中的每一個都是必需的，但如果受害者是兒童（任何18歲以下的人），則只需要確定“行為”和具有剝削性的“目的”即可認定為犯罪。

販運行為可能發生在一個國家內部或涉及跨越國際邊界。在國際移民的背景下，移民者成為跨國販運的受害者，這些行為是通過各種手段實施的，剝奪了受害者的同意權。例如，當受到武力脅迫時，當某人被欺騙時，或者他們的脆弱處境被濫用時，受害者的事前同意變得毫無意義。對兒童來說，尤其如此，他們沒有法律行為能力，根本無法同意以剝削為目的而進行此類行為。作為販運成年人行為的一個要素——“濫用脆弱處境”並不指個人對人口販運的脆弱性，但在刑事司法方面，需要有可信的證據來證明販運者蓄意濫用或利用受害者的脆弱境況來達到剝削目的。

“販運的脆弱性”一般是指年齡、性別或社會經濟條件等因素，這些因素可能使一個人面臨被販運的風險。對於移民來說，其他脆弱性因素包括以下方面：

—移民的驅動因素：特別是在不利情況下，導致移民在國外的剝削性徵募中受騙。

—移民路線：某些移民路線可能導致移民者很容易落入有組織的販運網路之手，遭受剝削性就業或敲詐。逃離衝突和暴力地區的難民和其他移民尤其容易受到傷害，這一點在敘利亞和巴爾幹半島沿線非常突出。

—移民狀態：特別是當非常規情況導致移民者可能面臨包括從罰款到拘留或驅逐出境的負面法律後果。此外，非常規情況往往導致移民在

容易受到剝削的部門工作，如東南亞的漁業、歐洲的農業和北美洲的建築業工作。

疫情加剧受害于人口贩运的脆弱性

疫情暴發引起的安全狀況惡化、貧困和邊緣化增加可能是人口販運的驅動因素。疫情的影響難以準確量化，但正如“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所指，它可能會在失業率上升最快的國家和工資最低的個人身上產生最顯著的影響，一些移民就屬於這種情況。許多地區的人口販運大幅增加，在美國，人口販運案件比前一年增加了185%。關閉的邊界導致通過非常規管道入境更有市場，而這些管道往往是由有組織的走私和販賣人口的犯罪分子所提供的。

疫情期間更是進一步加劇了移民和其他處於脆弱地位的人被販運的風險，而且還阻礙了查明受害者的工作——疫情期間執法部門將優先事項轉移到遏制疫情蔓延上，從而對人口販運問題有所忽視；社會服務機構的關閉也減少了對受害者的識別和支持工作。

對於許多在受危機影響最嚴重的行業工作的移民，他們的生計選擇被嚴峻的經濟形勢限制，從而促使他們轉向更不穩定和更危險的掙錢辦法，增加他們淪為剝削性販運網路受害者的風險。許多移民在網上尋找機會的同時冒著被人口販子欺騙的風險。有些情況下，人們雖仍在工作崗位上，但條件變得惡化。那些因雇主轉向安排在家工作，從而在家庭環境中工作的人，往往面臨更多的要求，同時工資、自由和休假的權利也會下降。缺乏衛生、社會、法律和其他服務的移民工人也變得脆弱，不僅是受疫情本身的影響，而且還容易成為販運者和其他

罪犯的受害者，在缺乏官方和可靠的安全網的情況下，依託人口販運者越來越成為唯一的“最後的解決辦法”。

自2014年以來，超過500萬委內瑞拉移民離開了他們的國家，其中一些人缺乏正規的身份和獲得社會保護的機會，在疫情發生之前，他們依賴非正式的勞動力市場，疫情之後許多人失去了工作，被趕出了住所而流落街頭。在這種脆弱性增加的背景下，哥倫比亞的人口販運受害者人數增加了20%——其中大多數是委內瑞拉移民。於是哥倫比亞政府2021年2月決定在該國非法居留的委內瑞拉移民可獲得**为期十年的临时保护身份**，這項措施是在改善移民的保護和安全、減少移民面對人口販運的脆弱性方面做出的一大進步。

“人口販運”定義中的最核心的要素——剝削性的目的。雖然《人口販運議定書》沒有對何謂“剝削”定義，但各國在其國內法中採取了不同的方法，包括列入《人口販運議定書》中相同的剝削實例清單。剝削行為必須**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才能達到被視作“人口販運”犯罪門檻。但在實踐中，很難將被販運、並被強迫勞動的移民與忍受剝削性勞動條件的移民區分開來，特別是在剝削尚未發生的情況下，從而影響到能否查明受害者、調查和起訴哪些案件以及判處何種刑罰。廣義的理解會把網撒得太寬，把不屬於販運的情況也包括在內；而過於狹義的理解則剝奪了對那些無法被確認為人口販運的受害者應有的保護和正義。

移民方面的另一個挑戰是區分“人口販運”和“移民偷運”，這兩個概念經常被媒體混淆。“移民偷運”在一份獨特的法律文書——《2000年關於打擊陸、海、空移民偷運的議定書》中被描述為“為了直接或間接獲得經濟或其他物質利益，使某人非法進入其並非國民或永久居

民的締約國”。換句話說，販運的犯罪目的是剝削，而偷運的犯罪目的則是通過為他人的非常規越境提供便利而同時獲得經濟或其他物質利益。偷運通常發生在非常規國際移民的背景下，而販運也可能發生在常規移民或國內移民的過程中。這兩類犯罪有時會交織在一起，因為有組織犯罪集團在非常規移民路線上相互往來，讓移民在彼此之間過境，或控制路線的某些部分或對其收費。在依靠偷運者的服務跨越國際邊界的同時，被偷運的移民在被偷運的過程中成為販運和其他犯罪的受害者。例如當偷運費用導致其負債而被利用於剝削行為時，就會發生這種情況。他們最終遭受脅迫、敲詐、暴力甚至酷刑。

《人口販運議定書》與大多數移民文書不同，它幾乎獲得了世界各國普遍批准，截至2021年6月30日，已有178個國家成為其締約國。各國都渴望建立對人口販運問題的共識——人口販運曾被理解為“以性剝削形式、僅針對女性受害者”的犯罪，現在已被廣泛理解為“涉及任何人的、為達成更廣泛剝削目的”的犯罪。不過，“南亞區域合作聯盟”（不丹、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等七個國家參加）依然將“人口販運”的定義限制在“為賣淫目的買賣婦女和兒童”，並不包括男性受害者和大多數形式的剝削，淡化了販運的嚴重性，使一些受害者不能被識別和保護——因為他們不被承認為販運行為的受害者。

人口販運的分布

人口販運是一種不斷增長、利潤豐厚的犯罪活動。據國際勞工組織估計，僅強迫勞動一項每年就產生了約1500億美元的非法利潤。這個數字是保守估計，因為人口販運產生的利潤遠超出了強迫勞動的範圍，而且往往通過洗錢、使用加密貨幣和其他新的支付方式來逃避金融監管。正如“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所強調的，關於販運者利

潤的資訊很少。然而，對販運案件的審查表明，其經濟收益取決於其結構和規模——越是大型犯罪組織和網路越能販運更多的受害者，其利潤也就越大。這些人口販運組織往往參與其他跨國犯罪活動，以減少風險，降低運營成本，因此利潤也經常與其它跨國犯罪活動產生的收益相互交織在一起。

“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在其《全球人口販運問題報告》中依靠官方統計數據以及來自調查檔案的定性資訊，對各國政府識別的人口販運受害者進行調查，然後將結果進行匯總。另一項數據收集工作是由“**打击人口贩卖数据协作平台**”（CTDC）進行的，這是首個跨機構的人口販運全球數據中心。

数据共享、去标识化和匿名化

2017年首次啟動的“**打擊人口販賣數據協作平臺**”，是由兩個非政府組織：“北極星”（Polaris）和“自由共用”（Liberty Shared）合作推動的提供人口販運原始數據的全球存儲庫。它結合了世界上最大的三個受害者案例資料庫，包含了超過10萬起販運案件的資訊，包括175個國家中來自164個國籍的被剝削受害者。

由於人口販運受害者是一個特別群體，其數據高度敏感且屬於個人，在收集、管理和分享這些數據時，會產生一系列隱私問題。有關人口販運的數據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不公開的，因此**打擊人口販賣數據協作平臺**的目標是打破資訊共用的障礙，為反人口販運行動者提供最新的資訊，以支持有效的反人口販運戰略。公開可用的數據集通過**k-匿名化**進行去標識化。**k-匿名化**是一種數據匿名化技術，它將那些成員少於**k-1**的集合的案例進行編輯，其中每個集合是由數據集中不同變數值的獨特組合來定義。“**打擊人口販賣數據協作平臺**”的數據被設定

為k=11，這樣查詢返回的結果不能少於10個。完整的、非匿名化的數據也可以通過網站上的詳細可視化和地圖獲得。

國際勞工組織、自由行走基金會（Walk Free Foundation）和國際移民組織在《現代奴隸制全球估測》中對強迫勞動和強迫婚姻等相關罪行也進行了調查。聯合國在其最新的《全球報告》中指出，各國每年報告被發現的販運受害者人數從2003年的不到2萬人急增到2018年的近5萬人。在全球範圍內，販運人口行為的定罪數量也在增加。

儘管固有觀念中人口販運的受害者通常被認為是因性剝削而被販運的弱勢婦女和兒童，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受害者的性別特徵已經發生了變化。女性仍占已識別的受害者的最大比例（約65%，其中女性、婦女占46%，女孩占19%），但男性也是販運的受害者（成年男性占20%，男孩占15%），特別是在受到強迫勞動的人中，占近60%。受害者的性別和年齡因地區而異：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區的受害兒童多於成年人；而在歐洲、北美和亞洲，成年女性在已識別的受害者中占最大比例；成年男性受害者在北非和中東地區更多。

根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的最新數據，在所有受害者中，有45%的人是被跨境販運的。當移民到達目的國被販運後，他們也可能被報告為國內販運的受害者之一。這表明，販運人口的模式與移民流動有相似之處，通常都是流向較富裕的國家，由於需求和價格較高，那裏發生的剝削更有利可圖。與移民流動一樣，跨國販運流動首先是區域內流動：受害者中，12%在同一次區域內被販運；8%在同一區域內；15%在區域間。幾乎所有地區都報告了大量來自東亞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受害者。

跨國販運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利用官方邊境管制點，近80%的旅行（尤其是婦女）跨越官方邊境管制點，如機場和陸地邊境管制點。兒童比成年人更可能不通過官方邊境管制點被販運，有44%的兒童在被販運過程中使用了非任何官方邊境管制點的路線。

根據移民路線的類型，販運的手段也有所不同：當受害者通過官方邊境控制點被販運時，大多通過債務、威脅和限制自由來實現販運，而在販運旅程不涉及穿越官方邊境控制點的情況下，則沒收和銷毀檔的行為更多些。無論他們是否通過官方邊境控制點被販運，三分之二受害者都會在其旅程中的某個階段受到剝削。在這兩種情況下，移民的販運可能是由被販運者賄賂的官員促成的。例如在疫情爆發後的2020年12月，泰國總理下令打擊協助人口販子的腐敗官員，因為有來自緬甸的移民被偷運和販運到泰國蝦類市場工作。

無論通過哪種邊境點，最主要的販運類型是強迫勞動（83%通過官方邊境管制點以及64%通過非官方邊境管制點的販運活動屬於強迫勞動），其次是以性剝削為目的的販運（分別為15%和22%）和其他形式的販運（分別為2%和13%）。耐人尋味的是，當把國內和跨國販運放在一起對比時，這些比例又不同：性剝削排在第一位（約54%），其次是強迫勞動（約42%）和其他形式的剝削（包括0.56%的奴隸制和類似做法，強迫婚姻占0.45%，器官切除占0.03%，強迫服役占0.01%和占2.5%的其他形式）。這意味著，與其它形式的剝削相比，以性剝削為目的的販運不僅發生在跨國販運案例中，而且在國內案例中也很普遍。

雖然以性剝削為目的的販運在大多數地區占主導地位，但非洲和中東地區最普遍的剝削形式是強迫勞動；販運強迫勞動的主要行業是家務工作（占30%）、建築業（16%）、農業（10%）、製造業（9%）和酒店業（8%）。酒店業的販運受害者主要來自東歐（43%）和東南亞（26%）；家務工作中的販運受害者主要來自東南亞（66%）和東歐（9%）。以強迫勞動為目的的販運還會採取強迫乞討、兜售和從事非法活動的形式。

其他形式的販運包括強迫婚姻、包辦婚姻和假結婚，受害者往往面臨暴力、虐待、剝削和行動限制。這種類型的人口販運具有高度的性別特徵，受害者主要是來自弱勢背景的婦女和女孩，但也有一些關於LGBT人士（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變性人和兩性人）被其家人強迫接受異性婚姻。這些“婚姻”往往是由家庭成員或婚介出於經濟和物質利益的動機而組織的。也有新娘被欺騙或被綁架的情況。移民也可能為了正常進入一個國家而締結假婚姻，或者在已經進入目的國後為了使其移民身份合法化而締結假婚姻，使他們隨後容易受到剝削。東歐婦女被西歐掮客承諾提供高薪工作，但在抵達後被販賣，被迫與非常規移民結婚，後者試圖通過婚姻來獲得歐盟護照使其居留合法化。在中東，也有婦女和女孩受到以性剝削為目的的販運，從而進入“旅遊”或“臨時”形式的婚姻情況。

非洲各區域的移民販運

非洲移民主要是在其原籍地被販運。75%的非洲受害者是在非洲內部被販運；13%被販運到歐洲；7%被販運到亞洲；5%被販運到美洲。

非洲的移民人口販運活動有兩個主要特點：

首先，非洲的人口販運不是為了性剝削，而是**為了強迫勞動**，特別是為了乞討（超過25%）和家務勞動（超過40%）；

第二，大多數受害者是兒童，占受害者總數的50%以上。販運兒童的情況在西非國家尤其嚴重，如加納、貝寧、布基納法索、象牙海岸、尼日利亞、塞拉里昂和多哥。在農村，兒童主要被販運用於耕作和捕魚；在城市，兒童被販賣用於強迫乞討、兜售和從事非法活動。

販運模式在非洲各個區域有所不同：強迫勞動是南部非洲的主要販運形式，強迫婚姻所占的比例也較高；在東非，人口販運主要涉及被販運從事家政工作的成年人；在北非（特別是利比亞），性剝削、強迫勞動、奴役和強迫婚姻很普遍。

移民人口販運的應對

《人口販運議定書》對販運人口採取司法行動，提倡將其定罪、調查和起訴，並呼籲被販運者作為嚴重犯罪受害者得到保護和協助。通常採取“4P方法”，包括起訴（prosecution）、保護（protection）、預防（prevention）及夥伴關係（partnership），強調加強各國之間的司法合作。

採取上述方法確保反販運措施以人權為基礎、將法治置於首要地位以避免受害者受到反販運工作的連帶損害，也確保司法措施不會對打擊人口販運工作以及更廣泛的移民治理產生反作用和不利影響。

預防移民販賣

一消費者通過關注商品生產的環境、人權和社會經濟條件而轉向更合乎道德的消費，加強對私營行業問責的關注，改善販運的預防情況；

—除國際勞工組織的《公平招聘倡議》外，私營招聘機構在達到“國際招聘誠信體系”（IRIS）規定的標準後，才可獲得資格證書；

—在國家層面上也實施類似的許可計畫，在很多國家，證書由政府頒發，移民工人可以檢查特定的招聘機構是否被允許在國外招聘。企業責任也涉及工人的工作條件。

—現在越來越多的企業將**社會可持續性**視為一個關鍵的行銷特徵，並通過區塊鏈技術實現供應鏈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以確保其產品不涉及剝削行為，包括移民販運。這些轉變提供了一個推動透明度、對未報告和已發現的違規行為實現企業問責的機會。

卡塔爾於2020年8月走出了歷史性的一步，廢除將移民工人與其雇主捆綁在一起的擔保人制度，並採用最低工資，標誌著保護勞工權利和工作條件的趨勢在增強。另一項基本措施是確保**成立工會和集體談判**的權利，賦予移民工人權利，承認他們自行發起的組織，並構成避免工作場所剝削的重要安全網。不過，在一些國家，移民勞工仍因其外國國籍而被禁止加入當地工會。

—移民勞工的來源國在保護其公民不被販運到國外也可以發揮關鍵作用，包括在出國前提供相關資訊，取締移民者支付的招聘機構費用和其他費用，轉而採用雇主支付的模式，並對招聘機構進行監管，以減少其國民在國外遭受剝削和販運的可能性。

起訴人口販運者

打擊人口販運的司法方法對於搗毀販運網路、防止販運和保護受害者至關重要。受害者有權利訴諸司法。絕大多數國家都將販運人口定為刑事犯罪，儘管自2007年以來對販運人口案件的定罪趨勢有所增加，

但絕對數字仍然很低——成功定罪的案件數量較少，大多數涉及司法從業人員就人口販運犯罪本身具有的複雜性的應對能力不足。因此，**能力建设**歷來是加強人口販運問題刑事司法對策的主要措施之一。

另外，不同利益相關方之間的合作對於改進對人口販運者的起訴至關重要。比如執法和檢察機關與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以確定潛在的人口販運事件並收集販運案件的證據。其中，《金融業反奴隸制與販運倡議》（FAST）就是一個雙方合作專案，以前被稱為《列支敦士登倡議》，旨在加強金融行業對反奴隸制和人口販運法律的遵守，包括通過改善反洗錢法的執行。這需要金融機構進行盡職調查和風險評估，並根據數據隱私和保密要求，向執法當局報告可疑交易。

金融部門的參與，為改善對販運案件的識別提供了一個有用的途徑，會使得報告的疑似案件增加多達十倍。執法部門和金融機構之間的合作也通過技術創新得到了加強。非政府組織“集體自由”（Collective Libert）開發的“線上人口販運融合中心”，創建了一個線上專家實踐社區，通過它加強機構間的合作、利用人工智慧支持執法調查，識別可能參與人口販運、洗錢或逃稅的個人。

從金融行業收集的證據對起訴也很重要。過度依賴受害者的證詞作為主要的證據來源，會妨礙對他們的保護——因為受害者僅僅被當作證人，當針對他們的保護是以參與刑事訴訟為條件時，或者當他們的回歸和重返社會被這些程式拖延，被迫留在目的國時，受害者可能會再次受到傷害——結果可能不利於刑事訴訟，因為受害者在調查和起訴階段沒有動力報告販運案件並進行合作。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的證詞品質也可能下降——因為他們對司法機構失去了信任。

保护被贩运的移民受害者

確認移民販運受害者的身份很重要，鑒於可能與潛在受害者接觸的行為者的多樣性，需要建立相應轉介機制，以便受害者能夠迅速從服務中受益。一些國家已經設立了熱線。非營利組織“北極星”在美國運營著全國人口販運熱線，受害者可以通過電話、短信、線上聊天或電郵聯繫該熱線，然後再被轉到相關的支持服務。該組織已幫助15個國家建立了類似熱線，包括科威特、墨西哥、卡塔爾、南非、泰國和阿聯酋等。

轉介到適當的服務機構，是保護受害者不受販運者傷害和實現對其有效補救的第一步。雖然國際社會對受害者因被販運而犯下的罪行不受懲罰的原則已達成共識，但受害者依然經常繼續被拘留和起訴。在禁止性工作的國家，性剝削受害者的情況尤其如此，同時她們還可能被迫犯下其他刑事罪行，如販毒等，也會面臨拘留和起訴。美國“國家倖存者網路”在2016年的研究強調，在接受調查的販運受害者中，約91%的人曾被逮捕；超過一半的人認為他們的逮捕涉及被販運過程中犯下的罪行。這些受害者稱，監禁所帶來的汙名化具有長期影響，導致他們難以獲得就業、住房、信貸或教育貸款。在他們向當局提出的建議中，受害者要求不懲罰他們的在販運中的罪行，並清除他們的犯罪歷史。

解除拘留、獲得康復支持措施、暫緩驅逐出境以及發放臨時居留證，往往取決於受害者在刑事訴訟中的合作。對受害者施加壓力，要求他們指證人口販子的做法，不承認他們是權利擁有者，也沒有給他們做出有關與當局的合作以及可能返回來源國的知情決定的可能性。一些

國家採取了以受害者為中心的方法，給予受害者臨時居留許可的**思考期**——在此期間，受害者可以從必要的支持措施中受益，開始恢復並重新獲得對當局的信任，以增加他們在刑事訴訟中合作的可能性。思考期通常只有**30天**，但有些國家將其延長到**60天**（克羅地亞、捷克和萊索托）、**90天**（馬爾代夫和黑山），甚至**6個月**（芬蘭）不等。

對於人口販運的移民受害者來說，最理想的情況是能安全和自願地被遣返回來源國，但當他們面臨販運者的威脅或將面臨被再次販運的高風險時，受害者可能無法返回。他們**也可能不想被遣返**，因為他們可能在原籍社區將背負汙名；或在重返社會方面遇到困難，特別是在不支持重新融入社會的國家；或者他們只是想留下，以獲得目的國提供的更好的生活機會。一些目的國提供了申請長期居留的選擇——當受害者在來源國面臨被再次販運或遭受販運者報復的嚴重風險時，他們有資格獲得國際保護，並被授予難民身份。

合作打击移民贩运

在司法方面，夥伴關係指的是各國在交流跨國移民販運網路資訊方面的合作，以及實際的執法合作，多個國家在國際刑警組織的主持下開展的行動也很常見。《巴厘進程》是唯一一個明確關注人口販運問題的區域間移民論壇。其他倡議如《非洲聯盟打擊人口販運倡議》是在非洲—歐盟夥伴關係的支持下發起的，目的是提高人們對打擊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和兒童行為的認識並改善其執行情況。

《巴厘進程》於**2002年**啟動，是一個不具約束力的政策對話論壇，供成員交流資訊，加強合作和能力建設，包括解決非常規移民背景下的人口販運問題。由澳大利亞和印尼共同主持，聚集了**45個**成員國和四

個聯合國機構（國際移民組織、國際勞工組織、聯合國難民署和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此外還有觀察員國家和國際組織。《巴厘進程》的兩個工作組專門涉及人口販運問題，它們是2013年成立的“販運人口問題工作組”和2014年成立的“搗毀偷渡和販運人口網路工作組”。

2016年《巴厘進程》第六次部長級會議批准的《應對偷渡、販運人口及相關跨國犯罪問題巴厘宣言》指出，偷渡者和販運者對移民和難民的虐待和剝削是相互關聯的，這些不同類型的犯罪之間存在重疊。該宣言承認“**各国根据国际法捍卫其边界、以及决定其移民政策的主权利和合法利益**”的同時，也強調需要“**在负担分攤/共同承担和集体责任的原则基础上采取全面的区域性办法**”及“**将政治承诺转变为具体行动**”。

上述承諾在2018年的《宣言》中得到了重申，2022年部長級會議為其成員提供了反思機會，以檢討機制是否達到了其建立的目的，尤其是販運移民問題。

自《人口販運議定書》通過以來，夥伴關係已經發展到將國家以外的多種行為者囊括進來。通過全球層面上的各種合作倡議得到了證明。例如，“機構間打擊人口販運協調小組”就是由聯合國大會授權，以加強從事人口販運工作的各聯合國機構和其他政府間組織之間的合作與協調。

然而，最重要的發展涉及國家與私營行業的合作。為配合加強企業在人權保護領域的責任的廣泛工作，現在將重點放在私營業者在打擊人

口販運方面的責任，特別是在整個供應鏈的**貨物和服务生产领域**，並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除了招募機構的認證計畫外，企業的參與還體現在其他更廣泛的有關社會企業責任和可持續性的全球倡議中。

《聯合國全球契約》是最大的企業可持續發展倡議，持約一萬二千家企業的社會和供應鏈可持續發展戰略，分享有關社會可持續性的各種資源、工具和最佳做法。其他倡議更具體地處理人口販運問題，如由《全球打擊有組織跨國犯罪倡議》牽頭的“負責任和有道德的私營行業打擊人口販運聯盟”，旨在加強公共和私營部門的夥伴關係。

與金融行為體的夥伴關係也引起了越來越多關注，尤其是在查明資金流動方面的作用，包括與人口販運網路有關的洗錢行為。例如非營利組織“北極星”與全球數字支付平臺Paypal建立了新的夥伴關係，以建立一個金融情報部門來與執法部門合作，制定新的方法用以識別與人口/移民販運有關的交易。金融部門發揮的作用也在不斷擴大，不僅支持刑事調查，而且還通過投資數字金融來支持易受販運傷害的人們，防止人口販運。通過提供基本的銀行服務，特別是在受害者的金融身份和銀行帳戶被販運者劫持時，參與保護受害者。

與科技公司的合作也在增加，這種合作通過利用新的技術發展，如人工智慧或移動技術，來設計打擊人口販運的創新解決方案。技術公司聯盟也在出現，如2018年由技術公司、民間社會和政府間組織發起的“技術反販運聯盟”，目的是確認新的技術發展，以防止和破壞人口販運，並為受害者提供支援。意識到人口販運者在很大程度上也使用了新技術的同時，該聯盟與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一道，確定了現有約305種打擊人口販運的技術工具，以打擊人口販運。

本章结论

販運移民的具體問題帶來了獨特的挑戰，解決這些挑戰的可行途徑、新趨勢和發展總結出三個主要的經驗教訓：

●增强对移民贩运的理解：

移民販運仍然經常與其它犯罪，特別是偷運移民相混淆。這種混淆是由各種行為者造成的，從那些交替混用“販運”（trafficking）和“偷運”（smuggling）兩個概念的媒體，到國家當局在打擊非常規移民的過程中錯誤挪用販運的話語。這種混淆的影響導致移民受害者可能無法被識別，這反過來又影響了對販運者的調查和起訴、更重要的是，影響了移民受害者獲得保護的權利。

此外，打擊人口販運需要國家當局加強能力建設，還需要包括媒體在內的其他相關利益攸關方的努力。能力建設應被理解為——要超越人口販運的技術性法律定義，看到販運移民背後的各項動態，包括來源國、過境國和目的國的移民政策可能在助長販運和剝削移民中起到的負面影響，以便加強反販運政策和對策。

●为移民受害者采取按需制定的保护措施：

那些在來源國之外的人，除了作為嚴重犯罪的受害者有普遍的保護和援助需求外，還有針對其移民狀況的保護需求。例如，非常規情況下的移民受害者可能不願意向當局報告，因為他們害怕被驅逐出境，或因其非常規移民身份而受到懲罰。忽視移民受害者所處的具體情況不利於打擊人口販運的工作；移民可能會在針對販運者的刑事訴訟中回避與當局合作，並重新進入再次被販運的惡性循環。對此，一些國家不僅採取了以受害者為中心的方法，而且還採取了為移民定做的、以受害者為中心的對策，給予思考期和居留許可。雖然發放居留許可是

每個主權國家的決定，但國際移民治理強調這種方法是值得效仿的最佳做法，值得其他國家學習。同樣關於移民受害者返回來源國時，需要考慮他們的年齡、性別、脆弱性和返回後可能受到的污名化，針對他們的具體保護需求制定讓他們重返社會的程式。

●將合作轉化為有效和有影響力的協作：

國家之間的跨境合作對於打擊跨國販運移民活動也很重要。自2000年《人口販運議定書》以來，人們對合作的理解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現在的合作是多利益相關者、全政府、全社會和跨領域的。最近金融和技術領域的參與是一個重大的發展，它反映了人口販運者的運作模式也包含了多種類型的犯罪行為，包括洗錢和利用新技術的方式。

第八章 人工智能對移民政策的影響

人工智慧（AI）技術支撐日常生活的方式比許多人想像的還要多樣化。人工智慧驅動的智能手機、智能電器、智能房屋和智能數字語音助手在社會中得到普及，使人類得以更好地管理時間、資訊和精力。

伴隨著行業增長，人工智慧在移民和流動領域也得到更為廣泛的應用。多年來，與移民事務相關的國家使用包括人工智慧系統在內的各種技術，以支持有關方面的行政處理和決策。在移民週期中，人工智慧的應用越來越多，例如便利化出發前的身份核驗，支持簽證申請的遞交和處理，強化邊境工作流程，生成關於遞交、申請簽證和滿足發放條件以及其他方面的數據分析，以及預測移民趨勢。應用人工智慧技術可以提高系統效率，減少用戶處理時間，並更好地管理不斷增長的移民相關服務需求。

人工智慧技術也在抗擊疫情中發揮了核心作用。世界各地政府實施了監測公共衛生的措施，例如用於追蹤接觸者的手機應用程式和數字健康通行證。人工智慧在移民流動中對政策和實踐的影響也非常重要。

关键概念与定义

“人工智慧”在廣義上被理解為“**完成通常需要人類智能的任務的計算機編程**”。

人工智慧起源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電腦科學，最初構想是要傳達一種電腦的發展願景，擁有人類推理和思考的高級或認知能力——也稱為“泛人工智慧”。然而六十多年來，這種願景依然難以實現，被稱為人工智慧的大部分都是一種降級，通常更類似於人工智慧的一個特殊分支——“**機器學習**”，這種低階人工智慧被稱為“窄人工智慧”，因為它與執行狹義的任務有關，比如匹配圖像中的面部特徵或計算文字材料與特定搜索詞的相關性，而不是更廣泛、更普遍的思考功能。

人工智慧自歷史性誕生以來，已逐漸發展得能夠將利用機器能力進行自然語言處理、語音處理、機器學習、視覺識別、神經網路和機器人等工作，成為一系列旨在匹配或替代人類智能的相關技術。以人工智慧為基礎的系統可以純粹基於軟體在虛擬世界中運作（如語音助手、圖像分析、搜索引擎、語音和人臉識別系統），也可以將人工智慧嵌入硬體設備（如高級機器人、自動駕駛汽車、無人機和物聯網應用）中。以下是與人工智慧相關的常用術語定義：

“算法” (Algorithms):用於處理和解決問題的機器指令集。人工智慧演算法可以分析數據、發現模式、進行推理和預測行為，其水準和速度遠超人類。

“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是訓練機器執行通常與人類智能相關的任務的技術之一。機器使用演算法從海量大數據集中學習。

“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是機器學習的一個子集，它模仿人類大腦的功能，將演算法分層構建成一個人工神經網路，使機器能夠自主學習和決策，並在圖像和人臉識別方面得到應用。

“大數據” (Big data):被定義為“大量高速、複雜且可變的數據，需要先進的方法和技術來實現資訊的捕捉、存儲、管理和分析。”

“數字身份” (Digital identity):是指一組以數字格式提供並與個人相關的屬性，包括生物特徵數據（如指紋、眼球掃描、3D面部圖）和人口統計數據（如出生日期和地點）。它們可以與政府簽發的身份證件如護照、駕照等和社交媒體上的數字活動（包括線上搜索歷史和地理數據）相結合。現有的數字身份平臺使用人工智慧和區塊鏈相關技術，通過線上平臺和手機設備運行“數字身份錢包”來驗證個人身份。

“聊天機器人” (Chatbot):一種旨在與人類交談（尤其是通過互聯網）的電腦程式。

人工智能在移民領域的應用

人工智慧技術依賴於基礎數據捕捉和數字能力才能得到應用，因此數位化是人工智慧在移民應用的必要條件。人工智慧技術已在移民和流動領域運用多年。例如澳大利亞、美國、日本以及許多歐洲國家已將人工智慧及相關技術用於管理日益頻繁的跨境流動。

下圖總結了人工智慧技術在整個移民週期中的使用方式，提供了不同階段的人工智慧能力與應用實例（出發前、入境、居留和返回）。



出發前

人工智慧技術多年來早已被應用於支持移民和流動管理的“出發前”方面。如一些國家在電子簽證平臺和行前檢查方面利用了新技術，包括引入與旅客登機相關的“**行前生物数据检查系统**”——航空公司不能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讓乘客登機，該系統又被稱為“**高級乘客处理系统**”，利用新技術強化連通性（enhanced connectivity）以支持邊境安全系統的即時檢查。這套系統更通用的版本——“**国际航班载运人员信息预报系统**”（API）被視為克服管理國際人員流動困難的一種解決方法，包括恐怖主義和毒品走私在內的安全威脅；重要承運人的懲罰制度；通過自動化程度提高邊境管理機構的效率。API系統利用人工智慧功能進行搜索，並匹配存儲在不同領域中的生物數據和其他變數庫，從而實現設計多個系統的交叉檢查過程的自動化。

除了在邊境系統、線上簽證申請平臺和“電子簽證”(e-visas)的開發中越來越多地使用人工智慧技術，現在還允許利用機器學習的分析能力來處理常規簽證申請，將更複雜的申請提交給簽證官。早期的線上簽證申請系統實現了15-20個基本申請檢查的自動化，從而大大減少了處理時間和人員成本。在第一代線上系統中，簽證官仍需對申請進行最終決定。隨著時間推移，這些線上平臺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因此它們可以對低風險的申請自動做出決策，包括使用不需要簽證官參與的分析技術。“不符合處理演算法”的更複雜情況或申請才會被提交給簽證官進行綜合評估和最終決定。

近年，越來越多移民代理或簽證申請中心開發了聊天機器人，以幫助潛在客戶探索移民、留學或在國外工作的機會。一些聊天機器人也是由此前曾苦於簽證和移民法規的大量資訊的移民所開發的。

入境

出入境相關流程的管理，越來越多利用自動化強化分析能力以提高效率和管理不斷增加的旅客人數。自動化邊境關卡使用生物特徵數據進行身份和安全相關檢查，需要在數據收集、資訊技術系統和機器學習等人工智慧能力方面的大量投資。因此，許多國家無法推出如此複雜的系統，只能依靠人工系統和傳統的邊境評估規則檢驗潛在的問題。此外，在最初的實施過程中可能會遇到挑戰及可持續性方面的問題。如在某些國際機場，因收集乘客生物資訊需要時間而引發了延誤——因此很多機場只收集了非本國公民的詳細資訊，這涉及到人工智慧功能實施背後更廣泛的數字能力問題。

人工智慧技術迅速崛起的其他領域還包括邊境檢測系統，如人工智慧支持的無人機技術，以及在公共場所（包括機場和公共交通設施）

的行為分析。這種由人工智慧驅動的行為分析利用機器學習讀取生物特徵數據，如面部表情、步態和其他身體動作，以識別那些有意對他人造成潛在傷害的人。其他備受爭議的舉措包括美墨之間的“虛擬邊境牆”，由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CBP）與科技公司合作開發。如果得以落實，“虛擬邊境牆”將通過無人機和利用視覺人工智慧產品的塔樓進行大規模監控，可以快速檢測和分類圖像或視頻檔中的人和物體。

国家间不断加剧的不对称性

人工智慧技術的應用會從兩個主要方面加深這種不對稱性：

第一，它擴大了具有高技術能力和缺乏此技術的國家之間的所謂“**數字鴻溝**”。人工智慧可以用於削減成本和提高效率，因此人工智慧技術有利於移民和尋求庇護的程式——這些程式通常耗時很長，主要靠手工操作。因此，人工智慧技術可以進一步鞏固那些具備人工智慧技術能力的國家的領先地位，在未來全球移民管理中繼續處於前沿——也造成人工智慧分化，技術手段較落後的國家會被進一步孤立。

第二，讓南北國家進一步分化。人工智慧發達國家主要集中在全球北方，因此，人工智慧分化同時加劇南北國家間已經不對稱的關係，同時在國際移民管理出現“有人工智能能力的國家和其他國家”的區分。

居留

聊天機器人越來越多地用於向在目的國的移民提供資訊和諮詢服務，並由政府當局（如芬蘭的移民機器人助手Kamu）以及支持移民的民間組織開發（如美國初創企業Marhub開發的Mona聊天機器人）。美

國科技企業X2AI的一項舉措就是與黎巴嫩合作，通過名為Karim的聊天機器人提供阿拉伯語的支持，向敘利亞移民發送個性化的資訊。Karim也是為全球超過1900萬人首創提供心理健康服務的聊天機器人Tess的一個衍生品。

電子申請平臺和簽證相關決策與出發前的流程類似。而在進入某一國家後，人們可能會與移民機關持續往來，例如轉換身份、續簽、申請新的簽證類型等。人工智慧的使用大大減少了人工處理和親自預約的需求。例如香港入境處的“電子大腦系統”就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2006年初，香港特區入境處推出了一套利用人工智慧技術的“電子大腦”系統（e-Brain），以改善案件處理工作。除以電子方式提交申請外，也用於個案決策。申請提交後，電子大腦會基於推理引擎，生成一組推薦的操作，如請求額外的檔，以使應用程式進入可評估的狀態。機器學習用於針對不同種類案例，構建典型步驟的程式性知識。

結合演算法數據分析的機器學習也經過測試，在瑞士用於更妥當地安置新移民（這一任務以前是由簽證官執行的），從而利於其融入。其他類似的計畫，例如“難民賦權匹配和結果優化計畫”利用機器學習、整數優化和匹配理論以確定難民和當地社區之間的最佳匹配結果。

人工智能监控在全球的扩展

自疫情期間使用人工智慧監控技術追蹤和監控包括移民在內的利益群體之後，美國移民局開始使用人工智慧面部識別技術對交通流中的人員進行大規模監控以檢測無證移民。

目前人工智慧監控技術正快速向更廣泛的國家傳播。全球176個國家中至少有75個國家在積極使用人工智慧技術進行監控。其中包括：智慧城市/安全城市平臺（56個國家）、面部識別系統（64個國家）和智能警務（52個國家）。

令人諷刺的是，自由民主國家反而是人工智能監控的主要使用者。幾乎所有的完全民主國家都在利用從安全城市平臺到面部識別攝像頭的一系列監控技術。51%的先進民主國家使用人工智慧監控系統，反而只有37%的封閉國家、41%的選舉受限國家、41%的選舉非民主國家在利用人工智慧監控技術。

返回

就與移民有關的問題（如未能獲批的尋求庇護者、簽證逾期者或非法移民的遣返）而言，人工智慧技術不是被用於促進移民的遣返，而是**更多用于大规模人口监测计划**，以發現可能的無證移民並強制遣返。美國的法庭檔表明，私營部門的經紀人正使用人工智慧演算法收集大量個人數據以創建數據檔案，用於確定潛在的被驅逐者。

依賴人工智慧技術強行遣返的後果可能非常嚴重，特別是在沒有經過其他形式的人工評估或驗證的情況下。2016年，英國撤銷了約3.4萬名國際學生的簽證，理由是根據一家政府簽約的語言服務公司的人工智慧聲紋識別分析，這些學生在獲得簽證所需的英語語言測試中曾使用“槍手”，但隨後的人工分析卻發現，其中約有7000人（占20%）是被錯誤指控為作弊——英國移民上訴法庭其後指出，英國內政部用來驅逐這些學生的證據存在多項重大疑點和缺陷。

人工智慧技術在移民勞工返回來源國的可持續性和實施方面非常有用，如孟加拉在2010年引入“智能卡”以支持更順暢的本國移民勞工離境過程——有助於紙質的移民管理系統的數位化，以便出於政策和規劃目的更好地收集數據和進行相關分析。

人工智能预测移民趋势

對移民和流動的預測已進行多年，通常依賴於統計建模和專家分析。隨著資料庫的擴展，越來越關注人工智慧技術以利用這些數據。在利用機器學習、大數據和統計建模等人工智慧技術的49項計畫中，研究關注點在於哪里會發生人道危機（71%）和誰會受到影響（40%）。越來越多的職業正在被自動化或被電腦取代，這反過來也影響了世界移民動態。

人工智能影响长期移民模式

雖然尚不清楚移民模式將如何受到影響，但鑒於各國尋求在越來越多樣化的領域投資人工智能，從衛生和社會保健到農業、教育和金融，模式隨時間推移而變化顯著。利用人工智慧實現自動化將影響支撐移民的經濟，從長遠來看減少了各國對勞工移民的需求。這些變化影響全球許多勞動力市場，包括勞工移民的重要目的地，如巴林、埃及、科威特、阿曼、沙特和阿聯酋的勞工移民尤其相關，因為其中大多數從事低技能工作。如在阿聯酋，潛在的受自動化影響的工作有超過93%是勞工移民所從事的。

人工智能在签证和庇護处理的應用

人工智慧技術經常被用於簽證和庇護的處理和決策。使用人工智慧系統的一個主要優點是，可以加快簽證和庇護申請的處理速度，同時篩查安全威脅，減少非常規移民。然而，人工智慧技術使涉及風險分析的大量處理自動化（通常以不透明的方式）成為可能，但透明度有限且往往無法追索。

人工智慧演算法**缺乏透明度**和**存在偏見**獲得廣泛關注，波及範圍遠超移民領域。儘管人類在不使用人工智慧的情況下也會在決策過程中表現出偏見，但人工智慧系統不僅對現有的人類偏見進行編碼，而且可能會放大這些偏見。因此，人工智慧將人類的偏見**制度化**和**系統化**——最終導致對種族和族裔的歧視和排斥。偏見是一個各領域人工智慧系統的普遍問題。

在移民和流動背景下，人工智慧演算法偏差可能會改變生活。例如，由於用於初始分類的人工智慧演算法無法正確識別較深的膚色並錯誤地識別申請人，簽證申請可能被拒絕。與白人男性面孔相比，面部識別技術在**識別肤色較深的女性面孔**時的準確度要低得多。在美國的一項調查中，商業上可用的人臉識別系統更容易**錯誤識別黑人的面孔**，並將其與之前被警方逮捕者進行面容匹配。

這些偏差可能是用於訓練人工智慧演算法的數據集缺乏多樣性，反映了幾十年來社會上的先入之見和刻板印象。技術是以長期存在的文化和以環境為基礎的，關於種族、族裔、性別和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其他不平等的觀念所塑造。

這也提醒：**技術不是一個中性的工具，也會犯錯誤。**決策者應意識到這一點，還應考慮到人類傾向於支持人工智慧系統提出的建議，即使有跡象表明這些建議是錯誤的，這種現象被稱為“自動化偏見”。此外，人類難以反駁涉及演算法能力的生物特徵匹配，尤其當技術能提取人眼無法檢測到的資訊時（如步態模式、面部識別和虹膜匹配）。因此，應當制定程式，以便在人工智慧系統導致錯誤決定甚至侵犯個人隱私的情況下，個人能夠獲得賠償。個人應能夠在公正的法庭或當局面前（包括通過行政程式）對人工智慧系統作出的、或在人工智慧系統協助下作出的決定提出質疑。為了實現程式公平，國家當局需要對簽證和庇護處理和決策中人工智能的使用保持透明。而目前日漸加深的對人工智慧技術的依賴可能會損害程式的公平、公正。

边境安全和移民管理

人工智慧系統已被廣泛應用於邊境安全和移民管理領域。例如，它們被用於自動化邊境身份驗證、自動化安全檢查和監控邊境，甚至使用感測器和人工智慧驅動的無人機遠程監控邊境。

在邊境安全和移民管理方面，使用人工智慧具有優勢。人工智慧系統可以分析大數據以識別模式和預測行為。它們的速度遠超人類。因此人工智慧演算法可以簡化依賴於大量數據審查的重複性任務，從而提高效率。根據它們的設計、開發和利用方式，人工智慧系統可以在邊境口岸快速跟蹤身份驗證。它們還有助於更好識別對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和移民計畫完整性構成潛在威脅的個人。

然而，人工智慧系統也給移民帶來了許多風險：

首先，人們非常關注對個人隱私權的尊重。每個人的私人生活和通信（包括數字格式的个人資訊）都應獲得尊重。限制隱私權的措施只能

是為了維護合法利益，包括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全。它們還必須滿足**合法性、必要性和相稱性**的累加檢驗：

—合法性的檢驗要求各國採取的措施在國內法中有法律基礎，並符合法治。它們必須是可獲得和可預見的，並提供充分的法律保護，防止專斷性；

—必要性檢驗要求所採取的措施解決一項緊迫的社會需要；

—相稱性檢驗要求公共當局採取的措施與其合法目的相稱，是限制最少的可行解決辦法。

其次，人們對於敏感個人資訊（如生物特徵數據）的收集和使用有所擔憂，尤其是不同公共部門儲存、處理和獲取數據的方式。由於可互操作的資訊技術系統的建立，允許數據在不同系統使用並輕鬆共用，包括用於管理邊境安全和移民的那些系統。例如在歐盟，一個名為 eu-LISA 的專門機構負責監督與庇護、邊境管理和移民相關的可互操作系統的應用。

另一方面，互操作性可以改進人工智慧系統、增強安全性並提供更好的身份管理。如果數據集由於僅在不相容或不同的專門軟體中可用而缺乏互操作性，那麼大量數據驅動的人工智慧系統將無法充分發揮其潛力。而另一方面，如果不能快速識別和糾正錯誤，互操作性也可能導致一個資料庫中的錯誤向前級聯。如一個人可能被錯誤地識別為安全威脅，而該資訊被記錄在一個資料庫中。如果錯誤未被及時糾正，訪問該資料庫資訊的邊境管理當局可能會拒絕此人入境及不公平地對其拘留。此人在這種情況下甚至可能沒有意識到資料庫中的錯誤。缺乏透明度會使糾正錯誤和使個人因自由被侵犯而獲得賠償變得更加困難。因此，應根據數據保護的基本原則開發可互操作的IT系統。

第三，邊境管理技術化對人工智慧技術的應用（如使用人工智慧驅動的無人機或人工智慧驅動的生物特徵數據行為分析等）可能導致對個人的過度技術監控的風險增加。

人工智能支持移民管理

人工智慧系統也用於促進移民和難民在整個移民週期中獲得服務和融入。例如，聊天機器人現在可以為移民和難民提供法律諮詢和心理支持，人工智慧驅動的應用程式可以幫助難民安置，數字應用程式APP可用於支持移民在接納國的融入。移民自身在流覽與簽證規定和流程的大量（錯誤）資訊方面的經驗，也開發了一些聊天機器人。

Amir Moravej身在伊朗，但他心在加拿大。這位工程師在加拿大工作了五年，簽證到期後他返回伊朗。回國後，Moravej經常流覽移民論壇並加入一個群聊，簽證申請人在群聊中分享了關於他們案件的建議和資訊，但發現自己不可能讀完所有資訊，於是他就編寫了一個機器人去閱讀所有論壇帖子，並找到與自己案例最相關的帖子。

一年多前，Moravej獲得了加拿大永久居民身份，再次回到加拿大。他開發了一個人工智慧的移民工具——Botler，這是首個應用於“魁北克體驗計畫”的創業專案（PEQ），旨在面向居住在魁北克的外國勞工和學生提供支持的專案。即使沒有任何關於申請專案的資訊，但只要想申請，就可以在申請全過程中使用這個機器人工具。

用戶先回答有關其資格與條件的問題，Botler確定他們是否有資格參加。符合標準的潛在申請人接下來上傳檔，該工具會審查檔。如果一

切正常，機器人將創建一個可以提交給移民部的應用程式包。未達標的用戶可以看到他們的申請材料還存在哪些缺陷，以及他們必須滿足哪些條件以獲得資格。Botler的機器學習引擎使用了魁北克移民部門發佈的指導方針，並接受了來自真實案例的匿名數據訓練。與這家初創企業合作的律師則對該產品進行了品質保證測試。

技術確實能使相應能力和功能成為社會差距的均衡器。例如，《數字身份倡議》為無法證明合法身份的非法移民和難民等被排斥的個體提供在接納國開立銀行帳戶和獲得各種服務的手段。人工智慧技術可以減少處理時間，消除或減少與簽證官面談所帶來的不便和時間消耗，這些面談通常需要提前數周預約。然而，並非沒有風險，引發了社會對“技術解決主義”的擔憂——因為移民是一個複雜而不容易被管理的現象，不容易依賴技術就修復解決。

人工智能在电子簽證和移民客户服务領域的應用

傳統申請以紙質的人工簽證申請和處理系統要求申請人提交紙質申請表及相關檔的副本。瞭解相關法律、法規和指導方針的經辦人員隨後會審查申請，並常常要求申請人提供額外補充檔。在提交所有證明檔及進行面談（如有必要）後，經辦人員會做出評估，而評估可能又需要獲得自身同事的認可，全過程可能需要申請人多次訪問簽證機構——總處理時長取決於簽證類型和個案複雜性，可能從幾天到幾個月不等。

通過使用人工智慧技術，簽證申請過程可以變得更快，並消除了前往移民辦公室的必要。簡單、低風險的申請可在幾分鐘內在線提交、支付和處理，減少了當面訪問的不便，並有助於更快作出決定。人工智

慧技術使人類移民官員可以處理更複雜或風險更高的個案。這些系統在一些國家已應用超過二十年。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已將人工智慧技術應用在電子旅行預約申請系統。而英國與歐盟即將啟動以人工智慧為核心、針對免簽國家公民入境審核的線上旅行申請系統。

然而這類系統需要在資訊和通信技術（ICT）領域大量投資，而且只能在客戶的ICT訪問性高的情況下有效工作。缺乏ICT技術的國家會影響服務的提供，導致無法訪問線上電子平臺。例如，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存在“數字鴻溝”，發達國家81%的人使用互聯網，而發展中國家比例為40%，最不發達國家僅15.6%。此外，還有“數字性別鴻溝”——男性的互聯網接入率高於女性——男性接入率為51%，女性為44.9%。

網路世界中的移民和流动

隨著世界的相互聯繫日益緊密，技術為人們提供獲取越來越多資訊來源的手段，深刻影響著人們的移民策略和決定。例如，移動電話技術使移民能夠與家人、朋友隨時保持聯繫，但它也被人口走私者和各種犯罪網路利用，包括通過社交媒體應用程式。手機內置的GPS和地理定位技術可以讓人們在移民遷移中找到對比路線。搜索引擎常用於收集有關過境國和目的國的資訊。但在使用這些技術時，人們會留下可加以利用和分析的重要**數字足跡**——人工智慧系統建立在這些可用數據的基礎上會加以分析、篩選。

對應用於移民和流動的人工智慧系統來說，存在兩個主要挑戰：首先，移民管理日益“數據化”，包括生物特徵數據、衛星數據和大數據在內的不同類型的數據越來越多被收集、存儲和用於移民管理，

這會導致產生一些關鍵問題——數據集中的不良做法可能產生嚴重後果，包括存儲和分析來自弱勢群體的數據。網路安全漏洞和極差的存儲操作可能會暴露移民和難民的敏感資訊。如果數據落入惡意行動者或官員手中，就會對移民安全造成危險後果。此外，用於訓練人工智慧演算法的數據錯誤如果沒有被檢測到，可能會向前級聯。這些專有演算法或“黑箱”更難以被審查，從而更難識別其錯誤。這樣的錯誤會造成毀滅性後果。例如，人們如果被用於收集生物特徵數據或人臉識別的軟體錯誤識別，他們可能被拒絕獲得基本服務。如果這些服務是在衝突環境下提供的人道服務，那麼對受影響的人們的後果可能更加嚴重。

其次，這種對移民和流動“數據化”的擔憂由於公共部門和私營企業之間逐漸增多的互動而進一步加劇。私營部門在設計和發展技術方面發揮核心作用，而這些技術今後由各國應用於移民週期的所有階段。這種公私互動引起了人們對數據保護的擔憂。例如，數據共用和私營企業訪問敏感數據只應在有足夠措施確保數據保護的基本原則的情況下才能發生。

國家、國際組織和私營企業往往受到潛在利益衝突的驅使。如國家捍衛公共利益；國際組織需要在其職責範圍內採取行動以保護其受益人的利益；私營企業會遵循其對盈利和維護股東利益的承諾。這些不同的動機反映在人工智慧系統的設計和開發中。利益常常占主導地位，在設計、開發和應用這些技術時，往往沒有考慮移民的利益和對其權利的保護。私營企業通常在沒有任何同意的情況下訪問和控制移民數據，以及從移民數據中獲得的貨幣化，以及保持危機敘事的動機帶來的挑戰。

因此，國際人權條約和《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導原則》為**算法問責制**提供了一個全面的框架來解決這些問題。而在整個移民週期中，各國、國際組織和私營企業在設計、開發和應用人工智慧系統時，應堅持“**不造成伤害**”的要求，確保這些人工智慧系統一旦應用不會損害他們的服務群體。此外，各國和國際組織可以利用公共採購程式要求人工智慧技術供應商遵守人權標準和數據保護的基本原則。這些要求可以包括在公共採購通知中的具體條款，要求供應商採取技術和組織措施，將**数据保护原则**集成到人工智慧系統中。還可以要求人工智慧技術供應商在應用這些人工智慧系統之前評估其產品對人權標準的影響。這種做法可以提高演算法的公平性和可問責性，並防止在未事先評估風險的情況下通過移民群體測試這些技術。

本章结论

移民和流動領域的人工智慧並非新現象。然而，計算能力的提升、技術的進步和大數據的可用性為人工智能在這一領域的當代發展和擴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人工智慧為移民政策和實踐帶來一系列優勢。如人工智慧系統可以通過簡化依賴於大量數據審查的重複性任務提高移民管理的效率。根據它們的設計、開發和應用方式，人工智慧系統可以在邊境口岸快速跟蹤身份驗證，有助於更好地識別對安全構成潛在威脅的個人。在此方面，良好實踐包括結合演算法數據分析的機器學習工具、通過為身處目的國的移民提供資訊和諮詢服務的聊天機器人以支持移民安置。人們也越來越關注使用人工智慧預測流離失所事件的可能性和面臨流離失所風險的人口，這樣可以幫助當局更有效地應對大量湧入的人口

。例如，國家當局可以根據移民和遷移預測迅速採取行動，更好地準備接待設施。然而，這些預測也可用於加強禁止入境政策，旨在阻止移民和尋求庇護者進入一國領土，包括被《關於難民地位的公約》第33條和人權條約所禁止的非法驅回。因此，人工智慧系統在移民和流動環境下也會為保護和尊重移民人權帶來許多風險。

第九章 移民的貢獻

隨著虛假資訊的大量出現，全面和準確評估移民貢獻面臨的巨大挑戰變得更嚴重。縱觀以往的各种移民報告以及其他關於國際移民的政策出版物，至少有兩個觀點是普遍存在的：

- (a) 承認移民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國際和國家政策問題；
- (b) 關於移民的公共討論越來越兩極化，全面、嚴謹和基於實證的分析空間日趨減少，公眾討論的性質也隨著時間的推移發生了變化，人們開始普遍認識到，在過去幾年裏，移民辯論的“毒性”進一步加劇，**恐懼和分裂的政治**越來越多地控制著討論。干擾和虛假資訊越來

越多地被用作為追求權力的一種策略，對公眾、政治和社交媒體的話語、社會價值觀，以及移民、流離失所和難民等公共政策問題產生了負面影響。

面對關於移民的負面討論，人們可能會忽視這樣一個事實，即在移民支持下的，人類在現代改善和平與繁榮的努力，總體上是成功的，而且在特定的關鍵領域格外成功。移民在全球提供了活力的源泉，在創新和專利、文理學獎項、初創和成功企業中，移民均有驚人的表現。在近年對移民的討論中，人們卻越來越忽視這些歷史和當代貢獻，即使很多貢獻很突出，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都遭到**有意忽略**。

事實上，國際移民仍然是一個相對少的現象，世界人口中只有3.5%是國際移民。儘管比例很小，幾十年來，國際移民的總數仍增長至高達2.72億。目前，流動而非移民正變得更加普遍，這使得不少人認為，現在是重新審視移民在跨國、國家和地方層面做出的多種貢獻的時候了——這並不是說國際移民沒有給原籍國、過境國和目的地國的社區帶來挑戰，然而，移民對社會的許多貢獻目前被忽視、淡化或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本章就是要突出移民的這些貢獻。

什么是“贡献”

貢獻意味著付出金錢、時間、想法、勞動、物質產品，以便與其他人一同實現某些目標。在個人關係，例如與家人和朋友的關係，以及在社會學語境下，“貢獻”是與社會中的個人、團體和機構更廣泛的互動和接觸的一部分。換句話說，貢獻是作為支持和塑造社會的更廣泛的結構環境和社會進程的一部分而出現的。它們可以被大致歸為**社会文化、公民政治和经济**等方面。

- 社會文化涉及社會中不同的人群及其習慣、傳統和信仰。
- 公民政治涉及在國家公認的權力範圍內參與公民義務。
- 經濟涉及與貿易、工業或貨幣有關的方面。

隨著移民問題在公共政策和研究領域的重要性的提高，移民本身受到了新的和更大的關注——就他們所遇到的環境而言，移民是更大的國家人口中的不同亞群體，特別是在目的國家。越來越多的**研究人員、政策制定者和媒體人**關注移民進入、停留和定居新國家的方式：第一類人關注瞭解人口、地理、經濟、法律/政策和其他因素；第二類人關注如何最好地實現政策目標；第三類人關注並評論兩者。移民在目的地和原籍地能夠做出的貢獻部分取決於法律政策框架，例如那些影響常規和非常規移民的居留、參與民間活動、合法工作並匯款及返回家園的能力。貢獻也與人口和社會經濟特徵有關，那些選擇移民的人往往擁有更高的技能、教育和機會，最終也反映出他們更有可能以各種方式在原籍國和目的國作出貢獻。

與普遍的移民研究一致，人們認識到關於移民的多數分析都是從目的國的角度進行的，有些認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移民國家——美國對全球的移民研究產生了過多影響。考慮到這一點，本報告試圖通過納入最新對原籍國和目的國的研究和分析，來反映國際移民貢獻的更廣泛經驗。囊括研究和分析的多樣性十分重要，這才能使這份移民報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全球移民趨勢最新報告》。

結尾

在過去的幾年裏，在移民方面發生了大量變化。Covid-19大流行帶來的不確定性加劇，給這個已經在經歷重大轉變的世界增加了巨大的複雜性和焦慮。疫情從根本上改變了世界各地的流動性，已成為真正的全球事件，考驗著每個國家、社會、系統和部門的韌性。

由於衝突（如烏克蘭、敘利亞、葉門、中非、剛果民主和南蘇丹）、嚴重的經濟和政治不穩定（如委內瑞拉和阿富汗）或與天氣有關的災害（如菲律賓、孟加拉、印度和海地等），引發了數以百萬計的大規模的流離失所。

影響移民的因素

移民素來受到地緣政治的影響，如兩次世界大戰、冷戰和大規模恐怖襲擊（如9/11）。疫情大流行是在發生全球巨變時代到來的地緣政治事件，雖已結束，但對全球移民和流動產生了深遠影響。數十年來關於安全、政治和經濟的制度和標準均在此次疫情中受到了巨大挑戰，需要長期理解這種變化，而不是僅僅只關注當下。**疫情放大了不确定性帶來的重大變化，也提供了反思未來的機會。**雖然預測未來幾十年移民的趨勢是否會被這場疫情重塑還為時過早，但有三個重大變化是分析未來移民的核心：

一、技術創新

2005年以來的技術創新，也就是所謂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深刻改變了全球社會、政治和經濟體系的運作方式。數字技術正變得越來越重要，人們能夠在移民過程中即時收集資訊和建議，某個問題會即時引起人們的興趣和關注，同時使用APP程式共用資訊和連接地理上分散的群體。

數字技術也已被廣泛應用於支持非正規移民，使移民能夠避免虐待和剝削性的移民走私者和人販。移民應用程式可以支持接收國更好的整合，同時保持與本國家庭和社會的社會聯繫和財政支持，包括通過日益普及的“移動貨幣”，以及近年移民線上聊天、使用機器學習技術為移民者提供心理支持、幫助導航複雜的移民政策和簽證處理要求的應用程式等。

隨著人工智慧在關鍵領域的逐步普及，對移民工人需求和勞動力市場的更廣泛影響是原籍國和接收國的決策者和企業密切關注的領域。最近還轉向了**區塊鏈技術**及其對移民的影響，特別是對國際匯款，以及對**數字身份**和全球流動性的影響。社交媒體也越來越多地影響著移民政治，社交平臺上的激進主義者激增，也在影響公眾並最終影響著政策的制定。

深刻的技術變革在疫情期間顯著加劇，是疫情對移民社會帶來最重要的長期影響之一。

二、地緣政治的變化

國家間競爭加劇導致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加劇，並有侵蝕多邊合作的風險。全球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在過去二十年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現在權力在國際體系中分布更加均勻。因此，地緣政治競爭不斷加劇，特別是在全球大國之間，經常通過代理進行。主要國家之間加劇競爭的大環境——必然涉及到很多國家——也正通過多邊機制破壞國際合作，亦證明我們正生活在一個支撐全球治理的核心價值觀（**公平、公正和問責**）受到挑戰的時期。

三、生態環境的轉型

生態上消極的人類活動的加劇正在導致過度消費和生產過剩，這與不可持續的經濟增長、資源枯竭和生物多樣性崩潰以及持續的氣候變化有關——讓人們越來越認識到人類活動如果沒有保護地球生態系統的極端負面後果——世界正處於近“**斷裂點**”，包括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崩潰和數千個物種的大規模滅絕，污染也正處於創紀錄的

歷史水準，最終人們越來越轉向移民來適應環境的影響，或由於氣候變化影響而面臨選擇離開家園和社區，或因災難事件而流離失所。

本報告亦參照了以下文獻的部分數據及觀點：

- 由Goldin、Cameron和Balaraman撰寫的《特殊人群：移民如何塑造我們的世界並決定我們的未來》
-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報告《移動中的人：全球移民的影響和機遇》
- 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撰寫的《國際移民：近期趨勢、經濟影響和政策含義》
- 由Goldin撰寫的《移民與經濟：經濟現實、社會影響和政治選擇》
- 由Ruhs撰寫的《權利的代價：監管國際勞工移民》